超越日本國家困境的身份策略
平野健一郎國際文化論視野下的滿洲與東亞觀

蘇翊豪 著

2014年5月出版
目 録

第一章 國際關係日本學派的文化視角 ............................... 1
  第一節 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脈流 ............................... 1
  第二節 知識人類學研究目的與方法 ............................... 6
  第三節 平野健一郎生平概述 ........................................ 9
    壹、求學生涯初期 ................................................. 10
    貳、滿洲研究濫觴 ................................................. 14
    參、學者生涯的開展 ............................................. 18

第二章 平野健一郎的國際文化論 .................................. 21
  第一節 美國與日本的國際文化論系譜 ........................... 21
  第二節 辨析「文化」與「文明」概念 ........................... 26
  第三節 文化觸變論及其應用 ..................................... 32
    壹、文化要素的呈示階段 ....................................... 34
    貳、文化要素的統合階段 ....................................... 38
    參、文化觸變的結果階段 ....................................... 41
  第四節 為何是「文化」？ ........................................... 44

第三章 日本滿洲殖民研究立場變遷 .............................. 49
  第一節 侍奉日本國權主義的滿洲觀 ................................ 49
  第二節 映射王道樂土理想的滿洲觀 ................................ 57
  第三節 在滿洲發現抵抗霸權的能動性 ........................... 62
第四節 「去國家」的滿洲論述軌跡 ................................. 68

第四章 日本東亞共同體思想沿革 ................................. 71
  第一節 超克中國民族主義的東亞協同體理論 .................. 71
  第二節 壟斷「世界史立場」的大東亞共榮圈 .................. 79
  第三節 鞏固日本盟主論的大東亞國際法 ....................... 85
  第四節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東亞共同體構想 ....... 89
  第五節 「超國家」的東亞共同體藍圖 ......................... 100

第五章 超越非正常國家的困境 .................................. 103
  第一節 從「悔恨的共同體」出發 ............................... 103
  第二節 邁向「興亞」的日本國關理論 ........................ 109

附錄 1：平野健一郎生平 ........................................... 111

附錄 2：平野健一郎著作年表 .................................... 113

參考文獻 ............................................................. 119
表目錄

表 1-1：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名稱的三種版本 ............................ 16
表 2-1：文化觸變下的抵抗形態 .................................................... 38
表 2-2：國際文化論分類 ............................................................... 46
圖目錄

圖 2-1：文化的構造 ........................................................................... 28
圖 2-2：文化觸變的過程 ............................................................... 34
圖 4-1：東亞協同體理論工作分擔示意圖 ................................. 74
第一章 國際關係日本學派的文化視角

第一節 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脈流

國際關係是探究國家在國際社會或國際體系中行為的學問，而國際關係理論旨在解釋各國互動的法則。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學術社群長期主導國際關係學界的知識建構，而主流國關理論發展至今至少經歷理想主義對現實主義、傳統主義對行為主義、新自由主義對新現實主義等三次大辯論，至於當前如火如荼的第四次辯論，則是由新自由主義與新現實主義匯聚而成的實證主義抗衡後結構主義。1其中，後結構主義強調任何國關理論必定隱含論者的意圖與價值，故企圖採取以其他理論為研究對象的後設理論化模式（meta-theoretical theorizing），2反思既有理

1 石之瑜，〈英國學派與兩岸國際關係研究〉，《國際政治科學》，1，（2005）：頁 132。
2 按照 Stefano Guzzini 的界定，國關理論有四種理論化模式，除了後設模式外，尚有涉及倫理與政治哲學面向的名目模式（normative theorizing），分析權力、主權、國家等基本概念的構成模式（constitutive theorizing），以及透過大樣本相關分析、小樣本比較法、單一個案研究、假設檢定等方法找尋因果機制的經驗模式（empirical theorizing）。詳見 Stefano, Guzzini, “The end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Stages of reflexivity and modes of theorizing,”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 (September 1, 2013): 533-535.
論的本體論、認識論以及方法論等基本預設。

這股後設潮流激發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後者在反省與批判美國知識霸權過程裡，先是質疑主流國關理論對於非西方世界的偏見，繼而追本溯源有別於西方的歷史、文化與哲學傳統，闡揚其固有國際關係原則與實踐方式。在亞洲國際關係的區域性學派之中，具備思想體系並擁有足以與歐美主流理論分庭抗禮的意願與趨勢者，則以中國的「天下思想」與日本的「世界史立場」為兩個主要的思想基礎。

有鑒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曾受制於主權國家觀念風行而一度噤聲的天下思想重登東亞舞臺，並成為中國國際關係學術界的理論核心。趙汀陽主張將「天下」視為理解世界並超越民族與國家的分析單位，主因是天下無外，在認識論上假定任何他者都具有被感化為我者的可能，故擁抱天下思想的中國世界觀並不以衝突對抗為命題，得以避免將自身特殊的價值觀普遍化，直接從世界思考世界。在微觀層面，中國國際關係學術界開展出「關係」傾向的互動機制，認為天下思想以親疏遠近的社會關係，投射出等級秩序的國際關係，並以建立長遠關係為互動目的，例如秦亞青指出「關係性」（relationality）是中國傳統思想最重要的元素，並將之概念化為四種基本假定：關係本位假定、關係理性

3 領域性（或謂地方性）意指超脫於國家、主權領域，屬於國家層次以上、或以下、或之間的分析立場。詳見石之瑜，《國際關係研究的亞洲地方性學派》，《國際政治科學》23，（2010）：頁 51-54。

4 趙汀陽，《天下體系：世界制度哲學導論》，（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頁 3-33。
假定、關係身份假定、關係權力的假定。 秦亞青並將中國文化的「關係治理」模式界定為一種參與協商過程，將治理理解為社會成員關係的和諧與穩定，因此重點擺在參與而非控制。 另方面，石之瑜與黃瓊萩觀察到中國傾向放棄眼前利益以維護長遠關係的現象，因而提出「關係平衡」 (balance of relationship) 的互動機制，呼朋出三種當中國因應不同威脅時的關係修補原則。

承襲天下思想的國家，在身份意識上關心自身如何被他國看待的形象問題，而非強調如何標榜自身與他國差異以競逐利益，故能形成重視和諧理念的國際秩序。 同時受到中國文化傳統與歐洲近代國家理論影響的日本思想界，亦富含日本固有豐碩的思想資源，足以支撐建構某種日本國際關係學派的方案。日本國關研究的雛形是外交政策分析，主要是一次大戰以來國際政治詭譎多變，加上日本獲准以常任理事國身份參加國際聯盟，在國際事務上逐漸取得發言地位，受此實務需求激發而開展成「國際政治

5 秦亞青，《關係與過程—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文化建構》,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頁61-69。
6 同前註，頁142。
7 順「關係平衡」理論，當行為者遭遇潛在威脅（potentially threatening）時試圖妥協以修補關係，遭遇直接威脅時（directly threatening）企圖摧毀以開啟新關係，遭遇間接威脅（indirectly threatening）時混用懲罰與修好以改正關係。詳見 Chih-yu Shih and Chiung-Chiu Huang, “Balance of Relationships: Accessing Internationals System from China,” in the Conference on Theory of Balance of Relationship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East Asia,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4-15 December, pp. 11-16。
8 石之瑜、張登及，〈中國崛起的認識論及其敘事衍生〉，《世界經濟與政治》，1，(2010)：頁37-52。
學」的獨立領域。但是日本國關學界得以構築自成一格的國關理論，卻是受惠於京都學派開山祖師西田幾多郎的「場所哲學」。該學派揭橥「世界史立場」，認定世界史的中心將從西洋轉移至東洋，在此過程中，日本負有領導亞洲各國的義務，構築東亞新秩序以挑戰並超克歐美中心的國際政治秩序，「大東亞共榮圈」即此時期日本國關理論的產物。終戰後的日本知識界對「世界史立場」與「大東亞共榮圈」避之惟恐不及，深怕引發軍國主義借屍還魂的不當聯想，日本國關理論因此看似失怙，實則借勢綻放多元化的研究視野。不過整體而言，由於日本國關學界並未躬

9 在大正末期至昭和初期，日本國關理論的先驅包括講授國際法的信夫淳平，鑽研外交史的神川彥松，將政治學觀點運用到國際政治領域的蠟山政道。信夫淳平指出國際政治學乃有別於一般政治學與外交研究的科學，重點在於理解複數國家之間的關係，並提倡以國際法的知識體系進行研究，神川彥松將重心擺在國際和平思想與國際聯盟，而蠟山政道則主張考察其他國際政治組織的重要性。爾後，日本各大學亦紛紛成立國際政治學的專屬部門，例如鼓吹「國際民主主義」的吉野作造，推動「大正民主運動」的大山鬱夫，開展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矢內原忠雄等人，也在此基礎上深化日本的國際關係研究。詳見川田侃、二宮三郎，〈日本における国際政治学の発達〉，《國際政治》，9，(1959)：頁122-123。

10 西田幾多郎是日本哲學家，他建構的「場所」哲學相較於「主體即主觀」的西方哲學基礎，是強調構成「意識性自我」得以成立的場所，場所依其邏輯可區分為「有的場所」、「相對無的場所」、「絕對無的場所」。「有的場所」是存在「作用」的物質世界，「相對無的場所」是存在「意識作用」的意識之野，「絕對無的場所」是突破意識之野根底的真正自由意志。在這個「絕對無的場所」中存在著絕對的日本，沒有形體、不能被觀察、不依他者而能自我證成，正是這個空無賦予了日本主體性，讓日本得以涵攝所有事物。參見 Chih-yu Shih and Chiung-Chiu Huang, “Bridging Civilizations through Nothingness: Manchuria as Nishida Kitaro’s ‘Place,’” Comparative Civilizations Review, 65, (2011): 4-17。

11 豬口孝指出日本戰後國關理論系譜的四個源頭，分別是脫胎於戰前殖民地與
逢現實主義在首次大辯論技壓理想主義的盛況，也未經歷行為主義與傳統主義的第二次大辯論，使其普遍籠罩在「反思主義」（reflectivism）的氛圍中，可謂少了點理論的浸淫，多了點歷史的薰陶。12因此，當代學者論及日本學派國際關係的可能性，不免返回近代史的脈絡中一探日本國關理論究竟出了什麼差池，而導致那場可謂萬劫不復的戰爭。

當代日本知識界反思歐美國際關係理論者中，有一批學者強調以「文化」途徑重新理解東亞國際關係。舉例而論，日裔美籍歷史學者入江昭以太平洋戰爭的相關研究馳名中外，他將「文化」定義為記憶、情感、意識形態等符號在國際間之分享與傳遞，並且提出「文化承載地」（cultural borderlands）的主張，要求尊重個別文化的歧異性，提倡文化不分優劣、一概平等，從而能在各文化間開闢「文化承載地」。此乃一塊不屬於特定國家的空間，讓不同文化的人們可以摒棄陳見，分享各自的價值，進而創造出超脫國家疆界的認同。另外在日本本土，國際文化論者平野健一郎（以下簡稱平野），亦曾經歷二次大戰戰火與強烈的敗戰體驗，他也建構一套國際文化理論以回應歐美主流研究取向，藉此反思日本的侵略戰爭。

軍事史研究的「國家學」、批判國家學與當前國際霸權的「馬克思主義」、探討個人與國家的記憶等心理層面的「歷史主義」，以及「美國社會科學方法論」，後兩者時至今日仍蔚為風潮。詳見猪口孝，《國際關係論の系譜》，（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7年），頁162-173。

本書主題在於分析日本國關學界中的國際文化論者，為何摒棄以「國家」為基本分析單位的主流理論，轉而嘗試以「文化」途徑為核心的國關理論，並進而探究此種轉向與知識份子的「身份策略」（identity strategy）有何關聯。其中，石之瑜與劉克倫業已詳加分析入江昭的身份策略，故本書將焦點擺在平野健一郎的身份策略，透過整理其國關理論與思想，一方面說明該理論在當前日本國際關係研究的借鑒意義，另方面詮釋平野的學術理念與日本戰後處境之相互關係。準此，本節以下首先介紹何謂知識份子的身份策略，以及剖析身份策略的「知識人類學」（Anthropology of Knowledge）途徑，接著敘述平野的生平事蹟，第二章摘要入江昭與平野健一郎的國際文化論，並比較兩者身份策略之異同，第三與第四章探討平野的國際文化論對滿洲研究及亞洲論述之貢獻，以瞭解其滿洲觀與東亞觀與日本戰後國家處境之關聯，第五章為結論。

第二節 知識人類學研究目的與方法

知識人類學探究人類知識的起源與演變，基本預設是人類的學術作品與活動，足以反映出人們追求與維護所屬社群主體性（Subjectivity）的意識。知識人類學著重個人化（individualized）的研究模式，每個行為者（包含個人與機構）由於身處時代脈絡、13

本節關於知識人類學之研究議程，主要來自與石之瑜教授在課堂上及讀書會之對談。
環境以及對話觀眾之不同，對於同一影響所屬社群存續的事件，因而產生不同感受而催化不同學術主張，有些行為者可能順應大勢而有些行為者可能逆勢而行，展現各異其趣的能動性。此種為了自身的生存而決定順勢或逆勢的選項稱之為「身份策略」，某種程度上類似「理性抉擇」理論的思考框架。

知識人類學以案例研究法（case study）為主要研究方法，透過檢驗單一個案可以詮釋單一行為者的學思歷程與其所屬社群的相互構成關係，而比較研究法適合解釋不同行為者身份策略的異同。在檢選個案的過程中，知識人類學最為人所詬病的癥結乃是案例代表性不足，然而既然知識人類學奉行個人化的研究議程，每個研究對象的身份策略本身即自成母體（population），無所謂樣本（sample）能否充分反映母體性質的問題。

在理論層面，石之瑜透過耙梳後殖民臺灣學者研究中國的文本，主張學者只能在超乎個人能動性的既有結構條件中，選擇性地傳承、重組、開展、甚或抵抗；並且依此準則界定兩種生產知識的機制：一是「遭遇」（mechanism of encountering），二是「選擇」（mechanism of choice）。14「遭遇」是外於個人的既有結構，足以塑造或限制個體的認識框架，例如受日本殖民的臺灣青年必須接受日本式教育，其中前總統李登輝即服膺日本思想文化，不但廣泛閱讀新渡戶稻造《武士道》與西田幾多郎《善的研究》等日本名著，亦進行沖瀑布等修行，潛移默化日本精神的結果使得

14 石之瑜，〈微觀臺灣學界對中國大陸的研究角度—後殖民視野下的遭遇與選擇〉，「國際視野中的中國研究—歷史與現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2011年11月1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論壇，頁222-224。
他能夠化解一生中扮演多重政治角色（包括中國共產黨員、中國國民黨黨主席、臺獨精神領袖等等）的自我矛盾，連帶影響他的參政風格。相對地，「選擇」則彰顯個人在既定結構下所能自主決定的空間，反映其知識選擇的意念，比方說香港的臺籍學者李南雄選擇「科學普世主義」作為中國研究的信仰，非但沒有釀成「去中國」（De-sinicization），反倒成功保留中國的身份認同。而在遭遇與選擇之間，則有「旅行」的二階機制（second-ordered mechanism of traveling），「旅行」代表個人藉由「選擇」以改變「遭遇」的作為，包含職業、居所、以及社群的改變。今日許多離散海外的華人，因為社會經濟地位的提高，其離鄉背井的移動經驗不再只是造就失根蘭花的孤立社群，反而形成重構自我與祖國的過程，在近年來中國崛起論述中扮演建構中國形象的關鍵角色。
學術主張的根源、發展及成形，故本質上屬於認識論（Epistemology）層次的研究。此種透過探討行為者如何獲得知識的過程，以既有學術理論為理論，彼此相輝映或相抗衡的結果可以促使學界反思既有理論的偏見，進而補足缺陷以激發全新的研究視野。以此為前提，針對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家的學思歷程，藉由人類知識學的研究途徑，找尋能夠深化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可行方案。

本書整合「遭遇」、「選擇」與「旅行」的機制，主張以「困境」（predicament）涵蓋外在「遭遇」與個人「選擇」所帶來的逆境與負面後果，並以「超越」（transcend）作為個人突破困境的具體行動。本書運用「困境與超越」的分析模式，選取日本國際理論家平野健一郎為案例，探討平野的身份策略對於日本國關理論有何借鑑意義。

第三節 平野健一郎生平概述

平野健一郎生於 1937 年中日戰爭方興之際，童年在戰爭陰影下成長，大學時代曾參與安保鬥爭運動。平野於 1961 年自東京大學教養學部畢業，隨後進入研究所取得東京大學碩士學位，1963 年至 1967 年間負笈美國哈佛歷史學研究所，師事費正清（John Fairbank）與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門下，專攻東亞區域研究。1969 年歸國後歷任上智大學講師、東京大學教養學部助教授與教授，退休後任職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教授、國立公文圖書館亞洲歷史資料中心所長、東洋文庫常務理事。著有《國際
壹、求學生涯初期

平野雖然生於中日戰爭爆發後不久，但當時對戰爭的來龍去脈幾乎一無所知，最深刻的印象乃是與朋友看《講談社》的漫畫，作者把日本畫為一條英勇的狗，卻將中國畫成一隻懦弱的豬，這才瞭解原來日本與中國正在交戰。不過戰爭對平野最直接的影響是造成擔任小學教職員的雙親離異，平野的父親同時擔任日本海軍士官，在東京橫須賀軍港服勤，由於工作繁忙而無暇照顧家人，因此平野與妹妹兩人都是在其母親的悉心照料下成長；然而家境困苦加上美軍空襲頻仍，使得平野自小營養失調，也導致後來考上東京大學時也被迫休養一年而延後入學。戰後雙親離婚，平野與母親、妹妹等三人以及從中國逃難回國的外交官一家人，一同居住在狹小的房間，該名外交官還期勉平野將來一定要到美國的哈佛、耶魯等校留學。平野高中時就讀東京都立日比谷高校，該校是東京首屈一指的明星高中，而他最感興趣的科目是歷史，學校的歷史老師是個優秀的歷史主義者，同時也是極力反戰的和平主義者。
主義者。該校極為重視外語教育，除了英語之外，還要求學生選修德語或法語等第二外語，不過當時中文在日本並不是主流語言，平野自己也遲至大學時為了研究中國才開始學習中文。

平野就讀東京大學時日本爆發安保鬥爭運動，該事件的導火線是美日兩國在 1960 年重新簽訂《美日安保條約》（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the U.S. and Japan），實際上，安保鬥爭運動的遠因無疑是敗戰對日本主體性的戕害，喚醒人民對於日本主體性的珍視。終戰後日本政府被迫頒布一部立國精神迥異於戰前《大日本帝國憲法》的新憲法，該憲法第一章第一條界定天皇是日本國的象徵，其地位來自於人民主權之授與，國體因而搖身一變為「象徵天皇制」。第二章第九條宣示放棄將戰爭作為解決與他國衝突之手段，這項放棄交戰權以追求永久和平的條文，也讓新憲法被稱頌為「和平憲法」，

不過也因為該條文連抵禦侵略的自衛戰爭都不允許，使得日本必須仰賴外力以維繫國家安全，如此不充分的主權讓日本自經濟起飛時起，不斷追求「正常國家」（normal statehood）的夙願。

回顧安保運動的具體經過，盟軍於 1952 年結束為期七年半的軍事占領，為了遏止共產勢力的擴張，美國早於 1951 年即與日本簽訂安全條約，爾後更於 1960 年重修《美日安保條約》。日本政府與贊成《美日安保條約》者認為此新約嘗試修正舊約不平等的款項，有助於繁榮與和平，但反對者則質疑其不平等的面向，強調仍未解決美軍基地與琉球群島歸還等諸問題。雙方陣營

20 黃自進，《『和平憲法』下的日本重建（1945-1960）》，（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09），頁 12-13。
僵持不下而最终导致1960年6月15日的流血冲突，为反对国会批准条约而聚集东京街头的十万名群众，遭到岸信介内阁强行镇压。运动期间，时为东京都立大学教授的竹内好严词批判战后日本仅仅获得“形式独立”，尚未达到军事自卫与粮食自给的“实质独立”，并揶揄岸信介内阁口中的实质独立，乃是屈服与从属美国所换来的结果。竹内好随即愤而辞去教职，相较之下，平野就读的东京大学教养学部遭舆论批评为保守反动，学生们直到学部的自治大会召开后，方才全员倾出参与在1960年6月15日突入国会的计划。平野此前一度怀有成为新闻记者的梦想，但经过该起事件的动盪，瞭解自己的体力可能不足以胜任记者工作，於是转而追求学者生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平野成为研究生后，日本学界在1962年又发生“福特基金會事件。”延續安保鬥爭運動的爭議，美国战後在日本的中囯研究学界，持续透过补助研究案以左右研究成果，並藉此鞏固美国的亚洲政策，而“福特基金会事件”的主因是年輕学者們反對東洋文庫、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受外国大量資金補助，連帶影響學術自主性等疑問，更帶動學界再檢討美國干預學術的聲浪。對於福特基金會事件，學術界秉持多種觀

---

21 丸川哲史，《竹内好―アジアとの出会い》，（东京：株式会社河出書房新社，2010），页178-182。

22 美國福特基金會針對東洋文庫、亞細亞基金會針對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所進行補助，故學界有時將該起事件並稱為「AF 事件」。然而前者研究對象主要為中國，後者則是東南亞國家，故本書為了行文方便，以下略稱為「福特基金會事件」。參見邵軒磊，2009a，〈「西方」如何影響日本的「中國研究」—以日本福特基金會論爭為例〉，《中國大陸研究》，52，(3)：页72。
察脈絡，平野於 2010 年 12 月 27 日在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演講中，回顧該起事件並將其定位為「老少世代研究者的對立」，認為這之間的爭議固然包含對於研究方法的選擇分歧，但主要體現不同世代研究者對於「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對立思考。因為美國在福特基金會所扮演的角色，讓日本的中國研究者不由得聯想到日本帝國政府對於學術的干預，甚至於產生學界深受美國控制而泯滅日本主體性的疑慮。福特基金會事件造成當時不同取向的中國研究者間激烈的辯論，其中平野的恩師衛藤謙吉，乃是飽受學界攻撃的重要人物。衛藤謙吉主張單憑

分別是反帝國主義、研究主體性、研究方法、知識社會學世代交替。詳見邵軒磊，《戰後日本之中國研究系譜》，（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2009b）：頁 74-75。

如以福特基金會事件作為區分世代的分水嶺，老年世代的研究者包括市古宙三、衛藤謙吉等人，他們主要基於財源籌措問題和科學客觀態度的理由，贊成接受美國福特基金會的金援。另外，關於日本戰後的中國研究者，平野認為大致可以區分成第一、第二與第三世代，歸納每個世代的特徵如下：第一世代的學者，在戰前與戰爭期間即接受有關中國的教育，特別關切新中國的劇烈變動並致力於理解中國革命的變化；第二世代主要關心一九六二年代的局勢，而與第一世代相比，顯得更為冷靜地觀察中國的發展；第三世代以降的研究者，學術重心擺在改革開放後的中國，而且受益於可以自由前往中國進行調查研究的果實，不僅限於從外側觀察中國，更能夠深入中國社會，以內在角度理解中國。詳見平野健一郎，《インタビュー—戦後日本の中国研究》，平野健一郎、土田哲夫、村田雄二郎、石之塚（編），（東京：平凡社，2011），頁 4-7；平野健一郎，《日本の中國研究との関係論》，《戰後日本的中國研究—1形知識史（二）》，邵軒磊、石之塚、何培忠（編），（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2013）：頁 202-210。

衛藤謙吉（1923-2007），生於中國瀋陽，父親為滿鐵奉天圖書館館長。東京大學名譽教授，曾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進修，專攻東亞政治史，開授「極東國際政治史」等課程。詳見平野健一郎，《衛藤先生の学問の人間性につ
日本學界的資源與人力，無法進行有效的研究，可是許多憂心日本學術自主性的左派學生，卻不滿意亦不接受這番說辭，平野本人也是遲至留學美國後，才真正理解衛藤瀋吉等前輩藉助美國資源以經營日本學術環境的苦心。

貳、滿洲研究濫觴

平野的博士論文曾獲得滿洲研究專家杜贊奇（Prasenjit Duara）高度稱許，但論及平野的研究目的，其實他在東京大學教養學部的畢業小論文與滿洲毫無關聯，其親友亦不具旅居滿洲的經驗，不過他自小即對日本為何要前往滿洲建國感到納悶不已，尤其不解為何家庭會因這場戰爭而分崩離析。除此之外，日本社會在1950年至1960年掀起對二戰定位的再檢討，新聞界與學術界對二戰的定名爭執不下，加深平野投身滿洲研究行列的決心，隨後平野參加由竹內好發起的「滿洲問題研究會」，可惜這個機構成立不久即宣告解散。

26 Prasenjit Duara 是印度出身的學者，於1983年取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先後任教芝加哥大學與新加坡國立大學。他指出滿洲國是個多民族國家，而相較於單一民族國家的現代史觀，滿洲國研究本質上屬於後現代的範疇，平野對此說表示贊同。

27 關於「滿洲問題研究會」發展之經緯，參見野村浩一，《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分析中國—野村浩一教授訪談錄》，《戰後日本的中國研究—口述知識史》，何培忠、石之瑜（編），（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2011），頁103。
在日本，對於二戰的不同稱呼隱含不同的意識形態，有一說認為應該稱之為「十五年戰爭」，以九一八事變作為二戰起點，第二說主張以盧溝橋事變為開端的「大東亞戰爭」，第三說視珍珠港事件為起始的「太平洋戰爭」（關於三種命名方式之比較，可參閱表 1-1）。28 戰後聯合國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General Headquarters，簡稱 GHQ）為了抹殺日本的軍國主義和超國家主義思想，要求日本政府發佈官方文書不得使用「大東亞戰爭」之名，同時一併審查民間出版物是否不當使用「大東亞戰爭」、「大東亞共榮圈」、「八紘一宇」等字眼。日本民間最早倡議使用「十五年戰爭」稱呼的是哲學家鶴見俊輔，他在 1956 年《中央公論》1 月號關於〈知識份子的戰爭責任〉主題上，表示使用「太平洋戰爭」將忽略日本在九一八事變後對中國長期戰爭的事實，進而曖昧化戰爭責任。29 竹內好響應鶴見俊輔的意見，他表示這場戰爭具有雙重結構，一方面對東亞要求統御權，以先進國家之姿指導落後國家，另一方面卻又要驅除歐美並稱霸世界，故追求亞洲殖民地的解放。這兩者既是互補又是矛盾關係，因為欲使歐美承認日本的盟主地位，必須訴諸亞洲的原理，可是日本卻又在現實上


29 庄司潤一郎，《日本における戦争呼称に関する問題の一考察》，《防衛研究所紀要》，13，(3)，(2011)：頁 61。關於日本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命名之討論，由來、問題點，以及各種稱呼在政府公文與法令、新聞圖書與雜誌的統計資料，詳見庄司潤一郎同論文，頁 43-80。
喪失亞洲連帶的基礎，兩相矛盾之下製造無止盡的緊張，更導致戰事無限地延長，\(^{30}\)所以竹內好強調使用「十五年戰爭」的必要。

表 1-1：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名稱的三種版本

<table>
<thead>
<tr>
<th>名 稱</th>
<th>戰爭的起點</th>
<th>名稱的起源</th>
</tr>
</thead>
<tbody>
<tr>
<td>十五年戰爭</td>
<td>九一八事變（1931.9.18）</td>
<td>1956年1月，《中央公論》刊載樋脇俊輔所著之「知識人の戦争責任」（知識份子的戰爭責任），開頭即使用「十五年戦争（一九三一～四五年）」。</td>
</tr>
<tr>
<td>大東亞戰爭</td>
<td>蘆溝橋事變（1937.7.7）</td>
<td>1941年12月10日，日本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發布「今次戦争ノ呼称並ニ平戦時ノ分界時期ニ関スル件」（關於今次戰爭呼称與平時戰時分界時期之文件）。</td>
</tr>
<tr>
<td>太平洋戰爭</td>
<td>珍珠港事件（1941.12.7）</td>
<td>1945年12月15日，聯合國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發布「神社神道ニ対スルノ政府後援、支持、保護、管理、廃止ノ件」（針對國家神道之政府後備、支援、保護、管理、廢止傳教之文件），通稱為「神道指令」。</td>
</tr>
</tbody>
</table>

資料來源：整理自庄司潤一郎，〈日本における戦争呼称に関する問題の一考察〉，頁44-63。\(^{31}\)

《關東軍的滿洲國國家構想之開展過程》是平野碩士論文的題目，他主要參閱關東軍參謀片倉衷陸軍少將的《關東軍機密攻略日誌》，並接受衛藤瀋吉的指導，日後更在他的推薦之下前往

\(^{30}\) 竹內好著，李冬木、趙京華、孫歌譯，〈近代的超克〉，《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聯書店，2005），頁324。譯自〈近代の超克〉，《近代日本思想史講座》第7卷，（東京：筑摩書房，1959）。

\(^{31}\) 庄司潤一郎，〈日本における戦争呼称に関する問題の一考察〉，《防衛研究所紀要》，13，(3)，(2011)：頁44-63。
美國留學。平野取得哈佛大學燕京學社提供的獎學金，在 1963 年至 1967 年至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受教於費正清門下，繼
續構思滿洲國建國的原因。然而，在他之前就讀美國加州大學柏
克萊分校的中村貞子已率先出版《九一八事變的政治決定過程》，使用大量與平野類似的資料與論證方式，因此如欲完成博士論
文，平野勢必轉換研究途徑。恰好此時，平野修習史華慈的人類
文化學課程，認為史華慈的研究方法有助於自己的滿洲研究結
構，因此轉向以「文化」的觀點作為論文核心，爾後更是以此為
主軸建構其「國際文化論」。

關於費正清與史華慈研究途徑的相異之處，柯文（Paul
Cohen）評述戰後美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呈現三種分析框架：分
別是「衝擊—反應」、「近代化」、「帝國主義」。「近代化」
框架以西方近代角度解釋中國與西方的差距，例如分析為何中國
無法產生近代科學觀與工業革命，隱喻中國是個怪異的行為者，
必須加以研究與矯治；「帝國主義」框架則假設中國原本具有自
然的發展路徑，卻受西方與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襲而受挫，許多採
行該框架的學者主張此乃中國一百五十餘年來的禍根。另外，「衝
擊—反應」框架為費正清進行中國研究的核心觀點，他認為中國
的回應起源於西方的衝擊，預設唯有和西方相關的中國歷史才是
重要的，體現一種從外在角度思考中國的思路，但是柯文以為中
國不論在種族、語言、地區或社會階層等面向都存在巨大差別，
影響人們態度和行為的因素可謂錯綜複雜，故「中國回應」一詞
不過是個簡化的抽象符號。史華慈在當時也攻擊了諸如「中國

32 Paul Cohen 著，林同奇譯，《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
（臺北：稻鄉出版社，1991），頁 18。譯自 Paul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是靜態、傳統的，西方是動態、現代的；中國無力自己產生變化」
等種種西方中心觀，他認為中國是個詮釋學的文明，是個傳統
和現代之間沒有絕對斷裂的文明，因此提倡深入理解中國歷史的
方式，以文化人類學和思想史兩種方法進行研究。不過平野並不
認為兩位老師的觀點有如外界想像的巨大，他覺得費正清比較偏
重西方文獻，史華慈則顧及東西兩方的變化，換句話說，彼此研
究作為主體中國之切入點可能有所不同，可是想要瞭解中國的基
本精神卻是大同小異的；例如費正清認為戰後美國的中國研究籠
罩在敵情研究的氣氛下，但為了突破這個政治的枷鎖，費正清鼓
吹學術上的交流，特地學習並要求學生通曉中文與日文。34

參、學者生涯的開展

平野回國後幾乎日日造訪國會圖書館與東洋文庫，蒐集整理
博士論文題材，但這期間恰巧越戰爆發，因為反戰的情緒高漲而
無法平心靜氣寫作，進度比預期緩慢。後來適逢上智大學成立新
的國際關係研究所，平野先成為該研究所的研究員，隔年再轉往
東京大學協助衛藤濤吉的研究計畫，一邊寫作一面執教並從中撿
索國際文化論的精髓，逐步展開出獨特的日本國際文化論視野，
並以此展開對滿洲、東亞共同體的研究。此外，為了提升日本中


33 同前註，頁 93-94。

34 平野健一郎，《日本における中国研究と国際文化論》，近代史學術演講，
（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0 年 12 月 27 日）。
國研究的水準，整合分散各地的研究機構，以及培育新進人才，他與多位知名中國研究者奔走四方尋求各界資助，最終於 2007 年成立「人類文化研究機構—現代中國地域研究」，其下設有六大中國區域研究處點，而平野也在早稻田大學自費設立獎學金，鼓勵學生從事中國研究。

平野在接受筆者訪談中回顧其學術生涯，自評並非純粹的中國研究者，因為其主要研究領域為國際關係論，涉及東亞與中國的區域研究，並集中在以滿洲為對象的殖民地研究。關於殖民政策與國際關係論的部分，平野認為或許存在「後藤新平→新渡戸稻造→矢內原忠雄→川田侃→平野健一郎」的系譜。後藤新平曾任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與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總裁，新渡戸稻造與矢內原忠雄皆為東京帝國大學的自由主義殖民政策學者。

此六大現代中國區域研究中心分別為：東京大學研究基地、京都大學研究基地、早稻田大學核心研究中心、東洋文庫研究基地、慶應義塾大學研究中心、綜合地球環境研究所基地，各中心現任負責人依序為田島俊雄、森時彥、毛里和子、高田幸男、國分良成、毛里和子。詳細資料請參閱網站：http://www.china-waseda.jp/index.html，以及毛里和子，〈現代中國區域研究拠點が始動〉，《ワセダアジアレビュー》（Waseda Asia Review）第 3 號，（東京：早稲田大學アジア研究機構，2007），頁 68-71。

新渡戸稻造的殖民理論特徵是以「政治的關係」之有無作為殖民地的絕對條件，根據這個定義，如果國民向本國殖民地以外的國家或地區遷徙，則稱為「移民」，若是向新領土遷徙則定義為「殖民」，而新、舊領土的區別標準在於主觀的殖民母國「人的觀念」，因此人、土地、母國三者構成「政治的關係」。以此概念為核心，新渡戸稻造推崇殖民體制的歷史意義，而他雖然重視殖民地的民族問題，並讚賞英國給予殖民地高度的自治主義，可是對於殖民地獨立運動的立場卻是模稜不清，九一八事變後甚至極力為日本帝國主義支配滿洲的行為辯護。反觀身為後繼者的矢內原忠雄，他區分出三種殖民政策方針，分別是專制榨取的「從屬主義」、具有軍事性格的「同化主義」、與母國保有對等協和關係的「自主主義」，並將殖民地的反抗運動視為「民
田侃是經濟學者，接受矢內原忠雄的指導並從美國引進國際關係理論，後三人彼此之間具有師徒關係，但並非拾人牙慧而有所革新創發。

從上述發展過程來看平野健一郎的思想淵源，就日本的系譜而言，後藤新平、新渡戶稻造、矢內原忠雄等人的研究是其基礎，衛藤瀋吉與川田侃同時具有日本與美國學術訓練的背景，而在學院系統以外的竹內好，其觀點的影響力不容小覷，這幾位帶給他對東亞與中國世界的基本認識，以及對待西洋世界的立場。爾後留學美國期間，平野亦受到費正清和史華慈的薰陶，這兩位美國的中國研究專家啟發他「國際文化」的研究途徑，從而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開闢新的學術視野。

如前文所述，本書以「困境」與「超越」為分析模式，詮釋平野健一郎的身份策略。平野生涯早期重要的困境，諸如家人生離死別的中日戰爭，與其連帶的戰後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定名風波，因安保鬥爭與福特基金會事件所引發的日本主體性問題，這些事件不僅構成他早期思想的困惑，同時也指向戰後日本為美國所占領，被迫制訂一部爭議十足的「和平憲法」，大幅削弱主權的事實；換言之，如何消解日本淪落為「非正常國家」的國家困境，實乃整個日本戰後世代必須正視的困局，本書在往後的章節中，將逐一解釋平野如何鋪陳引領日本重回康莊大道的藍圖。
第二章 平野健一郎的國際文化論

第一節 美國與日本的國際文化論系譜

國際文化論是一九七○年代興起的理論，文化作為國際關係理論在權力、制度以外的第三向度，國際文化研究的盛行實乃大勢所趨。芝崎厚士以為國際文化論的研究著眼點有三種，分別是國際關係的文化性、國際關係的單位之文化性、國際關係的關係之文化性。芝崎亦認為當前的國際文化論可以分為美國與日本兩大系譜，前者以入江昭為代表，國際關係表現為「文化間關係」；後者則以平野健一郎為代表，國際關係表現為「文化的關係」。

芝崎以為「文化間國際關係」與「文化的國際關係」的最大差別在於前者預設國家之間的國際關係是先行存在，而研究「文化」是為了理解國際關係之用；後者認為國際關係本身就帶有文化性質，故先驗存在的是「文化的關係」。

首先在美國的國際文化論系譜部分，著名日裔美籍歷史學者入江昭於1979年在《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期刊上發表

37 芝崎厚士，〈國際文化論における2つの文化：方法論的考察〉，《國際政治と文化研究》日本國際政治學會，2002年，頁44-46。
38 Ibid, p. 51.
《文化與權力：作為國際文化關係的國際關係》（Culture and Pow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Intercultural Relations）一文，該文主張國家即文化系統（cultural system），而國際關係即是文化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同時，國家的行為包含系統內（intra systemic）與系統外（extra systemic）兩種類型，前者涉及文化系統內部的發展，而後者不僅處理系統與系統之間的互動，也呈現系統自身的特徵。入江認為在一個文化系統中存有兩種控制機制，「權力」是正式的機制，代表政府的公共權威，例如使用法律與武力以維繫秩序；而「文化」是非正式的機制，包括宗教信仰、語言風俗。在中國，「權力」與「文化」向來是不可分割的，中國的統治者既是權力的擁有者，同時也是文化的保護者；而美國則一直秉持公私領域、權力文化分立的傳統。此等內部差異反映在對外政策層面，中國在東亞國際體系的強勢源於其文化的偉大，即使受到異族入侵也能成功教化異族成為中國文化的守護者，文化與權力的作用在對外關係上可謂相輔相成。反觀美國，由於信守權力僅適用於公領域的觀念，使其對外政策呈現赤裸裸的權力關係，英國政治思想家與經濟學家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也依循同樣理路批判盛行於十九世紀晚期與二十世紀初期的「新帝國主義」，本質上乃是權力機制凌駕文化機制的結果。

入江日後深化其研究框架，在「權力」、「文化」的架構之外又添加了「經濟」的變項。他認為在外交事務的領域，「權力」乃國家保衛自身的能力，「經濟」是財貨服務的生產與交易，「文化」則為記憶、情感、意識形態等符號的分享與傳遞。入江接著勾勒三種國際文化的研究途徑：文化基礎論（cultural foundations）、文化交流論（cultural exchange）、全球意識論（global consciousness）。

「文化基礎論」處理構成國家基本形態的意象與符號，「文化交流論」涉及政府與政府之間或者人際之間的互動，「全球意識論」則超越國家疆界，涵蓋和平、人權、環保等普世議題。入江以一九三〇年代的美日衝突為例，說明此三種研究途徑的差異，以「文化基礎論」的眼光來看，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可以說是兩種文化價值觀的相對立，而以「文化交流論」的視角論起，則是雙方資源與貨品交易狀況的惡化，釀成珍珠港事變。最後如果站在「全球意識論」的制高點，美日的衝突實乃鑲嵌於自由主義危機以及極權主義興起的世界潮流之中。

由此可見，入江藉由文化、權力、經濟系統的互動，加上三種研究途徑，圓滿定義出國際關係的文化內涵。然而按照其理論架構，如果世界各國自成文化系統，普世文化將如何成為可能？對此，入江將焦點擺在「文化多元主義」（multiculturalism），並據此提出「文化承載地」的主張。文化多元主義訴求尊重個別文化的歧異性，提倡文化不分優劣、一概平等，從而能在各文化

間開闢「文化承載地」，這是一塊不屬於特定國家的空間，讓不同文化的人們可以摒棄陳見，分享各自的價值，進而創造出超脫國家、以全人類為主體的認同。44

平野身為日本國際文化論系譜的開創者，國際文化論對於國際關係理論貢獻卓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張啟雄對其評論如下：

「國際文化論」既是新的學術領域，也可視為是一種新的研究方法。因為它是用文化的角度來切入問題的核心，使得向來用政治的觀點來分析國際關係，或用經濟的角度來切入國際關係的研究，所未能浮現的問題一一都呈現出來，所不曾出現的見解也不斷的被提出來檢討。

平野留學歸國後持續講授文化接觸課程，早在一九八○年代即使用「文化觸變」(acculturation)概念以詮釋異文化接觸下的變化，並且主張如果不從文化下手，將無法理解亞洲的近代國際關係史。然而，即使曾經受到美國文化人類學的啟發，平野評估《國際文化論》主要還是在日本本土萌發的產物，他在接受作者訪談中表示：

《國際文化論》仍然是在日本展開的學問，當然也不否認曾受到美國人類文化學的影響……如果我一直留在日本研究（指假使當初沒有前往美國留學）的話，仍然會成為九一八事變與日本近代史的專家。但是，前往美國留學開拓了我的視野，對中

44 石之瑜、劉克倫，《入江昭對世界與中國的中間主義立場—一種多元身份的知識視野》，（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2010），頁73。
國與日本的關係、兩國在世界史中的地位，擁有更廣泛與周全的認識。

更具體地說，對日本何以侵略中國，而中國又如何回應的問題，以政治或軍事的角度剖析當然無可厚非，可是對研究者而言有必要嘗試新的途徑，所以我吸取文化人類學的精髓，轉以文化的角度考察之。簡言之，雖然採用文化人類學的組織架構，但我還是對日本的近代化、中日兩國的衝突更感興趣，因此並不全然是無條件地接收美國文化人類學觀點。45

究其根本，平野仍然關心中日兩國的問題，而非一味移植美國文化人類學的方法論與問題意識，而此點也構成其與美國國際文化論系譜的最大不同處。他以為美國的主流理論仍然以主權國家為前提，但平野卻認為國家並非產生不同文化的唯一因素，因此他主張國際關係乃「文化的關係」。這是因為人類的文化存在多樣性，不均等的文化系統並存在世界上，而文化與國家界線不吻合的情況在所多有。46 是故，相較於以往把國家當成唯一分析單位的取向，也相異於把國家等同於文化體系的主張，平野認為有必要跳脫主權國家的窠臼，建構一種具有動態發展能量的國際關係理論，此即其撰寫《國際文化論》的初衷。本文以下將摘要其國際文化論的精髓。

45 作者當面訪談平野健一郎教授，日本東洋文庫、西東京市平野健一郎的研究所。2012 年 3 月 19、20 日。
46 武者小路公秀、蝦山政道主編，《國際學理論と展望》，（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6年），頁 173-174。
第二節  辨析「文化」與「文明」概念

相較於重視體質特徵的生物人類學，文化人類學旨在研究由人類所創造的物質與精神文化，包含文化的起源、特色、變異及發展規律。出於殖民擴張的需求與對原始文化的興趣，文化人類學早先以未發展出文字系統的民族為主要研究對象，但隨著原始部落的逐漸凋零消逝以及現代化腳步的加快，研究重心已不再侷限於傳統的亞非與大洋洲。\(^{47}\) 儘管文化的定義分歧，但文化人類學者普遍以為一個文化系由各種文化要素所構成的整合系統，在歷史長河裡，不同文化要素不斷相互作用，使得文化體系保有持續演變的動力。\(^{48}\)


\(^{47}\) 黃淑娉、龔佩華，《文化人類學理論方法研究》，（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年），頁 9。

\(^{48}\) 同前註，頁 10。

\(^{49}\) 莊錫昌、孫志民主編，《文化人類學的理論架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年），頁 337-339。
辦文化博物館、民族研究所等機構，使得研究活動獲得學術組織的支援與補助，日後在此基礎上相繼創設東亞民族調查委員會、東南亞民族調查室、南方人文研究所等基地，儘管學術成果不為日本侵略政策所攫取，但仍成功擴展研究視野與舞臺。戰後美國學術研究方法大舉傳入日本國內，並以嶄新的研究途徑重新彙整戰前與戰時日本在滿洲、朝鮮、臺灣與東南亞各地的調查資料，而 1964 年後日本政府大幅放寬海外調查的限制，在民族學會的指導下，研究領域逐漸拓展至世界每個角落並獲得國際認可。50

石田英一郎在戰後系統性地重整文化人類學，先後編寫《文化人類學筆記》、《文化人類學序説》等書。石田認為文化具有「體系性」，體系性展現在下列四方面：（1）文化全體由部分所構成，但全體擁有超出部分總和之上的整體特性；（2）文化具有邊界；（3）文化體系中的個別部分擁有特別機能，但文化整體亦有其特定結構；（4）文化含有恢復平衡與安定的功能。51

就第一點而言，文化主要由四種「文化要素」（cultural elements）所構成，包括技術、社會、語言、價值（如圖 2-1 所示）。文化邊界是一種假定，因為文化無法像國家一樣標出明確疆界，但為了考慮不同文化間的關係，有必要在理論上劃定文化邊界。個別文化要素發揮其特定功能，但整合成整體時卻可以展現整體結構，猶如近看一片片馬賽克片時各具風味，而遠觀整幅馬賽克拼圖時卻又有不同效果。「安定」是文化基本的狀態，不過文化乃生生不息並且不斷變動，意即文化可能受到外部或內部的影響

51 石田英一郎，《文化人類學序説》，（東京：時潮社，1966 年），頁 23。
而逐漸崩壞，但最後依然能夠形成新的安定結構，換言之，這是一種維持一貫的變動，亦可以稱之為「平衡」。

承襲石田英一郎的理論架構，平野認為「文化」是人類從自然中解放的產物，並進一步詮釋文化乃是「求生存的辦法」，而人類社會為了適應不同的生活環境，發展出各式各樣的「求生存
的辦法」，也因此形成不同社會集團，國際關係本身則是圍繞著社會集團的環境。⑤

各種不同的文化形成獨特的「社會集團」，而隨著「社會集團」慢慢發展成為「國家社會」，其數量達到一定程度後將產生「國際社會」。國際關係中，單位的文化性是「國民文化」，而關係的文化性表現在各個集團間的關係，例如與異文化的接觸所產生的「文化摩擦」現象。平野據此強烈批判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衝突論」，主要是因為杭廷頓混淆了「文化」與「文明」的概念，又將「文化摩擦」過分渲染為「文明衝突」。首先，杭廷頓指出：

文明是一個文化實體，文明和文化都指人類整體生活方式，文明不過是文化的擴大；只有德國例外，十九世紀德國哲學家中區分文明與文化，文明涉及機械、科技等物質因素，而文化則涵蓋價值觀、理想等較為高層次的知性藝術與道德品質。然而，德國區分文化與文明的意圖及方式是虛僞的。⑤

為了有效駁斥杭廷頓的理論，平野回溯「文化」與「文明」概念發展的歷史。德國哲學家中，嚴格區分「文化」與「文明」的代表人物是赫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赫德為了對抗十八世紀提倡普遍文化的啟蒙運動，特別將「文明」界定為具有普遍性傾向，而「文化」則具有特殊性傾向；進一步而言，「文明」既然具有普遍性傾向，代表其他文明可以透過學習來取得該

⑤ 平野健一郎，《國際文化論》，（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0年），頁8。
⑤ Samuel Huntington 著，黃裕美譯，《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7年），頁34-35。
文明的特質，而「文化」承載特殊性傾向，其他文化的人們必須置身其中，才有機會領悟該文化的特質。舉例而論，西方文明的船堅炮利很容易為東方後進工業化國家所仿效，但是西方文化的民主與科學素養卻非一蹴可幾，是故早期的留學生便扮演著重要
的仲介角色，藉由融入西方環境以利日後在東方播種與紮根西方思潮。

平野認為日本人也有將「文明」視為普遍性傾向、而將「文化」視為特殊性傾向的習性。他發現日本人所使用的「文化」，至少有三種面向的意涵：(1) 與文明用法大致相同，但特指日常生活中的西方要素；(2) 指教養或具知性意義的事物，不含軍事經濟等物質層面，此乃大正時代開始盛行的說法；(3) 代表人類社會生活在整體的用語，或者生活方式的總稱，此種定義接近人類文化學的用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普及。54

平野採用第三種定義方式，並把「文明」看成「文化」的機械性與制度性要素之集合，換句話說，「文化」的層次高於「文明」；而且他亦指出，被稱為「文明」的文化要素即使能夠從一個文化體系輸出，但能否順利輸入另一個文化體系是需要額外考慮的問題。因此，平野並不同意「文明」與「文化」的概念可以簡單地相提並論，他更進一步指出異文化之間的接觸難免改變文化要素，但這並不全然走向文明衝突，充其量只是一種文化摩擦，為此，平野區分兩種文化摩擦的類型：(1) 在同一層面的異文化集團間發生；(2) 在不同層面的異文化集團間發生。

54 平野健一郎，《國際文化論》，(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0年)，頁31-33。
第一種文化衝突，簡言之是不同文化集團因為出於對彼此的成見和誤解，導致紛爭、衝突、甚至戰爭，但是第二種類型，則起源自鑲嵌於個人自身的異文化性質，例如一個人在家庭、社區、族群、宗教、國家等不同層次的團體與場合，可能扮演多重角色，但各種團體又擁有獨自文化體系，從而導致認同的糾葛。平野指出近代日本人在適應西洋近代文明的過程中，身處不同團體與組織的文化中，深刻體驗到激烈的精神糾葛。然而，不論是哪一種文化摩擦，都不意味著必然走上大規模衝突的局面，畢竟隨時都有防患未然的措施；而不同文化間，也並非天生註定會有衝突發生。

即使「文明衝突論」漏洞百出，但為何當時能夠引領風騷西方學術界？因為時至今日，學術界雖不再堅持國家為國際社會唯一行為者的主張，可是出於國家戰略眼光的國際關係學說卻仍然層出不窮，而實踐上持續由強國主宰，國家行為者依舊是維護利益與安全的要角。黃競涓即批判「文明衝突論」的立場其實仍與美國國家利益合謀，因為九一一事件後伊斯蘭恐怖主義分子與包庇恐怖活動的國家，恰好落入西方主權中心論述之外的他者身份，更是有別於基督教文明的異教徒，使得美國可借機壓抑來自其他文明的挑戰，並正大光明地推卸西方世界剝削第三世界的責任。55

由此可見，杭廷頓的「文明衝突」理論過於偏頗，而為了

55 黃競涓指出冷戰後國際關係學界產生四種世界觀，分別是主張太陽底下無新鮮事的「新現實主義」、鼓吹歷史終結論及民主和平論的「新自由主義」、強調國際衝突不再是意識形態的衝突的「文明衝突論」、希望人們學習尊重差異與消弭不平等待遇的「規範理論」。此外，他認為全球化其實也並不與主權國家體系相衝突，因為全球化穿透國家疆界的效果，仍然需要仰賴國家疆界之鞏固。詳見黃競涓：《成熟之無政府狀態、文明衝突論與全球化：主流國際關係理論之偏狭研究議程》，《兩岸與國際事務季刊》，2，(2005)：頁 81-89。
導正人們對於文明衝突的錯誤印象，平野嘗試以「文化觸變」的觀點重新闡揚文化變遷的規律。

第三節 文化觸變論及其應用

當文化所處的環境發生變化時，文化本身也必須跟著因應調整，平野認為變化的成因可以分成「內部」與「外部」兩種類型。內部成因又可區分成偶然的「發現」和帶有目的性的「發明」，外部成因則是起源於「借用」或「模仿」等方式。

文化變化的結果經常產生相似的文化要素，文化人類學界歸納出「可能性限制原理」（principle of limited possibilities）和「收斂原理」（principle of convergence）兩種機制。可能性限制原理源自俄裔美籍人類學家戈登衛塞（Alexander Alexandrovich Goldenweiser）的理論，戈登衛塞解釋為何早期人類社會的船隻都是採用木造而非石造，主因是船隻除了浮在水上，為了快速移動必須讓船槳可以輕易引入與帶出水量，因此即使是分處世界各地的不同文化，製作器物時受限於相同需求與邏輯，也能發展出相似的解決方法。收斂原理意指最初不同文化間的文化要素迥異，但因爲必要性與功能性的類似，最後會讓文化產生趨同的現象。平野以冷戰為例，說明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陣營，看似意識形態完全對立，但回歸兩者同為追求人類福祉的本質，意識形態的差距終究不過是道路的不同，雙方將因折衝妥協而逐漸走上收斂一途。56

56 平野健一郎，《國際文化論》，（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0年），頁38-39。
如何詮釋「文化變化」概念，學說上有「文化進化論」（cultural evolution）與「文化變容論」（cultural change）兩種觀點。文化進化論假設文化由低階往高階進展，呈現野蠻以至於文明時代的單線發展，這意味著不同文化差距只有發展快慢之別，但是本質上仍然反映白人的民族優越感（ethnocentrism）。相較於文化進化論的宏觀人類史，文化變容論在美國人類學之父鮑亞士（Franz Boas）及其學生米德（Margaret Mead）、潘乃德（Ruth F. Benedict）等人的努力下，藉由大量累積的個案，提出以微觀的方法研究文化間傳播關係。而 1936 年刊載於美國人類學雜誌的《文化觸變研究備忘錄》（Memorandum for the Study of Acculturation）替文化變容論開闢了新的里程碑，平野以此建構其國際文化觸變理論。

「文化觸變」基本上指擁有不同文化的群體因持續性的接觸，使得單方或者雙方的原文化形態產生變化。57 大抵上，這個文化從舊平衡狀態邁向新平衡狀態的過程，而這個過程大致可以分成文化要素的呈現和選擇、統合與結果等三階段（過程如圖 2-2 所示）。

57 與文化觸變相近的詞彙是「文化化」（enculturation），意指嬰兒從一張白紙、不具有任何文化而只憑本能生活的階段，逐漸接受教養並習得特定文化的過程。平野健一郎，《國際文化論》，（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0 年），頁 56。
壹、文化要素的呈示階段

一旦文化要素陷入功能不足的窘境，系統便產生替代舊文化要素的需求，但新的文化要素在成為文化體系一部分前，需要經
歷多個階段。當外來文化要素傳播進來時，接收的一方不一定進行「選擇」，可能直接「拒絕」或者「忽視」，「拒絕」大多發生在處於激烈競爭狀態的雙方文化之間，「忽視」則是人們認為該文化要素不具重要性或和自身文化關聯性不大所致，而「濾器」（filter）決定如何對待外來文化要素，同時也標誌著該文化體系的界線。

外來文化要素之所以能夠通過篩檢，並進入「選擇」階段的原因是出於「必要性」（necessity）與「適合性」（congruity）的考慮，前者在於人們評估該文化要素是否對實際生活有幫助，後者乃是衡量該文化要素是否能和傳統相容。平野將承擔外來文化要素傳播者的行為者稱之為「文化搬運者」（culture carriers），其主要以留學生、外國技師、傳教士、貿易商、殖民者、觀光客為代表，平野在此特別強調嚴復作為「文化搬運者」對近代中國的影響，嚴復懷抱富國強兵的理想，以探尋適合中國現代化的文化要素為目的，前往英國留學，返國後集畢生之力翻譯歐美的政治經濟思想。58

「文化搬運者」是貫穿國際文化論的核心概念，可用於解釋文化傳遞的機制，其具體事例除了身為留學生的嚴復以外，尚有清朝外交官黃遵憲與日本中世紀的連歌師飯尾宗祇。黃遵憲是清朝首任派遣日本的公使何如璋帳下的參贊（書記官），駐日期間長達四年，著有《日本國志》與《朝鮮策略》等書。黃遵憲堪稱東亞世界揮別傳統的華夷秩序，轉向近代國際秩序的代表性人

58 平野健一郎，《國際文化論》，（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0年），頁67-69。
物，十九世紀末葉的李氏朝鮮政權，正值內外交困之際，黃遵憲為其出謀劃策而撰寫《朝鮮策略》並交付朝鮮修信使金弘集，提出「親中國、結日本、聯美國」的策略，結果造成朝鮮朝野上下的激烈爭辯，朝鮮高宗最終採納其意見，間接導致朝鮮開國並與西方列強簽訂條約。

平野認為黃遵憲的論點展現西方「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理論的精髓，強調當時局勢較之於中國的戰國時代更為險惡，主張朝鮮為了防備俄羅斯的侵攻，必須妥協與歐美列國簽訂條約。而實際上根據其他學者的先行研究，《朝鮮策略》也反映出清朝固有的亞洲政策思維，即使在國際格局迅速扭轉的危急存亡之秋，仍然要求朝鮮維持在清朝的控制之中，但李鴻章與何如璋的差別在於前者仍停留在傳統宗法親屬思維，可是後者已看到遵循國際法而將朝鮮定位為「屬國」的必要。59 總之，黃遵憲《朝鮮策略》的意義在於透過一位外交官的言行，彰顯東亞三種文化處在國際壓力之下的接觸與交錯，甚至隱含中日韓三國攜手合作，共同抵抗外侮的意味。

黃遵憲《朝鮮策略》的案例足以支撐東亞國際關係體系具有「重層性」的主張，而回顧近代以降的東亞國際關係史，平野從中觀察到「重層性」的一貫特色，並據此指出三種觀看東亞國際體系的看法。第一種是以主權國家為單位，遵循國家平等原則，視武力為後盾的「西伐利亞體系」；第二種乃以王朝國家為單位，

59 平野健一郎，《黃遵憲《朝鮮策略》異本校合—近代初頭東アジア國際政治における三つの文化の交錯について》」，《國際政治》129，(2002)：頁21-22。
遵循華夷階層秩序，注重文化德行的「中華世界」；第三種則是近年浮出檯面的觀點，主張「亞洲獨特性」可與近代歐洲國際關係並存及相互對峙，60 平野舉出經濟學者濱下武志的朝貢貿易體系研究為例，說明亞洲既有市場網路如何與新加入的歐洲金融貿易思維相結合，構成亞洲史自身具有的國際契機。61

另方面在日本歷史上，飯尾宗祇是日本中世紀的連歌師，平野認為飯尾宗祇活躍的時代乃日本內部諸國林立，也是政治、文化統合的關鍵期，而飯尾個人的活動發揮轉換時代的作用。62 當時日本捲入應仁之亂，貴族與武家的上層社會分裂為東西兩部分，但歸功於飯尾宗祇等長期滯留地方的連歌師，促成中央貴族與地方武家的文化交流，使得地方培養尊崇古典文藝的氣氛，中央與地方的文化水準逐漸合流而有利往後的政治整合。63

總結第一階段文化要素的呈示，「文化搬運者」在此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且依接觸狀況的不同將產生相異的接觸發展。而在文化觸變過程的入口，接觸狀況大致可分成「強制」與「非強制」狀況，前者以殖民地、戰爭、外國軍隊佔領與征服為代表，後者則是接收的一方有意識地推動文化交流而生，以下將進一步

60 平野健一郎，〈アジアにおける地域システムと国際関係〉，《地域システムと国際関係》，（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4 年），頁 3-22。
61 關於濱下武志的朝貢貿易研究內容及其身份策略，詳見陳威志：《濱下武志朝貢貿易體系研究的知識啟示》，（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2010 年）。
62 平野健一郎，〈中世日本における文化的・政治的統合—文化運搬者としての連歌師宗祇をめぐって〉，《国際政治》，59，〈1978b〉：頁 3。
63 史華慈著，平野健一郎譯，《中國の近代化と知識人—嚴復と西洋》，（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8），頁 10。
介紹文化要素的統合階段。

貳、文化要素的統合階段

關於文化的統合過程，平野區分出廣義與狹義的選擇。廣義的選擇（又稱第一次選擇）屬於粗略選擇，包含了「拒絕」與「忽視」，標準如前文所述是基於「必要性」與「適合性」，此階段攸關於文化「境界維持」（boundary maintenance）的問題。狹義的選擇（又稱第二次選擇）發生於文化要素的統合階段，此時期舊文化系統已經容納新的文化要素，但仍處於適應的階段；如果某一文化要素的改變帶動其他文化要素的轉變，此種統合現象稱為「甘薯藤枝蔓現象」。64 平野認為當該現象引發社會運動時，便催生「抵抗」的信號。「抵抗」的形態依「抵抗的目標」和「抵抗的方向」兩原則，可以分為四種類型（如表 2-1 所示）：

表 2-1：文化轉變下的抵抗形態

<table>
<thead>
<tr>
<th>來源於接收方的抵抗</th>
<th>來源於授與方的抵抗</th>
</tr>
</thead>
<tbody>
<tr>
<td>對於文化要素的抵抗</td>
<td>Ⅰ</td>
</tr>
<tr>
<td>對於對方集團的抵抗</td>
<td>Ⅲ</td>
</tr>
</tbody>
</table>

來源：平野健一郎《國際文化論》，頁 94。

第一類（Ⅰ）乃抵抗外來的特定文化要素，是最為典型的抵抗。眾所周知的案例是日本明治時期的「國粹主義」，國粹主義

64 日語「いもづる」意指接二連三地出現。
發軔於當時人們對政府推行歐化政策的大規模反動與抵抗，帶有強烈民族主義的色彩。

第二類（Ⅱ）乃不希望本身特有的文化要素傳播至其他文化，例如某些宗教不公開展示秘密儀式，反對傳播信仰教義予外界，或者是有些商會為了保護某些技術與產品而抵制出口。

第三類（Ⅲ）乃出於對敵對集團的防衛心態，防止自身成員融入其他集團，例如歐洲殖民者曾經排斥那些接受殖民地傳統風俗的殖民者。

第四類（Ⅳ）乃實施對特定集團的禁制，比方說當今各國針對嚴重違反國際秩序的國家實施禁運，又如荷蘭人一度禁止當地土著學習荷蘭語。

平野本人最為重視上述第三種類型的抵抗，亦即自身文化體系針對來自對方集團的抵抗，他將這種既抵抗對方集團，卻又導致文化觸變的類型稱為「敵對性文化觸變」（antagonistic acculturation）。65

不言可喻，平野相當看重「敵對性文化觸變」的解釋能力，他依此概念解釋東亞國際關係史上眾多複雜的事件。整體而言，「敵對性文化觸變」可謂東方社會面對西洋勢力入侵的縮影，例如中國的洋務派、日本的歐化派、朝鮮的開化派皆遵循此途徑邁

65 根據平野健一郎《國際文化論》第 130-131 頁中引述，阿諾爾德·約瑟·湯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是英國經濟史學家阿諾·湯恩比（Arnold Toynbee）的侄子，他提出異文明接觸論，區分ゼロト（Zealot，可譯為攘夷）和ヘロデ（Herod，可譯為開國）兩種抵抗主義，前者是徹底的反抗主義，例如中國的義和團，後者即平野所謂「敵對性文化觸變」，例如俄國彼得大帝、日本明治維新的政治領導者。
向近代化，其中明治政府确立君主立宪制之前，曾经派遣伊藤博文赴普鲁士考察宪法，便是选择接纳特定具体的文化要素，却又不至丧失固有传统文化要素的明证。又以日本在太平洋战争的败北为例，平野认为这场大战意味着日本自明治以来「文化触变」的失败，因为「国粹主义」与「国权论」无法在国内顺利合流，导致对外扩张的倾向。而战后美军的占领也带来压倒性的文化触变，例如以教育制度而言，美方首先剔除军国主义的教育，进行民主教化的改革，随后却又因应冷战的危機，而将教育委员会由当地居民直选改为地方首长任命。此外，美国强勢的文化產業也大舉入侵，廣受年輕世代的歡迎，可見战后的日本明显呈现美国化的傾向。

如将范围锁定为中日关系，「敌對性文化触變」的概念亦可用于描述二十世纪初的中日戰争時期。对此，平野有兩點觀察，第一點是中國社會最早在清末變法改革之际就已展開對日本文化的抵抗，中日兩國採取各自獨立的方式因應欧美文化的入侵，在日俄戰爭之後更是轉變為「競爭」關係。最後在日本帝國化日趨明朗時，中國逐漸確立對日本的「敵對性文化触變」基調。第二點則是中日間的文化触變不是只有日本單方面地傳往中國，而中國僅僅靜態地接收，事實上是雙方都互有文化要素的移動。另方面，平野分析「抗日」與「抗戰」的詞彙在當時中國社会的语境，他認為「抗日」指的是对日本文化的抵抗，「抗戰」指涉对日本这个敵國的抵抗，兩種形式匯聚成中国抵抗日本入侵的運動。66

66 平野健一郎，《日中戦争期の中国における社会・文化変容》，（东京：東洋文庫，2007年），頁1-12。
參、文化觸變的結果階段

文化要素統合階段之後經歷「再解釋」（reinterpretation）、「再構成」（reorganization）等過程，最後達到新的平衡狀態，文化觸變至此才算告一段落。文化觸變的結果，可分成同化（assimilation）、適應（adaptation）、排斥（reaction）三種類型。

針對「同化」的結果，平野以日本在臺灣和朝鮮所實施的殖民主政策為例，說明殖民母國強制灌輸本國文化，但是被殖民的一方並不完全認同，因此構成強制性的文化觸變。而「適應」則是雙方文化要素最終達到調和的狀態，即便是統合階段曾歷經相當程度的摩擦與矛盾，平野舉了西元第六世紀的日本為例，認為當時日本文化成功適應中國文化帶來的文化觸變，以此成就平安時代的燦爛文化。至於「排斥」現象，則是文化觸變過程暫時終了，但新舊文化要素尚未完全調合，主因是表面上的反抗運動有所減緩，不過人們仍舊殘存反動心理。

平野至此梳理了文化觸變過程的全貌，最後聚焦在日本本國文化發展的軌跡，思想家們針對日本文化是純粹抑或是雜糅的議題，提出許多發人深省的觀點。哲學家丸山真男稱日本為「蛸壺型文化」，以相對於歐洲的「簫型文化」，「簫」是日本的一種民俗樂器，製作簫的方式是將竹子的一端劈成許多細條，竹子與細條便宛如手掌與手指的親密關係，蛸壺是日本漁民捕捉章魚的陶制器皿，這種器皿一個個並排但彼此之間毫無聯繫可言。丸山藉此隱喻日本是一個僅因外來思想影響而起的「雜居文化」，由
此可見日本欠缺一種思想的坐標軸，缺乏主體選擇的能力，使得面對近代西洋文化要素時無力招架，無怪乎明治時代的知識份子猶如盲人摸象般，片面地引入各種流行思想。67

評論家加藤周一自法國留學歸國後於1955年發表《日本文化的雜種性》、《雜種的日本文化之希望》兩篇文章。加藤認為英法兩國是純種文化的典型，而日本自近代化以來，傳統的日本和西洋化的日本，已在文化深層處充分融合而難以切割，日本風格常常是精神層面的「國民主義」，而西洋化的一面通常是物質層級的「近代主義」，但近代主義如果侵犯精神領域便會遭致嚴重的反抗，因此日本理應屬於「雜種文化」。68在加藤看來，任何主張日本文化純粹化的運動必定失敗，因為純粹化有兩種方式，一是拋棄日本本根而西化、二是翦除西方枝節而保留日式，而屬於後者的京都學派哲學家倒行逆施，將天皇制近代化而製造大東亞共榮圈，所以他認為與其無謂地悲歎日本文化的雜種性，不如承認並善加運用其優點。

人類學家柳田國男指出日本人對外部影響的抵抗力之微弱，絕不是明治以後才有的事情。易言之，日本自古以來及不斷地接收異文化，因而成功培養調和新舊文化要素的能力，使得兩種以

67丸山真男，《日本の思想》，（東京：岩波書店，1961年），頁11。同時丸山真男也指出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的三個特徵，分別是思想的無構造性與雜居性、天皇制與國體、政策決定者的無責任體制。
68加藤周一，《日本文化の雑種性》，《思想》，（1955年6月）。加藤周一是一位日本思想家與醫學博士，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留學法國巴黎大學期間，一面專攻血液學，一面發表文藝評論。歸國後成為評論家，參與美日安保鬥爭運動，亦曾擔任立命館大學國際和平館館長。
平野則是呼應加藤周一的看法，因為他絲毫不認為有「純種文化」存在的可能，而丸山的觀點又否定歐美與日本文化要素交融的特質，使得兩者毫無關係地收納於蛸壺之中，所以他支持日本文化是大和、中國、朝鮮、歐美共同創造的「雜種文化」之論述。

平野在《國際文化論》的尾聲指出，二十世紀七零年代以來全球化的浪潮蓬勃發展，全球移民現象的頻繁也使得文化觸變在世界各地接二連三地發生，這主要是拜國際交通與通訊手段的進步之賜，使得人們很容易成為國際移動者。他認為「國際交流」是國家與國家之間在各個領域活動的總稱，囊括人口、物品、金錢、資訊在內的國際移動；「文化交流」意指文化要素的移動與交換現象；「國際文化交流」在狹義上是國家政府間的文化交流，但廣義上包含民間的交流活動。平野表示「國際移動」必將伴隨著文化要素的移動，而「個人」是國際移動的主角，透過「個人」持續跨國界交流最終的結果，理論上而言應該會創造一種「地球文化」。更精確地說，這是某一部分的文化要素正處在共同化的過程裡，如果數量與品質持續增加的話，地球文化的願景將指日可待。

69 柳田國男，《文化運搬の問題》，《定本柳田國男集》第 24 卷，（東京：筑摩書房，1970年），頁 467。另外，與上述三人立場相反的是增田義郎，他於 1967 年出版《純粹文化の条件》，認為日本自繩文時代以來就是個「純粹文化」，不像歐洲民族移動與通婚頻繁，而且日本對待外國文化時只會挑揀必要的文化要素，故能確保固有文化得以留存下來，參見增田義郎，《純粹文化の条件》，（東京：講談社，1967年），頁 34。
不過儘管心繫地球文化的願景，平野仍再三表達對於「個別主義普遍化」之憂慮，因為在他的觀念裡，唯一能夠稱為文化的普遍性特徵，只有文化的多樣性；可是強勢的文化要素依然妄圖普及原則之尊，流露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的姿態，所以他仍不願其煩地指出某些看似共通的文化要素，實際上仍舊隱含特殊性。他例舉伊曼紐・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對民族國家體系的質疑，民族國家起源自西歐的特殊背景，卻屢屢被塑造為普世價值，而強加在其他政治共同體身上，呈現一股個別主義普遍化後，又從普遍主義個別化的趨勢。70平野不否認民族國家已經取得優勢地位，但為追求文化多樣性，實有必要奉行「文化多元主義」的基本原則。

第四節 為何是「文化」？

相較於西方主流國際關係理論偏好以「國家」作為分析主體，日本國際學者習慣以「文化」的角度思考，並將國際關係當成不同文化間的關係來處理，甚至有人直指國際衝突本質上乃是文化衝突。71 日本國關理論相對化「國家」的舉動並非否定國家的功

71  石之瑜，《中共外交的理論與實踐》，（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4），頁1。
能，而是因為國際關係中的文化關係同樣深刻地影響人們的生活
型態國家作為分析單位不免存在侷限，超越國家的視點方能有效
理解國際社會與文化變遷的議題。\(^{72}\)

入江昭與平野健一郎的國際文化論也呈現往「文化」途徑靠
攏的傾向，不過兩者身份背景的不同也影響其理論的差異。根本
上，入江昭的理論仍然附著於主權國家的架構之上，申言之，處
於「文化間關係」脈絡下的國際關係，文化被框限在國家的脈絡
之中，各種文化系統呈現各自獨立的狀態，如欲交流必須新闢「文
化承載地」，意即透過退出民族國家的方式，營造一片虛擬的空
間，容納各式各樣的異文化與價值觀，以避免各執已見的文化中
心主義，如此方能落實基於共同認同的「人類共同體」（human
community）。

相反地，為了突破傳統國家中心論的隱含假設，平野重新發
揚個人的主體性，彰顯「個人」作為國際關係主體的地位。\(^{73}\)平
野所開闢之「文化的關係」脈絡下的國際關係，直接將個人視為
文化的搬運者，如前文所述，個人在不同層級的場域鑲嵌著不同
的身份認同，因此各個文化本身就存在複數層次的文化體系，故
文化交流並不必仰賴新造的場所，只需讓作為文化搬運者的個人
自由移動而催生文化觸變，不需要透過任何國家動員的機制，即

\(^{72}\) 張驥、劉中民，《文化與當代國際政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頁4。

\(^{73}\) 王義桅，《超越國際關係：國際關係理論的文化解讀》，（北京：世界知識
出版社，2008），頁232-239；前川亨，〈文化接觸の諸類型—「東アジア」
地域を想定した理論的枠組みとして〉，《専修大学社会科学年報》，39，
(2005)：頁131-132。
可順利突破既有疆界限制，創造文化多元主義世界以及屬於人類全體的「地球文化」環境。因此，在平野的國際文化論中，具有能動性的個人有如文化觸變的觸媒。依循此一架構，隱約可見其排除國家主宰、干涉的作為，轉而頌揚人的自主性，不過儘管平野並未公開宣稱國家概念的無效，但提倡個人和文化的重要性之餘，不免映襯國家概念的相形沒落與稀釋主權國家的影響力。一言以蔽之，平野與入江同樣冀求在人類世界創生一種普遍性的文化認同，但是入江的策略是「空間」取向，而平野則回歸「個人」途徑（關於入江昭與平野健一郎的國際文化論之比較，參閱表 2-2）。

<table>
<thead>
<tr>
<th>理論脈絡</th>
<th>入江昭</th>
<th>平野健一郎</th>
</tr>
</thead>
<tbody>
<tr>
<td>國際文化本質</td>
<td>文化間關係</td>
<td>文化的關係</td>
</tr>
<tr>
<td>文化的載體</td>
<td>國家（文化系統）</td>
<td>個人（文化搬運者）</td>
</tr>
<tr>
<td>文化交流模式</td>
<td>文化承載地</td>
<td>文化觸變</td>
</tr>
</tbody>
</table>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而成

回頭反省日本國際關係理論何以崇尚「文化」的研究途徑，固然在方法論上，超越「國家」並回歸「文化」的視點能夠有效理解傳統國關理論所無法解釋的東亞國家行為與東亞國際社會現象，然而更重要的涵義在於軟化近代日本的「國家」概念所隱含的侵略性。蓋自從日本透過明治維新，由封建體制劇烈轉型成現代國家以來，國家實力確實急速膨脹，加上軍國主義者屢屢灌輸
人民侵略行動的正當性，強化日本肩負天賦使命以解救亞洲各國
脫離歐美勢力範圍的觀念。人們直到終戰的那一刻方大夢初醒，
並重新評估國家中心思維可能招致的殺戮、戰爭與壓迫，而不幸
為虎作倀的學術社群，自然對起源自西方且遭東方誤用的國家概
念抱持審慎的態度，發現反倒是根源自東方的文化概念更能貼近
與反映東亞世界的真實。當東亞擺脫了以國家為基礎的脈絡，返
璞歸真至以文化為基礎的脈絡，也形同祛除西方帶給東方的困
境，此乃包括平野等日本國際文化論者試圖轉換國際關係脈絡的
真意。
第三章  日本満洲殖民研究
立場變遷

第一節 侍奉日本國權主義的満洲觀

中國東北地區原先是滿族人的發祥地，1635年皇太極將原族名「女真」改為「滿洲」，而此一舊稱大抵為日本人所沿用。滿洲在近代東北亞作為兵家必爭之地，一直引起俄國與日本的虎視眈眈，日本政府經屢次交涉要求俄國從満洲撤兵未果後，決定不惜一戰以阻止俄國獨吞満洲。日俄戰爭之後，日本依據《樸茨茅斯和約》(Treaty of Portsmouth)取得俄國在満權益，包括旅大租借地、長春至旅順的鐵路經營權和所有權等。74 以此條約為基礎，日本在1906年新設關東都督府與南滿鐵道株式會社（以下簡稱滿鐵），自此展開殖民満洲的計畫。

但是日本在満洲的經營並非一帆風順，尤其是面臨來自中國內部蓬勃的民族主義浪潮。日本關東軍先是策動第一次満洲獨立運動失利，接著逼迫中國政府簽署《對華二十一條要求》75 引發...
排日論論，中國民間抵制日貨運動更在五四運動時達到高峰，而國際上華盛頓會議與《九國公約》亦對日本的滿蒙政策構成限制。凡此種種障礙，不免危及日本政府在滿享有的特殊地位，看在關東軍的眼裡更是如坐針氈，隨著中國統一態勢的逐漸明朗，軍方擅自暗殺奉系軍閥張作霖，巨料事件的結局卻是加速東三省易幟，滿蒙政策也因而陷入僵局。對此，永田鐵山、東條英機、石原莞爾等陸軍重要幹部，擬定由「擁護滿蒙利益」轉變至「領有滿蒙」的方針，遂於 1931 年 9 月 18 日炸毀柳條湖附近的滿鐵本線，並謊稱此為中國軍隊之舉，藉以擴大佔領滿鐵沿線主要城市，是為「九一八事變」（日文為「滿洲事變」）。

九一八事變過後，關東軍拉攏鄭孝胥遊說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就任元首，以新五色旗為國旗，年號為「大同」，迅速完成建立「滿洲國」的準備工作，隨後日本政府亦率先承認滿洲國。滿洲國雖稱是純粹自發的獨立運動，但政務實際上由關東軍控制的總務廳所把持，重大行政措施與人事任免皆須關東軍的認可，國務院、立法院、監察院等政府組織形同虛設，時人稱此為租借期、取得南滿東蒙土地租借權和所有權、礦山開採權等權益。參見鈴木隆史，前引書，頁 194-208。

同前註，頁 378-388。

坂野潤治著，鍾淑敏譯，《近代日本政治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8），頁 173-176。譯自《近代日本政治史》，（東京：岩波書店，2006）。

鄭孝胥是清末政治人物，負責起草滿洲國國歌與建國宣言，出任滿洲國總理，與日方代表簽訂《日滿議定書》，認可日本在滿特殊地位。關於《日滿議定書》內容，詳見財團法人滿鉄會編，《満鉄四十年史》，（東京：吉川弘文館，2007），頁 433。
「內面指導」體制的「總務廳中心主義」，使得滿洲國猶如關東軍王國。」而受國際聯盟之命前來調查的李頓調查團，亦直接斷定滿洲國不過是日本的傀儡國家，《李頓報告書》的出爐也導致日本政府決意退出國際聯盟。

滿洲國標榜「五族協和」與「王道樂土」等口號，一方面強調漢族、滿族、蒙古族、朝鮮人、日本人的共存共榮，並扶持成立「滿洲協和黨」 宣揚治國理念以安撫當地反滿抗日運動；另方面為了因應日後的總體戰，重視經濟開發工作，引進日本民間資本之外，亦在日本國內鼓吹與獎勵大規模移民，將滿洲塑造成新天地，藉以掩蓋殖民侵略之實。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滿洲國傾全力支援日本對外戰爭，但隨著日本戰情直轉急下，其軍事和統治能力也明顯衰落，而蘇聯對日宣戰無疑是壓垮滿洲國的最後一根稻草。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放送玉音宣布停戰，滿洲國皇帝溥儀旋即宣告退位，歷時十四年的滿洲國也壽終正寢。

針對日本殖民滿洲的發展，後人何以能夠追溯這一段過去？前人在滿洲遺留下來的文字紀錄，可以分為正式文獻（official documents）、個人日誌（personal diary）、鄉野敘事（the peasant
settlers’ narratives）等三种。81 正式文献包括政府文官、企业职员以及学者的论述，个人日志主要是文学作品、日记与信件，提供有别于正式文献的侧面观点，而乡野叙事则涵盖移民者口耳相传的歌谣与记忆。这三种视角旨在反映日本殖民满洲的事实，同时也凸显殖民史并不是个同质发展的过程。82 本章节依循此架构，主张日本殖民满洲的历程和知识论述息息相关，将焦点摆在正式文献，尤其侧重知识界的见解与著作，以此呈现日本满洲观的演变轨迹。

日本对满洲的注意始于满族人入侵中原，知识性的专门论述以荻生徂徕为首，荻生著有《满文考》一卷，旨在收集经长崎港传入的中国或俄国之满文研究资料。83 之后，随着日本开国和近代化压力的与日俱增，德川幕府末期出现若干主张振兴国权的思想家，满洲在他们眼中一跃成为战略要地。吉田松阴是洋学家佐久間象山的学生，他一方面强调学习西方科技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鼓吹汉学与洋学相互补充的可能性。然而，他面对日本节节败


82 Ibid.

83 廖绍煐，*《日本中国学史》*第一卷，（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页 525-555。
退的局面，卻提出「失於俄美者，取償於鮮滿之地」的觀點，
意即日本因被迫與歐美強權簽訂不平等條約所喪失的權益，雖然是無法改變的事實，但卻可以透過侵略朝鮮與滿洲而獲得補償，
從而達到損益相抵的結果。85

吉田松陰的思想日後成為明治政府的指導原則，他的學生木
戶孝允便據此建構「征韓論」；山縣有朋更揭橥著名的「主權線」
與「利益線」一說，他以為：

蓋國家獨立自衛之道有二，第一守衛主權線，第二保護利益線。
其主權線係指國之疆域，利益線則密切關係主權線之安危地
區……當今欲在列國中維持一國之獨立，僅僅守衛主權線絕對
不夠，務須確保利益線。86

因此，滿洲被劃在攸關日本主權完整的利益線之內，不僅提
供日本與西方列強平起平坐的條件，更扮演往後「雄飛大陸」的
關鍵角色。關東軍參謀石原莞爾是左右日本滿洲政策的靈魂人
物，他的戰爭史觀是「最終戰爭論」。石原首先歸納古代至現代
的戰爭，區分為「決戰戰爭」與「持久戰爭」兩類型，87 前者是

84 《日本思想大系・54》，岩波書店，1978，頁193。轉引自史桂芬，《近代
日本人的中國觀與中國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頁
66。
85 同前註，頁63-67。
86 《大日本帝國会志》第1卷，頁469。轉引自史桂芬，前引書，頁109。
87 石原莞爾最初將此兩種戰爭類型命為「殲滅戰爭」與「消耗戰爭」，九一
八事變後才改稱為「決戰戰爭」與「持久戰爭」。詳見石津朋之，《総力戦、
モダニズム、日米最終戦争——石原莞爾の戦争観と国家・軍事戦略思想》，
《戦争史研究国際フォーラム報告書》第二回，（東京：日本防衛省防衛研
究所，2004），頁88。
基於武力價值，而性質上屬於陽性且歷時短暫的戰爭，後者是訴諸武力價值以外的方式，意即政治手段不再是絕對的戰爭，這類型的戰爭歷時長久且性質上屬於陰性。人類戰爭歷史的發展大致是「決戰戰爭」與「持久戰爭」的反覆循環，石原敏銳地觀察到一次大戰時各國迅速動員兵力的能力，使用機關槍與潛水艇等新式武器的現象，預言下一次大戰將會發生以飛機運載炸彈爆擊主要都市的「決戰戰爭」。

「最終戰爭論」認為世界人類文明終將歸於統一，而統一的方式乃是通過日本與美國進行一場最終戰爭，促使這場最終戰爭的條件有三個，第一是東亞各民族的團結，意即成功催生東亞聯盟，第二是完全占據西洋文明中心位置，最後是飛機能夠不著陸而繞行世界一周。為了迎接這場決戰，日本勢必掌握滿洲和蒙古兩個戰略要地，因為此舉在消極面而言能夠確保朝鮮安定，積極面則是牽制蘇聯東進的企圖；但是這不僅因為滿蒙的糧產與礦產等物質基礎足以供應日本未來的戰爭消耗，更重要的是出於滿洲作為東西文明橋樑，承載日、滿、中相互提攜的精神理念，進而組成東亞聯盟並讓日本成為普遍性代言者的樞紐。

無獨有偶，石原莞爾在陸軍士官學校的同學長野朗，為了專

88 小林英夫，《滿洲—その今日的意味》，（東京：拓植書房新社，2008），頁 67-70。
89 張芝瑾，《石原莞爾的中國認知與亞洲觀》，（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2010），頁 44-50。石原莞爾「最終戰爭論」的思想淵源，除了留學德國期間的啟發外，尚有日蓮教的預言，根據日蓮教的理論，最終戰爭將發生在佛祖逝世後的第兩千五百年。參見同書，頁 49。
心研究中國問題而於 1921 年辭退軍職，在九一八事變前後總計出版高達十三本探討滿洲的著作。他認為中日兩國唇齒相依，又猶如飛鳥雙翼，一方削弱另方，自己也無法獨存，因此唯有透過結成「中日合作聯盟」方能永遠和平共處，而滿洲問題則是中日矛盾的根源，也是實現中日合群的關鍵。長野的「滿洲占有論」主張滿洲為日本的生命線，攸關日本民族的存亡，不似西方帝國主義侵佔殖民地之舉無關於自己生存所需，是故漢民族必須停止對滿洲的獨占，讓日本共享這塊樂土，從而達成中日合作的夢想。90

如果說日本戰略思想家的目標是要積極地控制滿洲，那麼東洋學者對於滿洲地位的界定模式，可說是消極地將滿洲從中國分離出去。東洋史學初期的主要特徵是相對化中國史，重視塞外史（中國邊境的民族、區域歷史）以及東西交涉史，這個傾向反映出日本籍由研究各民族歷史，以定位自身在亞洲地位的用意。另外東洋史學也特別關心文明起源的課題，因為當時西歐學者屢屢標榜基督教歷史觀的普遍性，否認東方世界的悠久歷史和特殊性，甚至有斷定東方文化源於地中海的說詞，91 但日本的東洋史學家自認博覽漢文經典又通曉西方理論，故足以站在世界的高點上和西洋學者互別苗頭。

白鳥庫吉的「堯舜禹抹煞論」降低中國經典的神聖性，將儒家思想貶謫為研究客體，也成功讓日本文化擺脫從屬於中國文化

90 劉家鑫，《日本近代知識分子的中國觀》，（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7），頁 160-198。
91 吉澤誠一郎，《東洋史學的形成と中國》，《帝國日本の学知—第三巻：東洋学の磁場》，（東京：岩波書店，2006），頁 60-66。
的宿命，因為兩國文化既然同時系出東洋文化，在地位上也就相互平等。92 白鳥解決中日文化地位問題，也便於堂而皇之地將滿洲、蒙古納入東洋史學的範圍，祛除中國王朝史的論述模式，他更進一步追求「滿洲中立化論」，認為亞洲大陸自古以來即分為南北兩大勢力，北方的游牧民族與南方的農耕民族構成亞細亞的雙元性(dualism)，而兩大集團永無止息的爭鋒依然延續至近代的滿洲，日本為了在俄國與中國的鬥爭中夾縫求生，勢必確保滿洲得以維持中立地位。93 後繼的東洋學者順此脈絡展開「滿洲本非中國領土」的基調，京都帝國大學教授矢野仁一在 1923 年出版《近代支那史》，公然宣稱中國不屬於民族國家，滿洲、蒙古、西藏等地自古即非中國領地，如果中國刻意追求成為民族國家，理應放棄政治上對邊疆區域的控制，並且一併鬆綁歷史上對特定民族的論述。94

從以上分析可知，不論是在戰略思想家或者東洋史學家的心目中，滿洲實際上無法逃脫日本國權主義的陰影，主要充當日本國家發展與擴張的物質基礎而存在。然而，滿洲論述並不全然由國權主義者所獨占，依然可以見到滿鐵調查部的研究員，以及旅
居滿洲的遊人記者，試圖彰顯其精神意義，以下將陳述他們的滿洲理念。

第二節 映射王道樂土理想的滿洲觀

滿鐵設立宗旨是呼應日本帝國主義體制的需要，而 1907 年成立的調查部乃是配合國策以科學方法研究滿洲市場、資源、人口、風俗等項目的調查機關，此後隨著中日戰爭的爆發，調查部的研究範圍亦大幅擴張至華北地區。

滿鐵既屬國策調查機關，即難以與日本帝國主義劃清界線，滿鐵首任總裁後藤新平的思想，透露滿鐵為何被設定為以學術的知識權力服務於侵略行動的政治權力。後藤新平曾任臺灣總督府的民政長官，以懷柔政策處置臺灣的反抗運動，順利完成土地調查、縫貫鐵路建設、糖業政策等事業，爾後受前臺灣總督、日俄戰爭期間滿洲軍總參謀長的兒玉源太郎之邀請，赴任滿鐵總裁。後藤承襲在臺灣的統治經驗，整合成「文裝的武備」論，該理論認為殖民地的統治方式應該「謀求以教育、衛生、學術等文事設施防備他國侵略，一旦發生緊急事件時便於對武力行動提供協助。」95 依照「文裝的武備」原則，除了調查部以外，後藤也接連設立東亞經濟調查局、中央試験所、地質調查所、奉天公所，以及邀請白鳥庫吉擔任滿洲及朝鮮歷史地理調查部主任。

95 後藤新平於「幸俱樂部」的演講（演講日期時間不明），收錄於小林英夫，〈満鉄調查部の軌跡：1907-1945〉，〈東京：藤原書店，2007〉，頁 38。
儘管滿鐵帶有濃厚的日本帝國主義傾向，可是其營運策略並不完全與政府的立場相容，這一方面是因為滿鐵本身同時兼有「國策機關」和「營利企業」的性質，配合國策之餘亦負責任追求利潤的本位責任，使其不免基於營利困難的考量而關閉特定事業。以「燃料國策」為例，為了滿足原油的需要，日本海軍提起「燃料國策」的計畫，並在滿洲推行重化學工業的研發，然而基礎研究過程中發生海軍燃料廠與滿鐵的對立，導致生產燃油的煤液化技術開發案無疾而終。

但更重要的是在另方面，滿鐵與關東軍逐漸產生裂痕的主因仍是旗下的調查員之中，不乏有人秉持抵抗軍國主義的精神，良心反省學術成為帝國主義幫兇的不名譽事蹟，抵抗行動最後招致 1942 年的「滿鐵調查部事件」。

該起事件先後有四十四名調查部研究員遭關東憲兵隊逮捕，理由是涉入共產主義運動，實際上他們所為並不具備犯罪事實，因此憲兵隊根據前一年「北溝型農事合作社事件」所查獲的筆記，捏造證據指控調查部遭到共產主義滲透。野野村一雄指「滿鐵調查部事件」的倖存者，他回憶當時滿鐵內部確實有不少左翼分子（主要屬於「經調派」），但分析事件主因是關東軍以往總把滿鐵調查部當作從屬機關看待，可是隨著調查部逐漸展露其獨立自主性，關東軍越發不能忍受此等離經叛道的行為，又唯恐調查部有成為共產主義溫床之虞，於是決定進行整肅。97 野野村一雄評

96 山本裕，〈事業化された調査—資源・鉱産物調査とオイルシェル事業〉，《満鉄の調査と研究—その「神話」と実像》，松村高夫、柳沢遊、江田憲治 （編），（東京：青木書店，2008），頁 228-230，頁 256-259。
97 野馬村一雄，《回想満鉄調査部》，（東京：勁草書房，1986），頁 229。
価滿鐵調査部最可貴的遺產是對權力的「抵抗精神」，反映追求真理的科學精神，而這種反抗力量的根源是一股不甘受日本政府與軍隊頜指氣使的學者風骨，不願受制於國策指導的期望。不過，除了滿鐵調査部的研究員，從其他旅居滿洲的知識分子身上，一樣可以找到相同的風範與理想。

對於這些學人、記者、藝術家、中國通而言，由於在日本本土欠缺伸張理想的環境，於是他們寄希望於滿洲國，認為滿洲國滿懷現代性的信念與機會，也代表著容納日本經濟發展以及中國民族主義的烏托邦，因此他們對滿洲國「王道樂土」、「五族協和」的口號感到由衷興奮，相信中國農民有朝一日能夠從地主的枷鎖中解放，也能與日本移民和平共處。

「王道」思想源遠流長，在中國儒家的概念裡，王道賦予統治者正當性，以善盡身為天與民之間仲裁者的職責；而大約在一九二〇年代的日本外交
政策，開始將歐美的政治模式比擬為「霸道」，並稱自己的統治原則為「王道」，滿洲國即是王道思想概念化的產物。^{102}

橘樸是這些理想主義者的一員，他素有關懷弱勢的胸襟，他分析中國思想史的發展後得出，儒家乃捍衛統治者的既得利益而道家才是象徵多數民眾的結論，這也能解釋何以日後贊成並投身滿洲國的農民自治運動。橘樸的中國史觀較為看重長期的社會變革過程，而非強調舊日的易姓政治革命，故他將中國歷史分成三個階段的社會革命，分別是春秋戰國至秦朝建立，五代至宋太祖即位，太平天國亂起至今。^{103}有鑑於中國境內昂揚的民族主義對日本在滿洲利益構成威脅，橘樸非但沒有督促政府強行壓制，反而批評主政者一直以來忽略滿洲的普遍性，主張日本的統治應該控制在經濟層面，甚至有必要捨棄移民計畫，^{104}在橘樸曾任總編輯的《滿洲評論》中，也處處可見這樣自由主義的批判立場。縱觀橘樸一生，王道理念作為主軸指導其思想與活動，對此不禁令人好奇，究竟為何王道樂土的美夢能夠讓人如此魂牽夢縈？石之瑜等人認為日本神道的情感需要可以託付的語言，但西田幾多郎

^{103} 山本秀夫，《橘樸》，（東京：中央公論社，1977），頁116-117。
^{104} 陳慈玉，《案牘研究與田野調查：日本東洋史學方法之一面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2，（2003）：頁26。然而橘樸在與石原莞爾會晤後，思想有所轉變，傾向支持建立滿洲國，參見山本秀夫，前引書，頁196-220；以及陳鼎尹，《從王道樂土到中國研究的資料庫——超越帝國主義的滿鐵》，（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頁83。由此亦可知，滿洲的反共產主義官員與反帝國主義學人，長時間處於微妙與弔詭的合作關係，使得彼此的作法與觀念經常有不一致的現象。
所建构的「無的場所」理论说明日本深层的自我认识之中，不存在现形的語言，使得日本必須向外尋求且培養能動性，而滿洲國的肇生與對王道樂土的憧憬象徵著飽滿活躍的動能，恰如其分地提供靜態的神國一種傾訴的對象。

至此可以確認的是，滿洲的空氣瀰漫戰火煙硝味，也散發神聖肅穆的氣息，日本戰前的滿洲觀也因而呈現國權主義與王道樂土的交相輝映。太平洋戰爭結束，滿洲國也走進歷史的塵埃之中，日本會以什麼樣的態度迎送這段歷史？本章第三節將淺介戰後日本對滿洲的研究，以及分析平野健一郎看待滿洲的觀點。

105 西田幾多郎一方面整合柏拉圖的「空間」和亞理斯多德的「基體」，另方面以「判斷」理解胡塞爾（Edmund Husserl）的「意識之野」，據此形成「場所」哲學。「場所」本質上有四種類型：一是「存在根據亦即基體場所」，包含共同體、無意識、固有環境等問題，係作為意識性自我的存在根據或基體的場所；二是「作為身體性東西的場所」，此概念在「自身」這個範疇上和第一種概念重合，但也包含了面向世界而作用的自我精神意識；三是「作為象徵性空間的場所」，意指在社會空間之中形成的固有地盤，相對於宗教的神話空間；四是「作為隱藏論點和議論之處的場所」，從辯證法的演變中考證得出，隱匿的場所越明顯，隱匿之物就越易被發現，可見創造確切理論對於考察發掘具體問題的重要性。參見中村雄二郎著，卞崇道、劉文柱譯，《西田幾多郎》，（北京：三聯書店，1993），頁50-58。譯自《西田幾多郎》，（東京：岩波書店，1983）。

106 石之瑜、黃威霖、張芝瑾、黃鈺淳、陳鼎尹、黃欣婷，〈在中國的滿洲看見西田幾多郎的場所：兼與泰戈爾文明觀的比較〉，《政治科學論叢》，48，（2010）：頁124-126。
第三節  在滿洲發現抵抗霸權的能動性

滿洲戰前的榮景雖然灰飛煙滅，可是仍然牽絆代代日本人，曾經在滿洲活動的人們更以撰寫回憶錄方式繼續緬懷之。滿洲體驗大抵可以區分為「被害者物語」及「加害者物語」，前者包括敗戰後逃難者和滯留中國的日本人，特別強調因國家而犧牲的無奈與情操，總是能喚起人們的感傷跟認同，後者則是戰後歷史研究的主流，主要是批判殖民的啟蒙角度。107 井村哲郎認為，戰後初期回憶錄的共通之處在於正當化滿洲國的理念，將日本對滿洲的統治視為一種夢想，以懷舊的情趣進行記述，108 內容大致以被害意識描述自身體驗，儘管可信度尚稱屬實，不過如欲藉此尋求普遍化意義可謂緣木求魚。

另方面終戰後的日本中國學界，瀰漫一股反省戰爭的氣氛。例如戰時以中國農村調查研究馳名學術界，並公然稱頌日本作為亞洲盟主正當性的平野義太郎，於 1946 年 10 月成立「中國研究所」，開啟日本戰後區域研究系譜，直言日本應徹底反省戰爭責任。

107 豐田裕介，《想起される満洲－岐阜県郡上村開拓団を事例として》，《「満洲」：記憶と歴史》，（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7），頁 99-101。
任，期望一改過往服務於侵略政策的不名譽歷史。而相較於東洋學，區域研究具有快速並系統性地學習當地知識、對各地社會與文化進行整體性把握、對各文化抱持無優劣之分的認識等優點。

此後一九六○年代對於殖民地歷史的回顧，歸功於史料發掘和資料翻印工作的進行，研究環境獲得大幅度改善，深化地方自治、經濟水平、文藝作品等各項滿洲研究課題，這段期間有野村浩一、毛里和子、平野健一郎、松村高夫等人的實證論文相繼發表。爾後一九九○年代的日本學界更以「殖民地史」的研究手法，關注臺灣、朝鮮、滿洲等殖民地，形成以掌握帝國版圖之整體關聯的「帝國史」研究。駒込武認為「帝國史」的觀點對殖民地研究可能帶來四點啟發，分別是：(1) 使研究者擺脫過去以殖民母國和殖民國關係為焦點的觀點，轉而通過整體帝國版圖來尋求帝國內部的聯繫；(2) 審視殖民地是否對殖民母國具有影響力；(3) 研究視野不再侷限於經濟史的範疇，逐漸著墨在政治史與文化史；(4) 日本史、日本人、日本文化等概念並非不證自明，可以解構與重新建構。

從以上第三點可知，近年來日本近代殖民地史的研究取向，

109 轉引自陳姃湲，前引文，頁 4。但是陳姃湲也指出「帝國史」雖然是反省以日本為中心的態度，但其框架仍不免設有隱藏的陷阱，導致臺灣史、滿洲史淪為為了日本人而生的歷史研究。
逐漸集中在殖民地的「文化」與「學知」層面，認為當時日本的人文社會學科深受帝國擴張之影響，因此如欲明白當時政治侵略行動的本質，從「文化」或者「學知」的視角切入，能夠提供嶄新的學術貢獻。平野健一郎大致依循此一動向發表關於滿洲的論文，他最重要的滿洲著作是哈佛大學博士論文：《滿洲國歷史背景之研究：1906-1931年間的在滿日本人》（_The Japanese in Manchuria 1906-1931: A Study of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Manchukuo_），其他尚有滿族的歷史、滿洲國性格的形成、滿洲國協和會的開展等主題散見各期刊。

整理這些文章後發現，「敵對性文化觸變」的概念一直在他滿洲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特別用來解釋中日文化因接觸後彼此都發生變化的現象，而滿洲則是扮演支撐變異產生的空間場所。例如平野觀察滿洲國的性格是如何形成的問題，他以「滿洲青年聯盟」為研究對象，指出滿洲因大量日本人移居而特殊化，逐漸滲入日本的意志，導致當地中國人與日本人摩擦鈍增，為了消弭兩種文化的衝突而提出「民族協和」的理論。但是平野認為這個主張可以再細分為五種要素，不同面向的關係構成相異的訴求與目的，此五種要素分別為：（1）日本文化的統治；（2）「共存共榮」及「日華和合」；（3）日本政府特殊權益保障；（4）日本在滿蒙的民族發展；（5）滿蒙自治制。114

113 松村高夫、柳沢遊、江田憲治，〈満鉄の調査・研究活動の問題性と本書の立場〉，《満鉄の調査と研究—その「神話」と実像》，松村高夫、柳沢遊、江田憲治（編），（東京：青木書店，2008），頁6-9。
114 平野健一郎，〈満州事変前における在満日本人の動向—満州国性格形成の一要因〉，《國際政治》，43，(1972)：頁60。
第一章 日本滿洲殖民研究立場變遷

第一種想法（1→2）是由滿鐵與關東軍近代化的效率行政為基礎，加上在滿日本人的善意，對其他民族施加恩惠，促成日華和合的理想。第二種（2→3）是以確保日本在滿蒙特殊利益為優先考量，如此一來日華和合方有可能。第三種（3→4）是日本民族的存續與其在滿特殊利益密切相關。第四種（4→1）乃是以為隨著日本文化基盤的擴展，能夠直接促進日本民族的發展。衡諸事實可知，歷史最後選擇了滿洲獨立的選項，關鍵因素是中國民族主義的昂揚危及第一至第四種盤算，使得關東軍在滿洲事件之際，轉而利用滿洲青年聯盟「民族協和」的理想，滿洲國性格的形成變成以自治為巧目，日華和合為號召，遂行日本文化統治為終極目的之脈絡（5→2→1）。

申言之，在平野的思考裡，中國民族主義是「敵對性文化觸變」的觸媒，尤其重視「抵抗」的作用力，而他的博士論文以及日後的相關著作中，也經常表示滿洲的抗日運動朝著「文化」的次元延伸。比方說針對 1923 年的「旅大回收運動」，他以為日本經濟實力已經滲入滿洲的肌理，中國人鼓吹的抵制日貨行動很難成功，反倒是 1924 年滿鐵附屬地的「教育權回收運動」使

115 同前註，頁 69-70。
116 「旅大回收運動」的緣起是俄國強迫中國租借關東州，租借期為 25 年，但日本承繼俄國特權後延長至 99 年之久。1923 年是原租借期屆滿年限，中國北洋政府明知廢約不可行，但仍極力求修改的可能性，中國民間響應政府組成各項後援組織並鼓動抵制日貨。該起運動因 1923 年 9 月 1 日日本關東大地震而稍緩，各界呼籲暫時停止抵制日貨，而北洋政府的捐款占世界各國的多數。且更在第一時間派遣軍艦運送糧食於日本，詳見平野健一郎，《1923 年の滿洲》，《近代日本とアジア：文化的交流と摩擦》，平野健一郎（編），（東京，1984b）：頁 235-254。
日本當局有所顧忌。由於滿洲的中國人憂慮日本在租借地強行推廣日式教育，嚴重侵蝕中國青少年的國民性與國家概念，遂發起回收教育權的運動；同時，中國國民黨亦在教科書中加入日本入侵的教材，在不利日本的統治，117 自此以後滿洲抗日運動加入文化層面的新因子，也迫使日本政府思考文化融合的方針。

除此之外，「抵抗」的結果也在性質上與目的上皆導入了「自主」意義。平野提及在滿日本人漸漸與日本本國疏離，他們在滿洲被中國人敵視，又感受內地日本人的差別歧視，承受宛如繼子般的對待，例如二十萬人口的在滿日本人居然在本國連一席代議士的資格都無法享有！對此，在滿日本人不甘本國政府對滿洲居民的冷漠，於是滋生滿洲獨立的念頭，118 而「民族協和」、「日華和合」的標語正好開放與其他滿洲族群結夥的機會，滿洲獨立建國的路線可謂一了其內心深處的宏願。滿洲青年聯盟的成員後來大多進入「滿洲國協和會」的體系，希望將滿洲國建設成一個非國家主義、非中央集權、非資本主義、非民族主義的國家；不過一般認為滿洲國協和會是個國家動員組織，被關東軍用以粉飾複數民族國家中族群對立的工具，增強其統治正當性，而代表各族群利益的功能是相對薄弱許多。平野不諱言也略感遺憾地表


118 平野健一郎，〈満州事変前における在満日本人の動向—満州国性格形成の一要因〉，《国際政治》，43，(1972)：頁 65-68。
示，高峰時擁有多達兩百八十九萬會員的滿洲國協和會，主要是日本政府與關東軍評估需要另一個政治權威，卻又刻意不讓其具備實質政治權力的考量所致；而且平野亦注意到，滿洲國協和會帶有濃厚的日本文化特性，具有強調單一、調和的傾向，否定內部異質性與避免鬥爭，在分裂的事實上製造統一的表象，決策過程充滿「民主制峻拒」的特色，猶似於當代的一黨專政體制。119

審視平野的著作，「抵抗」的精神可謂貫穿其滿洲觀的主軸，而「抵抗」對於近代日本的意義可以回溯至竹內好的理論。竹內好關心亞洲與日本的主體性，向來反對以西方作為價值觀參照系的立場，他從魯迅「掙扎」的文學作品中看出近代中國抵抗西方的能動性，由於中國保持對西方的抵抗故能使自我屹立不搖，呈現一種向內運動的「回心文化」；但是日本缺乏保存自我的欲望，日本文化像是優等生般一直以模仿而非創造的步調向西方學習，只想更換主人而非要求獨立自主，屬於一種不存在抵抗的「轉向文化」。120 如果說竹內好旨在為日本找尋一股足以敦促自身成長，卻又不致於泯滅自我的機制，那麼平野健一郎亦不遑多讓，他不但看出中國人抵抗外侮的民族主義匯聚成反帝國主義的能量，讓中國得以從帝國轉型成民族國家，121 也醞釀抵抗日本軍國主義的

119 同前註，頁 280-281。另外，關於滿洲國協和會歷年會員數目，以及各族群代表比例統計，詳見平野健一郎，同論文，頁 268。
120 竹內好著，李冬木、趙京華、孫歌譯，《何謂近代—以日本與中國為例》，《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聯書店，2005），頁 200-219。譯自〈近代とは何か（日本と中国の場合）〉，《竹內好全集》第 4 卷，（東京：筑摩書房，1980）。
121 平野健一郎，《国民統合研究の発展のために》，《近代日本とアジア：文
動力，而在滿日本人同樣企圖抵抗軍國主義的宰制，追求屬於自身價值的解放。更重要的是，滿洲透過中國與日本、民族主義與軍國主義「對性文化觸變」的過程，融合出一個新的文化體系，而無論滿洲國充其量是否只是個傀儡國家，「對性文化觸變」的劇場生動地攪動傳統漢族與軍國日本覆蓋的視野，重現了滿洲的主體性。

平野通過「抵抗」與「對性文化觸變」重現滿洲的主體性，但是此舉目的與其稱之為重蹈戰前與戰時東洋史家和軍事戰略家的覆轍，企圖將滿洲從中國分離出去，不如說是平野發覺戰前滿洲的處境與戰後日本的困境具備雷同之處。因為平野本人及其家人缺乏遊歷滿洲的實際經驗，戰後日本也喪失進出滿洲的條件，他接觸滿洲的因緣毋寧是受到竹內好的影響，而安保鬥爭運動所揭露日本一舉一動無不受美國左右的局面，豈不等同滿洲遭到日本軍國主義者箝制的狀況？因此，平野祛除由日本國權主義把持的滿洲觀，等於化解美國君臨日本的巨大陰影，也藉此消弭日本自身為「非正常國家」的國家困境。

第四節 『去國家』的滿洲論述軌跡

本章以日本的滿洲觀為主軸，抽繹出以「抵抗」作為機制的時序路徑。日本的滿洲觀最初以國權主義為原型，誘使日本走上
侵略的道路，爾後知識分子覺醒並試圖以王道樂土的理想矯正日本近代發展的歧途，甚至連遠在臺灣的蔡培火也受其啟蒙，他眼見東洋魂逐漸被西洋功利主義所吞噬，體悟到唯有王道樂土才是東亞和平的根基，因此他開啓了向日本政府要求設置臺灣議會的民族運動。然而，軍國主義者與理想主義者的關係錯綜複雜，有些人無懼地發起抵抗，有些人寧願採取不合作運動，更有些人在合作之餘伺機影響政府與關東軍的決策，不論如何滿洲的意義已栩栩如生地矗立在歷史洪流中。

戰後日本的滿洲研究有著多面向的發展，率先問世的是舊滿洲居民的懷舊文學，回憶錄之類的作品由於作者背景各異其趣，較難在此概括論定其價值取向；但是學術界的研究卻大有可觀之處，其中平野健一郎嘗試以「文化」的觀點剖析關於滿洲的各項主題。承襲本文第二章的分析，滿洲之所以能成為「文化觸變」的場所，在於每個獨立的個體都是文化的搬運者，因此能夠自由地跨越國家疆界，與其他文化搬運者互動，尤以「抵抗」的行為更能發揮「文化觸變」的效果。此外，「文化」研究的視角同時也解放了日本戰前軍國主義的魔咒，蓋依附與圍繞著國權主義的種種思維，難免背負為虎作倀的宿命，同時也能避免與否認滿洲

122 關於蔡培火的思想，詳見顏欣怡、石之瑜，《青年蔡培火的身份論述—日本大正思潮下的臺灣意識》，（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2007）。

123 日本法西斯主義在九一八事變後急速膨脹，但期間仍不乏有本土與海外的知識分子對政府展開抵抗，抵抗者計有政黨與議會人士、包含矢內原忠雄在內的自由主義者、評論家與民間名人等類型，詳見橋川文三，《抵抗者の政治思想》，《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Ⅱ》，橋川文三、松本三之介（編），（東京：株式会社有斐閣，1970），頁399-414。
國正當性的中國正面交鋒，故「文化」的分析單位在先驗上能夠代替「國家」擺脫這段不堪回首的記憶與爭執。尤有甚者，戰前滿洲迫於日本淫威的處境也投射出戰後日本屈服美國的難言之隱，平野透過賦予滿洲自主精神以恢復日本理應享有的主體性。

因此，平野健一郎面對戰前國權主義者、理想主義者以及戰後研究者的滿洲論述，選擇一條「去國家」的軌跡，好似要從被軍國主義綁架的國家觀中掙脫出來，以此為契機、起點，避免滿洲成為中日兩國主權與領土問題的混戰焦點，並且重新喚回日本的主體性。不過，滿洲並不是平野學術生涯的唯一重心，近年來他轉而投入「東亞共同體」的研究，本書將於下一章檢視這個新發展。
第四章 日本東亞共同體思想沿革

第一節 超克中國民族主義的東亞協同體理論

近代東亞國際秩序處於劇烈轉型的階段，以天子為中心，藉由冊封與朝貢體制維繫治理權威的中華華夷秩序崩毀，而以主權國家為要角，藉助殖民體制對外擴充現代文明的西洋帝國秩序儼然成形。日本在風雨飄搖的世紀中勵精圖治，由於西洋帝國秩序帶給日本屈辱的半殖民地體驗，為了改正不平等條約與受限的國際空間，日本政府積極仿效歐美先進國家工業化道路之餘，民間亦逐漸興起「一系列聯合亞洲各國抵抗外來殖民主義者的政治思想」，統稱為「亞細亞主義」（Asianism）。124

亞細亞主義是日本近代「共同體思想」（community thinking）的雛形，按照先後發展順序分類，可以區分為三種類型：第一階段從 1878 年「振亞會」成立起至 1898 年「東亞同文會」創立止，以主張亞洲是命運共同體的「亞細亞連帶論」為主要特色，是為「古典亞細亞主義」；第二階段是 1898 年至 1928 年間的「大亞細亞主義」，側重擴張領土的大陸政策；最後階段是 1928 年至 1945

124 王屏，《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頁 34。
年淪落至侵略亞洲口實的「大東亞共榮圈」。\(^{125}\)若依照對待亞洲的態度分類，亞細亞主義基本上有兩股分支，分別是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論」，以及岡倉天心的「亞洲一體論」。前者展現日本必須脫離亞洲鄰國，追隨歐美強國腳步的進化論史觀，後者則倡導亞洲作為世界文明的一大體系，富有「愛」與「美」的精神價值，而日本具有亞洲文明博物館的歷史使命。\(^{126}\)岡倉天心的論點也深深影響了印度詩人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泰戈爾表明由於結識來訪印度的岡倉天心，讓他意識到一種「亞洲心靈」的存在，瞭解佛教思想澤披的亞洲各國，有別於重視物質享樂的西方文明，足以為全人類帶來黎明曙光。\(^{127}\)

依照陳建廷與石之瑜的整理，亞細亞主義的落實，從主張亞洲應團結對外的「興亞」意識出發，包括創始「振亞會」的大久保利通、後繼成立「興亞會」的曾根俊虎皆表達中日提攜，以及亞洲各國平等合作共度難關的想法；但隨著日俄戰爭與甲午戰爭的結束，日本開始展露身為亞洲盟主的姿態，1890年於上海創立的「東亞同文書院」，雖然宣稱目標僅在推動教育與文化層面的改革，卻也昭示日本官方指導中國未來走向的願望。\(^{128}\)爾後，「興

\(^{125}\)同前註，頁 8-15。

\(^{126}\)孫歌，《亞洲意味著什麼—文化間的「日本」》，（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1），頁 25-34。

\(^{127}\)黃威霖，《文明差異與現代性—泰戈爾的政治理想及其對中國文明的期盼》，（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頁 64-65。

\(^{128}\)陳建廷、石之瑜，《中日合群？日本知識界論爭「中國崛起」的近代源流》，（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2007），頁 33-40。
亞」和「脫亞」的思想脈絡屢經波盪更迭，最終輸出「東亞新秩序」的政策綱領，1931 年九一八事變即標誌日本決心揚棄中華華夷秩序與西洋帝國秩序的轉捩點。129 日本於事變後決意退出國際聯盟，自此展開對西洋帝國秩序的批判論述，試圖支撐一種東亞新秩序的廣域秩序理論遂逐漸浮上檯面。130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政府對知識分子雙管齊下，一方面嚴加監管言論，迫使學者轉向替侵略政策辯護，另一方面吸納學界菁英充當智囊團，其中於 1933 年 12 月創立的「昭和研究會」是與時任日本貴族院議長，後來三度組閣的近衛文麿最為親密的研究團體，任何政策構想有很大機會通過這個管道獲得實現。昭和研究會發起者為後藤隆之助，乃近衛文麿的友人，研究會宗旨在於「根本改變日本在世界上的經濟、政治地位，綜合朝野所有的智慧和經驗，實行朝野一體的總動員，樹立真正的國策。」131 研究會每週舉辦例行會議一次並撰寫報告，將研究成果傳遞給相關團體與社會大眾，影響力不容小覷，主要成員計有蠟山政道、三木清、尾崎秀實等人，儘管成員皆是兼職，並未領取實質報酬，仍然熱情不減地辯論與發表著作。132 昭和研究會活動延續至 1940 年 11

129 松浦正孝，〈一國史，二國間關係史からアジ広域史〉，《国際政治》，146，(2006)：6-8。
130 酒井哲哉，〈「植民政策学」から「国際関係論」へ一戦間期日本の国際秩序論をめぐる一考察〉，淺野豊美、松田利彦（編），《植民地帝国日本の法的構造》，（東京：信山社，2004），頁 15-17。
131 史桂芬、王柯，〈從昭和研究會看日本戰爭中的知識分子〉，《抗日戰爭研究》，2，(2008)：頁 54。
132 同前註，頁 55。
月併入「大政翼贊會」之準政黨組織為止，這段期間對日本未來數年國策最重要的理論莫過於「東亞協同體」。（關於東亞協同體理論工作分擔，可參考圖 4-1）

對外關係: 永井省三 (外務省)、伊藤達史 (外務省)

國內政治: 蠟山政道、佐佐弘雄、矢部貞治 (東大教授)

民族主義: 三木清、三枝博音

基本構想: 蠟山政道、三木清

政治思想史基礎: 蠟山政道、內田繁隆 (早大教授)

大陸問題: 尾崎秀實、蠟山政道、平貞藏 (法大教授、橘樹 (滿鐵))

經濟問題: 笠信太郎 (朝日新聞)、岸本誠二郎 (法大教授)

資料來源: 今井隆太，〈東亜協同体論と知識人—新明正道東亜協同体の理想の位置〉，《ソシオサイエンス》(Waseda Review of Socio-science) 第 6 期，(東京: 早稲田大学，2000)，頁 315-331。

圖 4-1：東亞協同體理論工作分擔示意图

東亜協同體構想的淵源可以回溯至亞細亞主義的思想潮流，期間出現包括樽井藤吉「大東合邦論」以及石原莞爾「東亞聯盟論」等主張，但其興起的契機卻是九一八事變後，中國民族主義帶給日本與日俱增的壓力，如何妥善處理該課題，深為當時日本政府與知識分子所關切。對於日方回應中國民族主義運動的方
式，松本三之介勾勒出兩種類型：其一是「民族主義超克論」，
其二是「民族主義發展論」。134 蠻山政道與三木清屬於第一種類
型，兩人期望藉由地域主義和東亞文化的創始，消弭中日民族的
雙雙對立局面。具體而言，國際政治學者出身的蠻山政道曾為昭
和研究會草擬綱領，並在 1938 年 9 月於《改造》雜誌上發表〈東
亞協同體理論〉，後續在同雜誌上發表〈國民協同體的形成〉、
〈世界新秩序的展望〉，鼓吹成立東亞協同體，並揭示其本質乃
是「區域的命運協同體。」他表示：

東洋能夠成為區域協同體的動因，首先是精神以及心意，意即
民族的地域命運意識（Raumschicksal）之產生。支配民族存在
的命運，必須伴隨與特定地域結合的意識。而東洋民族的生存
與復興，乃是基於東洋地域的和平及建設而感知生活本能的命
運意識。135

蠻山訴諸跨國合作的「區域主義」，理論上是為了摒棄一民
族、一國家的西方主權國家秩序，實際上是因為歐美民族主義思
潮激發中國抗日能量，妨礙日本在華利益。但蠻山認為日本與其
強碰中國民族主義，不如迂迴取道東洋一體的連帶意識，一旦日
本、中國、滿洲國在東亞的名目下整合為有機體，國家間爭端便
能迎刃而解。136 接著，蠻山定義三項東亞協同體實體特徵：（1）
由日本、滿洲國、中國組成聯合體制機關、（2）中國須以中日

134 松本三之介，《近代日本の中国認識—徳川期学から東亜協同体論まで》，
（東京：以文社，2011），頁 264。
135 同前註，頁 230。
136 William Miles Fletcher, 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tellectuals and Fascism in
提攜、防共精神、東亞區域命運意識為首要目標，故應排除本質上無法配合的國民黨與共黨勢力、（3）中國應就當前管轄區域，竭盡可能組建為聯邦組織。這三項規定後來成為日本與汪精衛政權交涉的參考依據。蠟山顯然認為一旦東洋能夠在感知生活本能的命運意識基礎上形成新秩序，那麼世界將可打破由西洋帝國主義壟斷的局面，創造數個區域並存的新秩序。

三木清以京都學派哲學家之姿跨足昭和研究會，他同樣鄙視民族主義的排他性，但在辯證思維的脈絡中，民族主義代表一種尚待克服的對象，是辯證過程的起點，而區域主義則居於民族主義的對立面，在超越的同時又容納個別民族的個性與自主性，兩者最後匯聚為以「東亞民族協同」為前提的東亞協同體。換言之，中國民族主義固然有害於東亞整合，但以之為辯證開端的東亞協同體卻有益於創造適合東亞自身的國際秩序。在三木清看來，蘆溝橋事變恰為超克中國民族主義的契機，其意義「在空間上是東洋的統一，在時間上是資本主義問題的解決，」此後中國人務須體會日本乃是為了幫助中國從帝國主義手中解放。

針對東亞協同體的基礎而言，三木清認為東亞統一之前提乃是創造一種「全新的東亞文化」，而這個東亞文化同時繼承東洋傳統的文化，也吸納近代西洋的文化。他比較了東西洋文化的差

137 小林啓治，《國際秩序の形成と近代日本》，(東京：吉川弘文館，2002)，頁 231。
138 三木清，《東亜思想の根拠》，最初刊載於《改造》1938 年 12 月號，現收錄於《三木清批評選集—東亜協同体の哲学》，（東京：書肆心水出版社，2007），頁 14-15。
第四章 日本東亞共同體思想沿革

異，指出西洋文化是「人類主義」，而東洋文化是「自然主義」，而且前者強調自然與人類的對立，但後者卻重視兩者的和諧；然而不論是西洋或東洋皆具有人文主義的特色，西洋人文思想的根基是「人類」，東洋則為「無」、「天」以及「自然」，而西洋人文主義的特色是個人主義，東洋則是人倫關係，透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由近至遠模式，達成社會合理的秩序，呈現王道政治的價值。139 對三木清而言，東洋與西洋文化都屬於世界史的一部分，而全新的東亞協同體文化必須超克西洋的自由主義，同時擺脫東洋的封建陋習，方能在保留其特殊性之餘，又能彰顯世界的普遍性價值。因此三木清日後乃致書鼓勵汪精衛呼應日本東亞新秩序建設運動，並強調中日兩國背負協同、共組東亞協同體的歷史義務。140

另方面，要求日本政府正視中日兩民族早已存在的社會與人種同一性，再漸漸實現融合政策的主張統稱為「民族主義發展論」，代表人物是社會學家高田保馬。高田保馬自滿洲視察旅行歸國後，有感於西方霸權的宰制，造成東亞人民自由遭受剝奪，民族生命不受尊重之苦，決心為了東亞的存續發展而建構一種廣域的、超民族主義的「東亞民族主義」。他首先辨明兩種意義的民族主義：（1）排他發展的民族主義，乃徹底的集團式利己主義；（2）自衛互讓的民族主義，乃追求自身民族發展的同時，

139 三木清，1939，〈東洋文化と西洋文化〉，最初刊載於《アジア問題講座》第十巻，現收錄於三木清，《東亜協同体の哲学—世界史的立場と近代東アジア》，（東京：書肆心水出版社，2007），頁190-192。
140 同前註，頁231-234。
亦認可他民族的生存權，允許各自特有個性的發揮。\(^{141}\)

高田認為東亞民族主義具有三條紐帶，分別為同血（血液接近）、同文（文化類似）以及同地（住域鄰接），東亞民族主義以追求東亞的自衛，從白人霸權手中解放為目標，既追求自尊亦要求自律，所以屬於自衛互讓的民族主義。\(^{142}\) 然而關於東亞民族出現的關鍵，高田並不認同蠟山政道的「地域主義」，因為如果採用地域作為組成東亞協同體的標準，何以居住在西伯利亞東部的俄羅斯人無法納入東亞協同體的範疇呢？高田接著指出其倒果為因的論證謬誤，東亞國家真正要追求的理想是「東亞團結」，先有團結之實後方有共同之意識，換言之，東亞協同體本身僅是手段而非終極目標。\(^{143}\) 高田保馬在批判地域主義的同時，卻又更深入地建構東亞民族出現的根基，\(^{144}\) 是故比起地緣關係，同文同血的臍帶顯然更具指標性意義，而東亞諸民族儘管表面上分立，卻因具備此種潛在的紐帶而有成就「東亞民族」之可能，中日兩國歷來的紛紛擾擾也將成為過往雲煙。

\(^{141}\) 高田保馬，1939，〈東亜主義と東亜文化〉，《東亜民族論》，頁124-245。轉引自松本三之介，《近代日本の中国認識—德川期学から東亜協同体論まで》，（東京：以文社，2011），頁259。

\(^{142}\) 村村昭二，《高田社会学における東亜社会論—人と思想を中心として》，《現代社会学研究》第九卷，(1996)，頁45、頁52。

\(^{143}\) 今井隆太，《東亜協同体論における理想主義》，《名古屋学芸大学研究紀要—教養·学際編》，5，（名古屋：名古屋学芸大学，2009），頁70-73。

\(^{144}\) 藤川賢賛譽高田保馬的民族論有接近國家主義的特色，主因是為了守護民族與加強團結，但仍不免利用國家的力量，詳見藤川賢，《高田保馬における社会学理論と民族論との関連》，《社会学評論》，43，(4)，(1993)：頁421-435。
身兼日本中國通與情報員的尾崎秀實則是東亞協同體理論的落實者，尾崎活躍於 1937 年 7 月中日戰爭爆發至 1941 年 10 月因間諜案遭日本軍部逮捕為止，這段期間也是其中日戰爭論、東亞新秩序論、對中和平工作的全盛期。尾崎認為東亞協同體論述的濫觴，是對中國民族主義的再認識，日本因此體認到單憑力量無法破除中國抗日；相對地，東亞協同體論支持日本抑制西洋帝國主義，掃蕩帝國主義根源的資本主義。他首先在 1938 年夏天開始聯繫汪精衛代表的第三勢力，期望透過他拉攏國民政府要角與軍閥，然而事與願違，不僅少有人響應，甚至汪本人也遭開除黨籍。隨汪精衛出走後，再透過與其主政之南京國民政府協作，展開對蔣介石重慶政府之斡旋，可是礙於後者堅決抵抗而未能如意。他聯合中國社會主義革命，提出以日本為龍頭對東亞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理論，可謂東亞協同體的思想「臨界點」，然而身為實踐者的尾崎秀實，無法扭轉日本帝國主義，僅能目睹東亞協同體被大東亞共榮圈論述所吸納。

第二節 壟斷「世界史立場」的大東亞共榮圈

近衛文麿內閣於 1937 年 6 月第一次組閣之際，定調新政府

藤井昇三，《尾崎秀実の日中戦争観—民族運動・東亜新秩序論・汪兆銘工作を中心に》，今井清一、藤井昇三（編）, 《尾崎秀実の中国研究》,（東京: アジア経済研究所，1983），頁 191-194。

白永瑞，《東亞地域秩序：超越帝國，走向東亞共同體》，《思想：天下、東亞、臺灣》,（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頁 137-138。
的對外政策是「尋求以國際正義為基礎的真正和平」，而為了落實國際正義，應該朝確保獲得資源的自由、開拓通路的自由、勞力移動的自由等三方面努力，因此自詡日本的大陸政策可謂基於國際正義的正當性基礎。147 然而新政府甫成立不到一個月即爆發盧溝橋事變，面臨抗日運動排山倒海而至，因此，近衛文麿再於 1938 年 11 月明確提出「東亞新秩序建設」，復以國際正義為名，將矛頭轉向歐美列強，強調維持現狀無異坐實歐美殖民統治，日本沒有義務照單全收不公平的國際秩序，而當前世界之所以躁動不安，乃因國際正義無法充分實現之故。近衛進而倡導中日攜手復興東洋文化，催生第二次「近衛聲明」：148

此種新秩序的建設，乃是日本、滿洲、中國相互提攜，以政治、經濟、文化等互助連環關係的樹立為基幹，追求東亞的國際正義、防止共產勢力、創造新文化以及實現經濟結合等目標。此為促進東亞穩定、世界進步的根基。149

東亞新秩序論最終具體化為「大東亞共榮圈」的國策，在 1940

---

147 庄司潤一郎，《日中戰爭の勃発と近衛文麿「国際正義」論—東亜新秩序への道程》，《國際政治》，91（1989）：頁 39。
148 第一次「近衛聲明」是在 1938 年 1 月 16 日，向蔣介石表示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敵手，就此調整兩國關係，第二次於 1938 年 11 月 3 日發表〈東亞新秩序建設〉論，第三次在 1938 年 12 月 22 日重申對中外交方針為「善鄰友好、防同防共、經濟提攜」等三原則。其中第二次與第三次聲明之間，日本設立掌管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等事務的「興亞院」。參見後藤乾一，《アジア太平洋戦争と大東亜共栄圏》，《東アジア近現代通史》第 6 卷，（東京：岩波書店，2011），頁 1-41。
149 松本三之介，《近代日本の中国認識—徳川期学から東亜協同体論まで》，（東京：以文社，2011），頁 227。
年 8 月 1 日的官方記者會上，松岡洋右外務大臣首度使用「大東亞共榮圈」一詞，他表示當前外交方針必須把握皇道精神，建立以日本、滿洲國、中國為主的大東亞共榮圈，範圍包含日本本土及其在朝鮮與臺灣等殖民地、滿洲國、中國以及東南亞的泰國、緬甸、法屬印度支那等處。此前，昭和研究會提出的東亞協同體理論雖有助於紓解日本外交困境，無奈一年多後便迅速被吸收至大東亞共榮圈的國家目標中。京都學派哲學家的背書尤其發揮推波助瀾的作用。

「京都學派」之名始自戶 潤 1931 年的論文〈京都學派的哲學〉，該學派成員背景多元，除了與開山祖師西田幾多郎的關連外，大致有六項共通特徵：（1）發揚禪學、（2）擁有京都大學的教職或與京大的合作關係、（3）對決西洋思想的同時，又繼承且積極開發東洋思想、（4）確信妥善安排東洋與西洋正當地位的「世界史立場」、（5）重視佛教傳統、（6）運用「絕對無」的概念，此點乃京都學派最重要的特色，猶如一張身份證書。

京都學派與日本軍國主義的關係千絲萬縷，對於政府的態度基本上可區分為三種類型：（1）直接參加昭和研究會傳達思想，代表者是反戰不成而於獄中病死的三木清、（2）秉持非戰的白
由主義，但勢單力薄而不得不向現實權力低頭退讓，（3）透過文字散播「世界史立場」與「近代的超克」理念，證成日本位居反帝國主義的亞洲盟主地位，此派人士大多在戰後遭受「公職追放」處分。最後一派哲學家可稱為「世界史哲學派」，屬於狹義的京都學派，首要事蹟為高坂正顯、西谷啟治、高山岩男、鈴木成高等核心人物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後舉辦「世界史的立場與日本」、「東亞共榮圈的倫理性與歷史性」、「總體戰的哲學」三場座談會。之後舉行的「近代的超克」座談會，則由文學界主辦，並邀請京都學派哲學家、浪漫主義作家等跨學科背景專家，接榫「超克近代」的思想戰爭，這兩場座談會有諸多思想共通處，相互關連與補充，中央公論社在1943年集結出版《世界史的立場與日本》，該書流傳坊間並大獲好評，甚至驚動軍方審查單位，而間接導致《中央公論》在1944年遭勒令停刊處分。

第一場座談會辦在1941年11月開戰前夕，指出由於歐洲深

族的主體性。高坂認為民族由歷史所創造，具有自我限定的歷史地位，以此支持日本領導諸民族的論述；三木主張民族在自然中形成，擁有自我保存的本能，故坚持諸民族的平等地位，並反唇相譏高坂「難道可以其他民族為媒介，甚至消滅之，來完成自身使命嗎？」詳見吉田傑俊，《「京都學派的哲學」—西田、三木、戶坂を中心に》，（東京：大月書店，2011），頁259-263。

154 同前註，頁43-44。
155 竹內好著，李冬木、趙京華、孫歌譯，2005，《近代的超克》，《近代的超克》，頁292-357，北京：三聯書店。譯自《近代の超克》，《近代日本思想史講座》第7卷，東京：筑摩書房，1959），頁294。
陷精神危機，日本的世界史意識逐漸高漲，第二場辦在 1942 年春天戰爭告捷之際，旨在強化日本帶領東亞的自覺，1942 年 11 月舉辦的第三場是日本海軍於中途島戰役遭受毀滅性打擊之後，座談會再三強調總體戰的必要性。157 整體而言，座談會企圖以歷史哲學合理化政府戰爭方針，細部而論，「世界史立場」意味著在空間上世界史的中心將從西洋往東洋移，在時間上是近代西歐的歷史主義即將被替代，具體而言有五個使命：（1）日本在世界史大潮中，以新秩序對抗歐美秩序，（2）世界史的戰爭不單只是商戰，更是秩序與倫理之戰，（3）日本在東亞承擔指導的立場，負責創造以新倫理為基礎的新秩序，（4）世界應由歐洲秩序、美洲秩序、東亞秩序所組成，（5）日本為形成東亞秩序，須以優越的倫理為基礎，構築總力戰體制。158 為滿足上述五項使命，京都學派正當化由日本主宰的大東亞共榮圈，而日本之所以能承擔領導廣域經濟圈的重責大任，關鍵在於日本自有信史以來即善於融合各種文明，因而在與其他文明相會的過程中發展出「中間性」（in-betweenness）的特色，159 自忖能夠多方學習各文明優點，卻不致喪失自我；又透過京都學派世界史哲學的加持，日本被概念化為世界的「場所」，並非世界的「主體」，此

157 吉田傑俊，《「京都學派的哲學」—西田、三木、戶坂を中心に》，（東京：大月書店，2011），頁 287-294。
158 永安幸正，《世界秩序・民族及び道德—座談會》，《世界史的立場と日本》（昭和十六～十七年）を読む，《モラロジー研究》37，（1992）：頁 6。
159 陳柏宇：《國際關係的亞洲學派：中國、日本與印度的「再世界化」》，（臺北：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研究中心，2013 年），頁 92。
種能夠容納其他主體、卻又不會引起自我矛盾的獨特性，讓日本可與東洋文化精神共生，又能與西洋文化精神結合，故戰時日本最有資格享有領導與教化亞洲的盟主榮耀，是共榮圈最佳指導國。160 西田幾多郎本人在 1943 年 5 月 28 日發表的〈世界新秩序的原理〉中，慷慨謳歌大東亞共榮圈：

以往歐美帝國主義蹂躪東亞諸民族，剝奪各自的世界史使命。今日東亞諸民族務必自覺自身的世界史使命，進入一種超越自身的特殊世界，方能實現東亞民族世界史使命。此乃東亞共榮圈構成的原理，今後吾等東亞民族應一同追隨東亞文化的理念，奮起完成世界史使命。161

京都學派賦予日本領導亞洲諸國抵抗西洋、完成世界史的使命，當日本迎戰象徵近代西洋的科技文明、自由資本主義思想、民族國家制度、西伐利亞國際秩序之際，即履行世界史所託付的「超克近代」之使命。可見京都學派不甘於僅僅標榜東亞特殊性，更欲凸顯日本在世界史上的普遍意義，這等同於把日本從東亞昇華至世界層級，所作所為並非徇私地顧及東亞利益，而是無私地善盡世界義務。但癥結在於日本急於擺脫西方並與之爭鋒，而視東亞為建構亞洲世界新秩序的實踐場所，錯誤地將自身特性投射到亞洲，強迫各國為了共榮圈的永續發展而犧牲開放主權任憑魚肉，卻刻意無視其他國度並不具備像日本一樣可以自保的「中間

160 吉田傑俊，《「京都學派の哲学」—西田、三木、戶坂を中心に》，（東京：大月書店，2011），頁 212-215。
161 西田幾多郎，《西田幾多郎全集》第 12 卷，（東京：岩波書店，2004），頁 429。
尤有甚者，日本複製西方飄洋過海的帝國秩序，君臨東亞並以東亞為展現其權威的場所，自己高居盟主卻讓他人成為禁臠，此舉徹底壟斷亞洲的自主性，等同替東亞套上了與日本共存亡的緊箍咒，蓋因欠缺日本帶領的亞洲，充其量只能相對於歐美而存在，無法躋身世界高峰，一旦相信亞洲的意義在沒有日本領導的情況下，就不足以體現的話，亞洲實體化的過程於焉積重難返。

第三節　鞏固日本盟主論的大東亞國際法

日本於 1941 年 12 月 8 日正式對美英下達宣戰詔書，國際法學會在同日向政府申請成立為財團法人，並逐漸與重光葵執掌的外務省展開合作。重光葵在 1943 年 4 月至 1945 年 3 月任職外務省期間，有感於過去身為駐華大使期間對於推動對中國新政策的效果不彰，因此上任後極力實行大東亞新政策，特別指示外

162 嚴格而論，參與國際法學會的學者不一定擁有一致的政治立場，例如橫田喜三郎乃社會主義法學家，素來睥睨軍國主義者，雖然為學會提交關於「非交戰狀態」的研究報告，最終卻未能名列《大東亞國際法叢書》作者群。此外，橫田亦不齒同委員會中欠缺知識分子風骨的安井郁，故在 1943 年 3 月以身為國際法主任教授的堅持，拒絕推薦後者成為教授，導致東大法學部「 Y 教授問題」風波（橫田喜三郎與安井郁的姓氏英文拼音分別為 Yokota 與 Yasui，皆為 Y 字母開頭）。然而內部分歧的政策立場無損於國際法學會充作國策顧問機關的性質，參見竹中宅彦，《國際法学者的「戰後構想」—「大東亞國際法」から「國連信仰」へ》，《國際政治》，109，(1995)；頁 74-77。

163 波多野澄雄，《太平洋戦争とアジア外交》，(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6)，頁 278-280。
務省全面改訂與各國的條約（尤其是《日華同盟條約》）、團結
亞洲各國創建「大東亞機構」與共同憲章。164 該學會宗旨包括擁
護日本國權完整、建設東亞新秩序以及樹立東亞國際法，下設時
局問題委員會、戰時國際法委員會、東亞國際法委員會、東亞新
秩序委員會。其中東亞國際法委員會負責研究如何廢除租借與治
外法權、與美英等國取得對等地位，更重要的是找尋共榮圈內諸
民族相互關係之規律，以建立東亞國際法的基本原則。165

然而，新政策在近代國際法體下窒礙難行，政府遂仰賴國際
法學者建構一套新型的國際法秩序。德國法學家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的國際法哲學切中日本的當務之急，成為日本國際法學
家爭相援引的對象。施密特認為每一種基本秩序皆為一種空間秩
序，建立在某種空間界線和土地分配的基礎上，因此「秩序」
（Ordnung）與「在地化」（Ortung）息息相關，而法律秩序即法
制落地生根的產物。166 既然任何法律秩序皆根源於不同空間範
圍，奢望容納異質秩序的普世國際法秩序註定是朵失根的蘭花，
是故施密特主張世界應該劃分成若干個大空間，由一個「大族國」
（Reich）擔任該空間的「承擔者」（Träger）或「守護者」（Hüter）

164 波多野澄雄，「國家平等論」を超えて－「大東亜共栄圏」の國際法秩序を
めぐる葛藤（編集）、《植民地帝囯日本の法的展開》（東京：信山社，2004），頁 296-299。
165 竹中佳彥，〈國際法学者の「戰後構想」－「大東亜國際法」から「國連信
仰」へ〉，《國際政治》，109，(1995)：頁 71-72。
166 林立，〈檢視 Carl Schmitt 對古典國際法「發動戰爭合法」之肯定及對當
代「發動戰爭犯罪化」之批判〉，《臺灣國際法學刊》，6，(4)，(2009)：
頁 130-131。
以領導抵禦其他大空間的入侵。  

安井郁是東亞國際法委員會的主要審查委員之一，在戰時編纂《大東亞國際法叢書》第一卷，於戰後遭到盟軍「公職追放」的處分，被剝奪東京大學的教職，懲處結束後改至神奈川大學與法政大學任教。安井郁深受施密特的著作影響，《歐洲廣域國際法的基礎理念》乃其闡揚施密特國際法概念的代表性著作。在此書中，安井郁引介「大空間」(Grossraum) 與「具體秩序」(Konkrete Ordnung) 的概念，藉由施密特的理論，安井郁一方面攻訐歐洲傳統國際法妄圖普遍化至世界各個角落的傾向，另方面指出由日本領導的「大東亞」將是個獨立的區域，適用於從歐洲秩序解放出來的「新秩序」。  

田畑茂二郎是京都帝國大學國際法教授，儘管同樣受到施密特的啟發，但未如安井郁在戰後遭受「公職追放」的清算，而持續在京都大學執教至一九七○年代退休為止。在〈國際法秩序的多元構成〉一文中，田畑強烈反對單一國際法秩序，他指出東方國家加入由西方國家主導的國際法秩序，並不意味東方國家已被西方化，也不代表西方國際法秩序已躍然普遍化而澤披非西方世界；相反地，這現象不過表明東方國家願意遵守西方國際法以便協商國際事務。接著，田畑提出一種多元的國際秩序，並據此抨擊西方國際法雖然預設主權國家彼此平等，

167 同前註，頁 133-138。
169 Ibid, pp. 18-19.
但實際上卻造就主權的不平等。田畑呼應政府設立「大東亞國際機構」的政策，旗下設置大東亞仲裁裁判所，大東亞清算銀行，並建立大東亞軍隊與警察，由日本管轄與指揮協助各成員國自存自衛。170

國際政治學者松下正壽取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後，返回母校立教大學任教，戰時接受日本政府海軍省囑託，協助完成《大東亞共榮圈論》，書中關於共榮圈的法秩序頗有可觀之處。松下首先指陳過去國際法在確保國家的「生存權」與「領域主權」之間有難以消解的矛盾，在此以虛構的相鄰甲、乙兩國舉例說明，甲國所須的生存空間可能跨越至乙國的領土，乙國或許毋須完整的國土即可維繫生存，但基於領域主權所具有的排他性，乙國無法讓渡滿足甲國生存權的領域主權，對此既有矛盾，大東亞共榮圈的「生存圈」概念消解了領域主權與生存權的互斥性。生存圈理論尊重國家的領域主權，但要求各國開放各自領域以確保所有圈內國家的共存共榮，而為了防止各國自行其事以及可能滋生的紛爭，位居超越立場的「指導國」是不可或缺的角色。171

然而論者不免疑惑，調整各國生產要素的舉動與殖民體制有何不同？指導國與殖民母國是否有身份上的差異？松下認為大東亞共榮圈與帝國主義、主權國家體制鑲嵌在不同的國際秩序之

170 酒井哲哉，〈國際關係論の成立と国際法学—日本近代史研究からの一考察〉，《世界法年報》，22，（2002）：頁105。
171 户塚順子，〈大東亜共栄圏構想における領土権概念について—国際法学者松下正壽の議論を題材として〉，《人間文化研究科年報》，20，（2005）：頁432-433。
中，在共榮圈的新秩序中，領土是個可以依據成員需要而自由伸縮的概念，因而不致於服膺帝國主義不得不對外擴張生存空間的邏輯，故指導國在理論上並非以利己思維壓榨成員國的利益。最\[172\]後，松下強調日本應該承擔指導國的義務，如果日本不幸落敗，那麼大東亞共榮圈的美夢將化為泡影。

拜國際法學者所賜，東亞新秩序論述確立「廣域」、「指導國」以及「非成員國的不干涉原則」等三項基本要素，成功塑造一個具有指導國的廣域經濟圈。但平實而論，大東亞共榮圈最終非但沒有超克西方民族主義思潮帶來的弊端，反而製造另一種欠缺根基、自我膨脹的日本民族主義。換句話說，日本戰時所遭遇的中國民族主義問題，並沒有因此獲得緩解，甚至讓大東亞共榮圈在滿目瘡痍的敗戰世界裡謝幕。

第四節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東亞共同體構想

戰後日本以否定與清算過去霸道的歷史為基調重新出發，東亞乃成各方避之唯恐不及的知識範疇，儘管針對亞洲問題的辯論經歷學院化，但脫離官方色彩的企圖恰好遮蔽日本的責任，甚至

\[172\]同前註，頁 428-430。
\[173\]酒井哲哉，〈「植民政策学」から「国際関係論」へ—戦間期日本の国際秩序論をめぐる一考察〉，浅野豊美、松田利彦（編），《植民地帝国日本の法的構造》，（東京：信山社，2004），頁 20。
未必有助日本理解亞洲，故竹內好評析近代日本亞洲認識中雖隱藏自我認同的契機，可是大東亞共榮圈與戰後知識界均無法正視於此。174於是竹內好致力重建日本的責任感，自許以「火中取栗」精神，在政治不正確的大東亞共榮圈問題上著墨，他慣以「一步之差」形容亞洲主義從連带滑向侵略的過程。175另方面就國際現實考量，日本戰後亞洲論述的知識化，受制於美蘇冷戰結構的束縛，對主動籌組亞洲區域合作組織的探討投鼠忌器，僅僅觸及區域整合的市場化誘因，直到冷戰體系瓦解，美國圍堵共產主義擴張的結構有所鬆軟，加上全球化、東亞區域主義的影響，使得亞洲概念又彷彿重現生機，日本對各種區域合作組織的探討方有如雨後春筍般萌芽。

全球化(globalization)現象大致興起於二十世紀七○年代，是一種讓資本與勞力等生產要素超越國境並快速流動的過程，平野健一郎指出其包含兩種意義，一是壓縮傳統的時間及空間概念，二是帶來人們意識的變化。176平野看重「全球化」現象改造社會和文化，穿透國家與整合市場的能力批判美式區域研究在戰後日本的低迷氛圍中享有特權地位，更為日本學者犯了替美國國家戰略利益服務的又一次錯誤而痛心疾首，但驟起的全球化卻打破美式區域研究獨占優勢。平野列舉三種因素表明該現象造成的

174 孫歌, 《主體彌散的空間：亞洲論述之兩難》,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c》, 頁 130。
175 同前註, 頁 179。
176 平野健一郎著, 徐顯芬譯, 〈全球化進程中亞太地區的社會、文化演變與區域研究〉, 《全球化下的中國與日本—海內外學者的多元思考》,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頁 35。
變化：（1）全體性：全球化刺穿傳統國家、社會甚至學問的界線，造就多孔的境界，因此採取全體宏觀的區域研究視野，更能捕捉看似各自獨立、但實質上具有高度關連性的區域特色。（2）重層性：全球化證實具備多重身份的主體，個人可以同時擁有地方、族群、國民、區域、全球等認同，而非僅有以往單一平面的國家認同。（3）越境性：全球化使得越境移動益發容易，不同區域間文化交流與變化越趨頻繁，從而導致大規模的區域整合。177

當代全球化或者區域主義的思潮雖屬舶來品，卻能彰顯超越國家層級的多邊合作特色，使得為數不少的日本學者、政治人物從中發掘協同的意義。而東亞共同體論述的成形雖非一朝一夕之故，不過諷刺的是，這並非由戰前竭盡所能推銷廣域經濟圈的日本揭竿而起，而是由東南亞國家率先發聲。東亞共同體雛型是1967年由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以及泰國等五國創立的東南亞國家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縮寫為ASEAN），隨後汶萊、越南、寮國、緬甸、柬埔寨陸續加入而形成十個會員國。中國、日本、韓國則於1997年在馬來西亞與東協發表聯合聲明，更於2005年簽署《吉隆坡宣言》，形成「東協加三」（ASEAN+3）的體制。178

177平野健一郎，《グローバル化時代の地域研究—特権性の喪失》，《現代中國地域研究の新たな視局》，西村成雄、田中仁（編），（東京：世界思想社，2007b），頁24-26。
178宋興洲，《區域主義與東亞經濟合作》，《政治科學論叢》24，(2005)：頁1-48。
Group），由成員國的學者與企業領袖組成，該團體在 2001 年遞交報告，提倡基於同時符合既有國際規範與區域思考原則來成立東亞共同體，爾後「開放地域主義」（open regionalism）成為建構東亞共同體的核心理念。

日後，亞洲各國補充該構想的建議始終不絕如繩，僅以日本而言，自由民主黨前首相小泉純一郎在 2005 年 12 月於吉隆坡首屆東亞高峰會上表示，將以「開放區域主義」、「尊重民主人權與全球規則」、「促進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等三原則落實東亞共同體。民主黨前首相鳩山由紀夫在 2009 年 10 月利用中日韓三國於北京舉辦高峰會之際，宣揚東亞共同體構想，強調今後將遵循友愛共生的精神，與中國和亞洲諸國共存，並與美國重塑對等關係。鳩山內閣的東亞共同體理念，不單純只是謀求經濟利益，更包含「自立與共生」和「友愛」的價值觀，將弱肉強食的競爭體制化整為求同存異的道德感召，透露出日本希望給予鄰國一種連帶歸屬感的社會動力，本質上是政治哲學與世界觀的創新，因此很快取得中國與韓國的注目，霎時間東亞共同體前景看漲。

儘管亞洲各國相繼釋出善意表示樂觀其成，不過東亞共同體

179 大賀哲，〈「開かれた地域主義」と東アジア共同体構想：東アジア・サミットをめぐる日本の視座〉，《國際政治》，158，(2009)：頁 140-141。
180 陳鴻瑜，〈2005 年東亞峰會評析〉，《展望與探索》，4，(1)，(2006)：頁 7。
181 金榮勇，〈東亞經濟與政治〉，《2009 年度國際及中國大陸情勢發展評估報告》（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09），頁 51-52。
182 張建立，〈鳩山內閣東亞共同體構想及其實現的可能性——從集團締結原則的視角〉，《日本藍皮書—日本發展報告（2010 年）》，李薇（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頁 200-202。
至今尚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平野健一郎指出三个现实层面的主要障碍：（1）共同体的成员资格不明、（2）东亚的范围不明、（3）东亚共同体的特质不明，这导致东亚共同体充其量停留在构想与摸索的层次。尤有甚者，由於中日兩國在 2012 年釣魚台領土衝突後越演越烈，等於替东亚共同体的理想敲起丧钟，平野在 2013 年於中研院近史所的專題演講上表明，日本對歷史議題缺乏反省乃是東亞共同體裹足不前的根本因素。尽管如此，从这些论述中仍然依稀可見日本怎樣理解與期待自身在當前國際社會的定位，因此，下文就其中具有思想性的著作，勾勒東亞共同体的可能樣貌。

推动區域整合組織，除了考量共同經濟誘因、安全考量外，不能忽略思考該區域是否具備共通文化基盤的問題。2004年創立的「東亞共同體評議會」，由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會等綜合研究開發機構会同各大企业團體組成，該評議會就東亞共同體相關課題，提供日本政府研究報告與政策建言，作為參與首腦會議、外向會議等參考。在該年度第三回「東亞是什麼？歷史與文化的基盤」論壇報告中，日本文化人類學會會長、前文化廳長官青木保指出「東協加三」會員國即使在政治上相互合作，但東亞與東南亞國家之間具有顯著的文化歧異性，終究會使得彼此貌合神離。

183 平野健一郎，〈東アジアにおける人の国際移動〉，《東アジア共同体の構築—国際移動と社会変容》，西川潤、平野健一郎（編），（東京：岩波書店，2007d），頁 128-129。
184 平野健一郎，〈日本近代史のなかの東アジア共同体〉，「東亞共同體—傳統與現代的觀點」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11月26-27日），頁 1。
青木保以為唯有體認到此區域文化乃「混成文化」的事實，方能發展出東亞共同體的共同意識，接著他運用「都市中產階級」的概念以聯繫各成員國國民。依照青木保的構想，儘管東亞與東南亞各國文化迥異，但在現代化與都市化的影響下，都市中產階級卻是遍地開花，而且這個群體擁有共通的志趣、價值觀、生活習慣，因此透過都市中產階級這條紐帶，有助於推行東亞共同體的共同意識。186

「東協加三」固然可以充作東亞共同體的基底，然而另有學者主張東亞共同體應限定在傳統的東亞區域。前日本駐聯合國大使、早稻田太平洋研究院教授谷口誠主張東亞具有超乎民主主義、市場主義、人權尊重等一般性價值觀的歷史文化內涵。在他眼中，淵源於東亞歷史文明長河的和、中庸、調和等傳統價值觀，可以進一步與東亞經濟發展奇蹟整合成「亞洲價值觀」，此乃東亞共同體的真正根基。187

此外有身為倫敦政經學院、大阪大學名譽教授的森嶋通夫，他在青少年時代曾隨著父親在北京度過中日戰爭的歲月，歸國後受到時任大阪大學社會經濟研究室室長（該機構後於 1966 年改

185 青木保，〈基準報告 2：文化的基盤〉，《東アジアとは何か？その歴史的、文化的基盤》，（東京：東アジア共同体制議会，2004），頁 8。
186 青木保，「混成文化」の展開と広がる「都市中層」〉，田中明彦、伊藤憲一（編），〈東アジア共同体制と日本の術路〉，（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會，2005），頁 98-103。
187 滝田豪，〈日本知識人の外交論と「東アジア共同体制」〉，徐興慶、陳永峰，編，〈転換中の EU と「東アジア共同体制」—台湾から世界を考える〉，（台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頁 101-109。
制為研究所）高田保馬的影響，其學知不僅造就大阪大學社會經濟研究所的巔峰，更在生涯晚年提案創立東亞共同體。承襲高田保馬構想「東亞民族」的意識，森嶋認為東亞共同體原是個利益社會，成員依據共同利益而結合，但長期交流、通婚的結果連繫了新的血緣關係，也使得義理、愛情等利益以外的要素自然而然地孽生，久而久之，從純粹利益出發的東亞共同體將轉化成共同社會。188 森嶋以為東亞共同體與大東亞共榮圈萬萬不同，後者乃以日本獨自支配亞洲為前提，各成員國宛如殖民地，但前者採取民主主義，設置共同體議會，依照中國、南北韓、日本、臺灣人口比例分配席次，同時遵循門戶開放與自由競爭原則，不主張與境外勢力相抗衡。189

平野健一郎近年來轉而關心東亞共同體的論述，平野承認「東協加三」相當接近東亞共同體的規模，但他認為共同體的成員應採取國家以外的界定方式，例如像中國這樣幅員廣大的國家，其領土全境未必皆劃歸共同體範疇，若僅以國家作為唯一判準，將忽略東亞共同體的獨特價值。190 因此他主張不在制度上鑽牛角尖，以人們在東亞的國際移動現象自成東亞共同體的事實。

平野多次為文強調人們國際移動的重要性，由於經濟發展快速，加上交通工具日新月異，使得國際移動頻率大增，原先以國

188 森嶋通夫，《日本にできることは何か—東アジア共同体を提案する》，（東京：岩波書店，2001），頁 121-123。
189 同前註，頁 110-111。
190 平野健一郎，《東アジアにおける人の國際移動》，《東アジア共同体の構築—国際移動と社会変容》，西川潤、平野健一郎（編），（東京：岩波書店，2007d），頁 128-130。
家為認同對象的「國民」，逐漸淡化「國家統合」的性質，向具有普世意涵的「人類」身份靠攏。

當人們放下隸屬於個別國家的成見，透過在東亞這塊「地域交通圈」的移動，將有益於東亞共同體的自然發生，這現象就好比「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原始意義。按照平野的國際文化論，人們在不同層次會有相異的認同模式，所以在東亞層級形成東亞認同是可信的，由此可見，與其以國家作為共同體的單位，不如以人為本位，正視人們動態的國際移動事實，則東亞共同體的基盤便在於東亞人民的國際移動。

不過平野也提醒，國際移動不保證區域共同體的誕生，仍應檢視國際移動乃自然發生，或出於國家政策所致，他把前者定義為「區域化」而將後者稱為「區域主義」。平野以大東亞共榮圈為例，說明日本軍人在太平洋戰爭時幾乎踏遍整個東亞與東南亞，但他們反而激起各地的反抗浪潮，無能創造一種共通的東亞文化，而這場浩劫的主因是日本帝國逞一己之私，動員軍隊蹂躪的結果。平野表示除了語言問題，至今大東亞共榮圈的陰影仍妨礙共同體的構築，處理大東亞共榮圈遺留的問題是相當大的考驗：

191 平野健一郎，〈ヒトの国際的移動と国際関係の理論〉，《国際政治》，87，（1988）：頁3。
192 平野健一郎，〈東アジアにおける人の国際移動〉，《東アジア共同体の構築—国際移動と社会変容》，西川潤、平野健一郎（編），（東京：岩波書店，2007d），頁117-148。
除了語言外，還有一個問題是大東亞共榮圈，這是日本想要支配全亞洲的野心，現在的日本絕對不能重蹈覆轍。在那個時代，只有日本是獨立的國家，中國大部分、臺灣、朝鮮都受日本的掌控，反觀今日的亞洲已不復見日本獨霸的局面，各國基本上都是獨立自主的狀態。195

既然今非昔比，何以日本仍心繫共同體論述呢？究竟共同體對日本有何不可或缺的意義？平野認為箇中原因是日本尚未達到完全自主的狀態：

日本的確無法握有東亞共同體的主導權，但東亞共同體對日本卻非常重要，比方說沖繩的美軍基地來看，日本仍然是美國的殖民地，遭其所占領。日本如果欲與美國對抗，不得不藉助東亞共同體的力量，可是政府還是無法在美國和亞洲之間取得平衡，鳩山前首相失敗的外交政策可茲為明鑒。196

平野指出日本需要東亞共同體以追求完全自主的渴望，前首相鳩山由紀夫提出與美國重啟沖繩基地談判的政見，重建美國與日本的平等關係，因此獲得不少日本民眾的支持，卻草草收場。平野批判鳩山高高舉起、輕輕放下的承諾乃是對沖繩居民的背叛，197而日本政界今日之所以企圖以《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縮寫為 TPP）取代東亞

---

195 作者當面訪談平野健一郎教授，日本東洋文庫，西東京市平野健一郎的研究室，2012年3月19、20日。
196 Ibid.
共同體，也是因為鴻山外交政策的挫敗所致。198

平野健一郎的東亞觀以東亞共同體為核心，彰顯他對日本處境的憂心，以及處理大東亞共榮圈殘存問題的用心。有別於西方學者對「區域化」和「區域主義」的簡略區分，平野嚴格劃分兩者的不同，如前文所述「區域化」是由人們自發促成國際移動的現象，但區域主義帶有國家動員的意味；此種區分標準，隱約呈現與日本戰時東亞協同體主張分道揚鑣的意圖，蓋東亞協同體的論述主要基於蠟山政道的「區域主義」，蠟山藉由訴諸超越國家的區域主義以克服中國民族主義的阻撓，最後卻實體化為吞噬任何思想意義的大東亞共榮圈巨獸。時至今日，雖然西方同樣興起區域主義的思潮，但平野卻寧願選擇「區域化」的用語，這無非是避免引發亞洲各國無所謂的聯想與懷疑。

不論是出於現實政策需要或政治思想推導，日本國際關係學者皆不以單一國家政治體制為滿足，而經常提倡多國與跨區合作，亞洲便成為各方援引的概念，甚至是競技的擂臺。對於此類日本學界的傾向，石之瑜等人敏銳地觀察到其背後的隱蔽策略，他們發覺過去日本總是迴避採用任何凸顯日本的概念，一方面是世界之前缺乏自信，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唯恐身在亞洲之中卻招惹鄰國的猜忌。但某種新興「日本主義」的策略，代表日本尋求以直接姿態進入世界的態勢，因為當歐洲沒辦法提供世界普遍

198 平野健一郎，〈日本近代史のなかの東アジア共同体〉、「東亞共同體—傳統與現代的觀點」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11月26-27日），頁10。
性政策出路时，日本便可以此独特的贡献而登上世界舞台。199

由此可見，平野採取的仍屬固有的思考模式，即在亞洲身份的掩護下尋求日本的出路，但他更有意識主張具有生活性與民間性的亞洲，冀望淡化日本在亞洲造成的深刻印象，削減侵略亞洲的不名譽色彩；但同時，他又寄望於東亞共同體振興亞洲，一衣帶水的連帶意識。亞洲連帶的熱情起源于歐美帝國主義的壓迫，但諷刺的是當日本號召亞洲各國起身抵抗時，自己高居盟主卻讓他人成為禁臠，而超克近代的下場卻是由被超克的對象來接收殘破不堪的日本。在平野看來，日本戰後被美國接管的局面猶如帝國主義的再次壓迫，他不顧日本的主體性就此埋沒在美國冷戰保衛傘下而永無重見天日的機會，遂透過「東協加三」逐漸引領亞洲區域整合的契機，排除美國在東亞任意妄為與擴張霸權的可能條件，證明東亞共同體的存在與正當性。

平野對於日本以及亞洲自主性的關切，與竹內好一脈相承，竹內好的亞洲圖像是「抵抗的亞洲」，他以為亞洲應抵抗與超越的是沒有根基的民族主義，這是一種脫離亞洲社會基盤，又與國家體制同流合污的民族主義。200 同理，平野反對替特定國家效勞

199 黃佳甯、石之瑜，《入歐不脫亞？當代思想史中「日本主義」的可能性》，《問題與研究》，49，(2010)：頁 17、39。
200 鶴見俊輔、加加美光行，《いま、改めてナショナリズムの根を探る—竹内好の方法を参照軸として》，《無根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を超えて—竹内好を再考する》，鶴見俊輔、加加美光行（編），（東京：日本評論社，2007），頁 270。另方面針對竹內好的亞洲觀，加加美光行從中特別出「內」「外」兩種亞洲，「內」是日本明治維新以前固有的價值，「外」指受到歐洲衝擊而被迫改變的部分，而他亦將日本一味模仿近代歐洲的過程稱為「自我喪失」，參見同書，頁 217-218。
的民族主義，特別是濫用協同主義以及連帶意識的大東亞共榮圈，因此他勾勒出以東亞人民國際移動為基盤的東亞共同體，意在沖洗國家主義的影響力，而限定於東亞的範疇在本質上更抵抗東亞以外勢力的干預。當作為空間的東亞因此維護了自主性，平野在不知不覺中也達成超克近代的歷史使命。

第五節 「超國家」的東亞共同體藍圖

本章以日本的「東亞」論述為軸線，敘述從回應中日戰爭爆發的東亞協同體主張、順應近衛聲明的大東亞共榮圈政策、至戰後受區域化與全球化影響而復興的東亞共同體構想。在這段過程中，日本學界呈現一股「超國家」的傾向，並不以單一國家的政治體制為滿足，而經常提倡跨國合作，「亞洲」順理成為各方援引的概念，但亞洲概念也在無意識中染上「實體化」的惡疾，也因此竹內好立志清理大東亞共榮圈綁架亞洲後導致的無妄之災。

平野健一郎面臨日本戰前亞洲論述的災厄，有所承襲亦有意斷裂。雖然同樣承襲「超國家」的脈絡，但他的論述策略是迴避戰時「區域主義」的理路，而接受更具中立性的「區域化」，而在精神上則根源於亞洲連帶的自覺，並效法竹內好所重視的「抵抗」，希望日本不應再次受制於歐美帝國主義的箝制，而東亞共同體即是其最高理想的落實。他的東亞共同體藍圖，有別於一般學者從經濟統合的層面下手，而是從其國際文化論的預設出發，界定每個人在不同層級、區域有相異的認同對象，當他們自發地
於東亞範圍內跨國移動時，將會助長對東亞的認同程度，無形之中自然成就東亞共同體的事實，這現象有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原始意義。最終，一旦東亞人民不受國家動員，基於個人需要而移動時，也就不存在任何一國膽敢妄稱東亞霸主的機會，東亞也因此能夠逐步剝離外力的干涉，重新尋回根源的價值。
第五章 超越非正常國家的困境

第一節 從「悔恨的共同體」出發

第二次世界大戰堪稱人類歷史上最具破壞性的戰爭，不僅包括人命傷亡、建物毀損等實體層面的損失，更造成精神層面難以磨滅的創傷。日本在戰爭結束後的1946年，城市慘遭盟軍轟炸而千瘡百孔，糧食等生活日用品必須實行配給制度；更嚴重的是，滯留海外的軍人與家屬陸續返國，加上原先守衛本土而後解散的軍隊，對日本社會構成一股沈重的壓力。201對於不曾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人而言，很難想像戰爭記憶有何深遠的影響。但事實上，二次大戰是一場仍然活著的戰爭，不僅因為為尋找者、目擊者的當事人依然健在，更由於引起戰爭的要素迄今尚未消解，像是修改歷史教科書、慰安婦賠償判決、參拜靖國神社，以及「南京大屠殺」存在與否等爭議經常在當前世界上演。202

201嚴紹盈，〈戰後60年日本的中國觀〉，《日本研究》，3，（2005）：頁2。
202孫歌認為如何理解這場戰爭，以歷史的客觀角度剖析並非唯一方式，更重要的是不能忽視「情感記憶」的作用，詳見孫歌，《中日傳媒中的戰爭記憶》，《主體彌散的空間—亞洲論述之兩難》，（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b），頁65。在另篇論文〈實話如何實說〉中，孫歌直言強調歷史客觀真實性的後果，即是感情記憶的喪失，使得歷史失去緊張與複雜，更易遭政治與意識形態所利用，詳見同書，頁29-40。
日本知識界的敗戰體驗是異常強烈，因為相對於平民，知識份子自認肩負更多道義責任，社會主義者痛恨無法貫徹道德原則，自由主義者後悔助長軍國主義焰苗的姑息心態，其他領域的專家則反省自己與普羅大眾一樣，竟然對政情一無所知與欠缺判斷能力。203 這些群體更形成丸山真男所稱的「悔恨的共同體」，對於無能阻止這場浩劫而普遍抱有愧疚與自省的心態，在此基礎上希望以超越個別專業的立場，秉持連帶的責任與感情重新出發。

天皇制首先成為眾矢之的，丸山真男坦承戰前深受近代天皇制教育的影響，可是日本戰敗後卻經歷長達半年的心靈困頓，因而批判天皇制有礙於日本人自由性格的形成，使得日本人難以遵從自己良心作判斷與行動並對結果負責。丸山寫作〈超國家主義的論理與心理〉時即認為「這是一篇學術論文，因此任何牵涉到天皇與皇室的文字，並沒有使用敬語的必要。」204 不過丸山也不諱言基於與近代天皇制的羈絆，從天皇制的咒縛解放對他而言並非易事。生於 1932 年的中國學家溝口雄三，表明兒時看過一張日本人正在屠殺中國人的照片，而那張照片的記憶是他人生的原點，日後上大學接觸到日軍在亞洲諸國的殘暴行為時，更受到前所未有的打擊。205 戰敗的衝擊，徹底擊垮他原先深信不疑的神國

203 丸山真男，1977，〈近代日本の知識人〉，松澤弘陽、植手通有（編），《丸山真男集》第十卷，（東京：岩波書店，1996），頁 254。
204 轉引自齋部直，《丸山真男—リベラリストの肖像》，（東京：岩波書店，2006），頁 139-140。
205 轉引自曾倚萃，《溝口雄三的中國方法—超克亞洲的知識脈絡》，（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2008），頁 114-115。
日本，他回憶「老師們戰前說天皇是神，要大家朝著相片膜拜，戰後卻突然改口說天皇也是人；一時間，每個人都拼命想要尋找出一個可以相信的東西。」 又如 1934 年出生的入江昭，自終戰後四天開始撰寫日記，而戰敗最切身的感觸則是盟軍的占領，1945 年 4 月 28 日盟軍進占東京，入江寫道「他很難過對此什麼也不能做，唯一能做的就只有回家學習。」 伴隨著盟軍占領而來的是教科書的改寫，美國不認為日本戰前教授的天皇中心史觀是正確的歷史，因此強迫修訂歷史教科書，此舉讓日後成為歷史學者的入江體驗到，政治力量往往掌控歷史詮釋權。

丸山接著從日本的思想傳統反省發起侵略戰爭的原因，他以為日本始終欠缺思想的座標軸，使得引進的外來思想並未為人們所充分理解，與傳統缺乏有機的聯繫；但是反思日本文化裡的西方近代成分卻是無濟於事，因為他覺得日本根本不配談上「超克近代」的思維，原因是日本連「近代」都未曾真正理解。竹內好則採取抵抗的策略，他集畢生之精力批判日本近代化模式，認為一味學習西方的日本不如懂得反抗西方的中國，不過他在安保鬥爭運動以及中國文化大革命以後的態度似乎轉趨保留，認為近代化有很多種類型，而中國與日本其實屬於不同模式。

---

206 轉引自曾倚萃，前引書，頁 28-29。
207 轉引自石之瑜、劉克倫，《入江昭對世界與中國的中間主義立場——一種多元身份的知識視野》，《五間：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2010》，頁 227-231。
208 諸葛蔚東，《戰後日本知識共同體的流變》，《社會學研究》，5，(2010)：頁 3-4。
209 同前註，頁 5-6。
的言下之意是默認中國的地位不再特殊，日本自有其「超克近代」的方式。

平野健一郎承襲反省日本主體性的同樣思路，他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摧残、美日安保鬥爭運動的洗禮，前一起事件醞成戰後日本主權受美國箝制的非正常國家狀態，並以此延伸出安保鬥爭運動的悲劇，而如何梳理、評價、回應這兩起事件，同時也是反思日本近代性與主體性的問題。九一八事變、蘆溝橋事變以及珍珠港事件皆被日本視為歷史轉換的轉捩點，第一起事變乃東亞聯盟運動的肇端，反映日本聯合東亞諸國、齊心抗拒外敵的理想，第二起事變的結果雖然讓日本倍感壓力，卻因此更加堅定超越個別國家、籌組東亞新秩序的信念，最後一起事件則掀起超克近代的高潮，賦予日本開創新歷史的使命。平野雖然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印象模糊，僅存有父母離異與生活貧困的記憶，可是圍繞這三起事件的命名紛爭卻是紮紮實實地刻印在他腦海裡；究竟這場戰爭應該稱為「十五年戰爭」、「大東亞戰爭」還是「太平洋戰爭」，日本社會充滿歧見，而平野亦對此疑惑不已，這不僅構成他人生中一個重要的困惑，更是體現戰後日本不得不正視的國家困境。

美日安保鬥爭運動作為這場大戰的延伸，作為圍繞著「放棄戰爭」與「非武裝化」的和平憲法問題之延續，不僅昭示日本仍然沒有脫離他國的掌控，更諷刺的是當初亟欲擺脫與克服的對象，現在卻成為自身的保護國，在主權、學術等各方面都高高在

---

210 井出武三郎，《安保闘争》，（東京：三一書房，1960），頁 17。關於安保鬥爭運動事件詳盡經過與年表日誌，請參閱同書，頁 243-250。
上地發號施令。憤慨不已的平野逹自投身安保鬥爭，表達對日本主體性的淪喪之不滿，運動雖以失敗告終卻沒有令他灰心喪志，反而摸索出以學者為生涯的道路。他在學院裡的啟蒙恩師是衛藤吉、費正清與史華慈，還包括更早的新渡戶稻造、矢內原忠雄等人，但在學院以外的竹內好，卻是影響其一生思想的關鍵人物，我們可以在前面章節中體察到這段系譜的傳承。

如果說平野以為日本所面臨的國家困境是伴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而來，以及延伸出美日安保鬥爭運動的非正常國家狀態，那麼他在思考上協助日本超越此一困境的方式，是採取國際文化論視野以重構滿洲與東亞觀。本書針對他的著作，釐清平野怎樣突破並超越以往滿洲與東亞觀的問題，這些問題包括（1）為日本國家主義服務的滿洲觀（2）遭日本盟主論牽制的東亞觀。

日本的滿洲與東亞觀，皆曾經受到國家至上原則所蒙蔽，滿洲被軍國主義者挾持，表面上打造成「五族協和」、「王道樂土」的新天地，骨子裡仍由日本關東軍單方面控制。平野就讀東京大學時期，曾耳濡目染矢內原忠雄等人開創的殖民地史研究，不過自從留學美國哈佛大學後，即轉而採取文化史的角度剖析滿洲歷史。他運用「敵對性文化觸變」概念，結合抵抗的作用力，並透過整理文化與教育素材，賦予滿洲一股活生生的能動性，當滿洲真正去國家主宰後就不再只是漢族與日本的禁臠，從而拭去日本發起戰爭的陰影。東亞共同體所面臨的問題，主要是東亞人民對戰前大東亞共榮圈的疑慮。眾所周知，大東亞共榮圈鼓吹亞洲共患難、追求殖民解放的口號相當響亮，但實際上則被用於正當化日本在東亞的盟主地位，換來的代價是亞洲各國再度殖民化的屈
辱，以及日本自身地位的颓丧。平野健一郎深知大東亞共榮圈的推手是日本國家力量，對於動用國家武力的後果更是瞭然於胸，於是他避免使用戰時東亞協同體譜所採用的「區域主義」思維，改以「區域化」的用詞重新理解東亞共同體。他指出東亞人民的國際移動是東亞共同體的基盤，因為這是基於人民自動自發、沒有外力教唆的結果，而且當人們因此跨境移動而逐漸捐棄個別國家的成見時，作為上位層次認同的東亞共同體便自然而然地現形。

「為日本國家主義服務的滿洲觀」以及「遭日本盟主論牽制的東亞觀」之所以會構成問題，乃因他們是附著且伴隨國家、戰爭而生的產物，當平野成功轉化此兩者，返璞歸真至以文化為基礎的脈絡，在精神意義上也就擺脫日本被美國支配的命運，形同超克西方帶給東方的困境。因為戰前滿洲的境遇猶如戰後日本淪為美國圍堵共產陣營棋子而身不由己的苦境，至於當今美國在東亞的霸權地位又猶如日本盟主野心的翻版；因此平野不似一般政治人物與學人逕自訴求「正常國家化」，他反倒採取旁敲側擊的方式，藉由反思日本國家主義在滿洲與東亞的不當，以消除美國施加日本的困境。是故，平野之所以不認為自己屬於純粹的中國研究者，乃因他面臨的巨大他者是美國，而他想拯救的對象則是日本自身，所以並不像其他日本的中國研究者一樣需要重新評估中國的定位，甚或借用亞洲概念以消解、模糊中國，此特性從而確立平野在日本中國學界的特殊地位。
第五章 超越非正常國家的困境 109

第二節 邁向「興亞」的日本國關理論

平野健一郎的身份策略與日本國關學派有何關聯？當代日本國家關係學界的重要特徵，便在於對東亞的思考綿延不絕，而追根究柢，日本國關理論的濫觴乃是為了回答「日本在國際上的自我認識是什麼」這個身份意識問題，追問日本究竟屬於地緣上更為親近的亞洲，抑或是號稱具有普遍性且文明開化的歐洲。日 211 本應「興亞」或「脫亞」的亞洲主義辯論，不幸釀成大東亞共榮圈的災禍，戰後一度煙消雲散，然而殘忍無道的殖民政策終究迫使思想家們在充滿懺悔的意識中，重構戰後的亞洲主義思潮，讓日本自身成為反省的對象。

戰後日本以否定與清算過去霸道的歷史為基調重新出發，替日本國家政策服務的滿洲殖民地研究、誤入歧途的大東亞共榮圈，可謂是將日本帶往「非正常國家」的罪魁禍首。儘管滿洲過往榮景已是煙消雲散，但滿洲對日本而言卻仍具獨特意義，戰前的日本知識分子和民主主義者，眼見在日本本土有志難伸，紛紛前往滿洲追求與實現理想，希望將滿洲建設成王道樂土的新天地，同理戰後的日本知識分子也把在國內無法完成的目標與理念投射在滿洲的意象之中。例如平野健一郎視其為日本現況之反

---

射，藉由滿洲這個載體映射日本的身份困境，平野批判日本壓榨滿洲以遂行沒有根基的日本民族主義，賦予日本反省並抵抗霸道的能動性，而超越日本國家困境之途在於重新擁抱東亞的共同體思想。

雖然東亞共同體理論尚未發生革命性的突破，但從平野的看法而論，他一面否定大東亞共榮圈主導國的作用力，另一方面看重東亞人民的自主性，期待催生東亞民族、東亞認同甚至於東亞社會，以作為東亞一體的自然基盤。從這些藍圖來看，表面上日本無意主宰東亞共同體的走向，僅僅強調善盡日本作為東亞國際社會一分子的義務，藉由提倡開放區域主義，與各國互通有無，達成共存共榮的理想狀態。實際上，這些論述也隱含自主自為的期許，尤其對於尚未取得所謂正常國家地位的日本而言，能夠寄託東亞共同體象徵性的軀殼，蛻變為獨立自主的國家，實已足矣！

因此，也許當東亞共同體宣告成立的時刻來臨，文明開化以來思想家們所尋求的自主地位，戰時東亞新秩序所未能警覺的自主意識，也就在那一刻一償夙願。

當東亞論述的背景在戰後演變為受美國控制，日本主體性宛若昨日黃花之際，平野在亞洲掩護下尋求日本出路的身份策略固然呈現「興亞」或「脫亞」的一貫亞洲主義辯論，但更重要的意義在於他企圖以日本國際文化論轉換主流國際關係理論，反映他促使當代日本國關理論靠攏亞洲以掙脫非正常國家困境的用心。
附錄 1：平野健一郎生平

<table>
<thead>
<tr>
<th>年份</th>
<th>重 要 事 蹟</th>
</tr>
</thead>
<tbody>
<tr>
<td>1937 年 9 月</td>
<td>出生於日本茨城縣</td>
</tr>
<tr>
<td>1945 年 8 月</td>
<td>二戰結束，父母離婚</td>
</tr>
<tr>
<td>1956 年 1 月</td>
<td>鶴見俊輔投稿《中央公論》1 月號，呼籲使用「十五年戰爭」的用語</td>
</tr>
<tr>
<td>1960 年 6 月</td>
<td>參與美日安保鬥爭運動</td>
</tr>
<tr>
<td>1961 年 3 月</td>
<td>自東京大學教養學部畢業</td>
</tr>
<tr>
<td>1962 年 5 月</td>
<td>福特基金會事件爆發</td>
</tr>
<tr>
<td>1963 年 3 月</td>
<td>完成碩士論文：《関東軍の満州国國家構想の展開過程》，自東京大學大學院畢業，並留學美國哈佛大學</td>
</tr>
<tr>
<td>1967 年 6 月</td>
<td>修畢哈佛大學博士課程</td>
</tr>
<tr>
<td>1969 年 4 月</td>
<td>成為上智大學外國語學部專任講師，兼任上智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所員</td>
</tr>
<tr>
<td>1970 年 7 月</td>
<td>成為東京大學教養學部助教授</td>
</tr>
<tr>
<td>1978 年 4 月</td>
<td>翻譯出版史華慈著作《中国の近代化と知識人—亜細亜と西洋》</td>
</tr>
<tr>
<td>1983 年 6 月</td>
<td>完成博士論文：The Japanese in Manchuria 1906-1931: A Study of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Manchukuo，取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td>
</tr>
<tr>
<td>1984 年 4 月</td>
<td>成為東京大學教養學部教授</td>
</tr>
<tr>
<td>1994 年 7 月</td>
<td>翻譯出版費正清自傳《中國回想錄》</td>
</tr>
<tr>
<td>1998 年 4 月</td>
<td>成為東京大學名譽教授</td>
</tr>
<tr>
<td>1998 年 5 月</td>
<td>轉任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教授</td>
</tr>
<tr>
<td>1998 年 12 月</td>
<td>擔任第 22 期國語審議會委員</td>
</tr>
<tr>
<td>1999 年 12 月</td>
<td>擔任「亞洲政經學會」理事長</td>
</tr>
<tr>
<td>年 份</td>
<td>重 要 事 蹟</td>
</tr>
<tr>
<td>-------</td>
<td>-----------</td>
</tr>
<tr>
<td>2000 年 1 月</td>
<td>出版《國際文化論》</td>
</tr>
<tr>
<td>2001 年 11 月</td>
<td>擔任「日本國際文化學會」會長</td>
</tr>
<tr>
<td>2002 年 12 月</td>
<td>擔任「亞洲政經學會」與「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名譽理事至今</td>
</tr>
<tr>
<td>2005 年 3 月</td>
<td>前往韓國國立首爾大學擔任國際大學院客座教授</td>
</tr>
<tr>
<td>2006 年 4 月</td>
<td>擔任「大學共同利用法人人類文化研究機構地域研究推進中心」所長</td>
</tr>
<tr>
<td>2007 年 3 月</td>
<td>擔任日本國際文化學會顧問</td>
</tr>
<tr>
<td>2009 年 4 月</td>
<td>成為早稻田大學特命教授</td>
</tr>
<tr>
<td>2010 年 4 月</td>
<td>擔任「國立公文書館亞洲歷史資料中心」所長</td>
</tr>
<tr>
<td>2011 年 7 月</td>
<td>擔任「東洋文庫」常務理事</td>
</tr>
</tbody>
</table>
附録２：平野健一郎著作年表

<table>
<thead>
<tr>
<th>年 份</th>
<th>書名、標題</th>
<th>出 處</th>
</tr>
</thead>
<tbody>
<tr>
<td>1976年</td>
<td>〈文化的関係としての国際関係〉</td>
<td>東京大学出版会・《国際学理論と展望》</td>
</tr>
<tr>
<td>1978年</td>
<td>《中国の近代化と知識人―厳復と西洋―》（翻訳）</td>
<td>東京大学出版会</td>
</tr>
<tr>
<td>1982年</td>
<td>《国際関係論》（共著）</td>
<td>東京大学出版会</td>
</tr>
<tr>
<td>1984年</td>
<td>《国際関係論のフロンティア２・近代日本とアジア―文化の交流と摩擦―》（編著）</td>
<td>東京大学出版会</td>
</tr>
<tr>
<td>1984年</td>
<td>《国際関係における文化交流》（共編）</td>
<td>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td>
</tr>
<tr>
<td>1985年3月</td>
<td>〈日本外交における文化交流政策〉</td>
<td>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国際問題》</td>
</tr>
<tr>
<td>1985年</td>
<td>〈戦後日本外交における文化〉</td>
<td>有斐閣・《戦後日本の対外政策》</td>
</tr>
<tr>
<td>1988年</td>
<td>《国際政治 87―国際社会における人間の移動―》（特集編集担当）</td>
<td>日本国際政治学会</td>
</tr>
<tr>
<td>1988年</td>
<td>《アジアにおける国民統合―歴史・文化・国際関係―》（共著）</td>
<td>東京大学出版会</td>
</tr>
<tr>
<td>1988年3月</td>
<td>〈ヒトの国際的移動と国際関係の理論〉</td>
<td>日本国際政治学会・《国際政治》第87号</td>
</tr>
<tr>
<td>1988年</td>
<td>“International Cultural”</td>
<td>Jap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td>
</tr>
<tr>
<td>年 份</td>
<td>書名・標題</td>
<td>出 處</td>
</tr>
<tr>
<td>-------</td>
<td>------------</td>
<td>-------</td>
</tr>
<tr>
<td>1989 年 8 月</td>
<td>Conflicts: Causes and Remedies”</td>
<td>Affairs, Jap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2, no.2</td>
</tr>
<tr>
<td>1989 年</td>
<td>（民族・国家論の新展開—《ヒトの国際的移動》の観点から—）</td>
<td>国際法学会, 《國際法外交雜誌》第 88 巻第 3 號</td>
</tr>
<tr>
<td>1989 年</td>
<td>（日本外交にとっての文化—エリザベス女王訪日を例として）</td>
<td>東京大学出版会, タクサ国際政治 4 日本の外交</td>
</tr>
<tr>
<td>1993 年</td>
<td>The State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 Perspective from East Asia, editor</td>
<td>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td>
</tr>
<tr>
<td>1994 年</td>
<td>《講座現代アジア 4—地域システムと国際関係》（編著）</td>
<td>東京大学出版会</td>
</tr>
<tr>
<td>1994 年</td>
<td>《中国回想録》（共訳）</td>
<td>みすず書房</td>
</tr>
<tr>
<td>1994 年 11 月</td>
<td>（文明の衝突か、文化の摩擦か？—ハンチントン論文批判—）</td>
<td>比較文明学会, 《比較文明》第 10 號</td>
</tr>
<tr>
<td>1995 年</td>
<td>《20 世紀アジアの国際関係 II ・アジアに対する日本》（編著）</td>
<td>原書房</td>
</tr>
<tr>
<td>1995 年 4 月</td>
<td>（国際関係の変化のなかの国際文化交流）</td>
<td>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 《国際問題》第 421 號</td>
</tr>
<tr>
<td>1997 年</td>
<td>《国際関係キーワード》（共著）</td>
<td>有斐閣</td>
</tr>
<tr>
<td>年 份</td>
<td>書名、標題</td>
<td>出 處</td>
</tr>
<tr>
<td>-------</td>
<td>------------</td>
<td>-------</td>
</tr>
<tr>
<td>1999 年</td>
<td>《国際文化交流の政治経済学》（編著）</td>
<td>勁草書房</td>
</tr>
<tr>
<td>2000 年</td>
<td>《国際文化論》</td>
<td>東京大学出版会</td>
</tr>
<tr>
<td>2002 年</td>
<td>《21 世紀の国際知的交流と日本—日米フルブライト 50年を踏まえて》（共編著）</td>
<td>中央公論新社</td>
</tr>
<tr>
<td>2002 年</td>
<td>〈黄遵憲『朝鮮策略』異本交合—近代初頭東北アジア国際政治における三つの文化の交錯について—〉</td>
<td>日本国際政治学会，《国際政治》第 129 號</td>
</tr>
<tr>
<td>2003 年</td>
<td>Japan and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Exchanges in the 21st Century, co-editor</td>
<td>The Japan Times</td>
</tr>
<tr>
<td>2003 年</td>
<td>“Interactions among Three Cultures in 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during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Collating Five Different Texts of Huang Zun-xian’s ‘Chao-xian Ce-lue’ (Korean Strategy)”</td>
<td>Waseda COE-CAS Working Paper 5</td>
</tr>
<tr>
<td>2004 年</td>
<td>《戦後日本の国際文化交流》（監修）</td>
<td>勁草書房</td>
</tr>
<tr>
<td>2006 年</td>
<td>〈国際移動時代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と文化〉</td>
<td>日本国際文化学会，《インターナルチャル》第 4 號</td>
</tr>
<tr>
<td>2007 年</td>
<td>《日中戦争期の中国における社会・文化変容》（編著）</td>
<td>東洋文庫</td>
</tr>
<tr>
<td>2007 年</td>
<td>《新版【対日関係】を知る事典》（共同監修）</td>
<td>平凡社</td>
</tr>
</tbody>
</table>
| 2008 年 1 月 | 〈国際関係を文化で見る—〉 | 早稲田大学政治経済学部《早
<table>
<thead>
<tr>
<th>年 份</th>
<th>書名、標題</th>
<th>出 處</th>
</tr>
</thead>
<tbody>
<tr>
<td>1968年10月</td>
<td>〈満州における日本の教育政策〉</td>
<td>アジア政経学会, 《アジア研究》</td>
</tr>
<tr>
<td>1973年3月</td>
<td>〈満州国協和会の政治的展開—複数民族国家における政治的安定と国家動員—〉</td>
<td>日本政治学会, 《政治学年報》第23号</td>
</tr>
<tr>
<td>1981年3月</td>
<td>〈《満州産業調査》(1905年)について〉</td>
<td>近代日本研究会, 《年報近代日本研究》3</td>
</tr>
<tr>
<td>1988年</td>
<td>〈中国における統一国家の形成と少数民族—満州族を例として—〉</td>
<td>東京大学出版会, 《アジアにおける国民統合—歴史・文化・国際関係》</td>
</tr>
<tr>
<td>2011年</td>
<td>〈近代と反近代の錯綜—〉</td>
<td>岩波書店, 《岩波講座東アジア》</td>
</tr>
</tbody>
</table>

二、満洲研究

<table>
<thead>
<tr>
<th>年 份</th>
<th>書名、標題</th>
<th>出 處</th>
</tr>
</thead>
<tbody>
<tr>
<td>2010年</td>
<td>《日中戦争期中国の社会と文化》（共編）</td>
<td>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td>
</tr>
<tr>
<td>2011年</td>
<td>《インタビュー戦後日本の中国研究》（共編）</td>
<td>平凡社</td>
</tr>
<tr>
<td>2013年</td>
<td>《国際文化関係史研究》（共編）</td>
<td>東京大学出版会</td>
</tr>
</tbody>
</table>

年 份 | 書名、標題 | 出 處 |
<table>
<thead>
<tr>
<th></th>
<th></th>
<th></th>
</tr>
</thead>
<tbody>
<tr>
<td>1982年</td>
<td>高木喜成・、《満州における日本の教育政策》</td>
<td>アジア政経学会, 《アジア研究》</td>
</tr>
<tr>
<td>1973年3月</td>
<td>《満州国協和会の政治的展開—複数民族国家における政治的安定と国家動員—〉</td>
<td>日本政治学会, 《政治学年報》第23号</td>
</tr>
<tr>
<td>1981年3月</td>
<td>〈《満州産業調査》(1905年)について〉</td>
<td>近代日本研究会, 《年報近代日本研究》3</td>
</tr>
<tr>
<td>1988年</td>
<td>〈中国における統一国家の形成と少数民族—満州族を例として—〉</td>
<td>東京大学出版会, 《アジアにおける国民統合—歴史・文化・国際関係》</td>
</tr>
<tr>
<td>2011年</td>
<td>〈近代と反近代の錯綜—〉</td>
<td>岩波書店, 《岩波講座東アジア》</td>
</tr>
<tr>
<td>年 份</td>
<td>書名、標題</td>
<td>出 處</td>
</tr>
<tr>
<td>-------</td>
<td>------------</td>
<td>-------</td>
</tr>
<tr>
<td>2011年3月</td>
<td>九二〇年代満洲の文化状況</td>
<td>ジア近現代通史4</td>
</tr>
</tbody>
</table>

三、東アジア共同体研究

<table>
<thead>
<tr>
<th>年 份</th>
<th>書名、標題</th>
<th>出 處</th>
</tr>
</thead>
<tbody>
<tr>
<td>2005年</td>
<td>〈アジアにおける地域性の創生－その原因を求めて－〉</td>
<td>早稲田大学出版部・山本武彦編・《地域主義の国際比較－アジア太平洋・ヨーロッパ・西半球を中心にして》</td>
</tr>
<tr>
<td>2007年</td>
<td>《東アジア共同体の構築（3）国際移動と社会変容》</td>
<td>岩波書店</td>
</tr>
<tr>
<td>2007年</td>
<td>A New East Asia: Toward a Regional Community co-editor</td>
<td>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td>
</tr>
<tr>
<td>2007年</td>
<td>〈グローバル化時代の地域研究－特権性の喪失〉</td>
<td>世界思想社・《現代中国地域研究の新たな視野》</td>
</tr>
<tr>
<td>2007年</td>
<td>〈アジアにおける人の国際移動—東アジア共同体の原動力〉</td>
<td>岩波書店・《東アジア共同体の構築3・国際移動と社会変容》</td>
</tr>
<tr>
<td>2010年3月</td>
<td>“Cultural Prospects for an East Asian Community”</td>
<td>Shonan Research Institute Bunkyo University, Shonan Journal, vol. 1</td>
</tr>
</tbody>
</table>
參考文獻

一、中文文獻

王屏，2004，《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北京：商務印書館。

王義桅，2008，《超越國際關係：國際關係理論的文化解讀》，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中村雄二郎著，卞崇道、劉文柱譯，1993，《西田幾多郎》，北京：三聯書店。譯自《西田幾多郎》，東京：岩波書店，1983。

井村哲郎，2010，《滿州國歷史研究的現狀》，《僞滿州國的真相—中日學者共同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282-297。

史桂芬、王柯，《從昭和研究會看日本戰爭中的知識分子》，《抗日戰爭研究》，2008年第2期：53-65。

史桂芬，2009，《近代日本人的中國觀與中國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史桂芬，2011，《日本昭和研究會與近衛內閣的對華政策》，《陝西師範大學學報》第40卷第4期，頁134-140。

石之瑜，1994，《中共外交的理論與實踐》，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石之瑜，2005，《英國學派與兩岸國際關係研究》，《國際政治科學》2005年第1期：132-148。

石之瑜，2010，《國際關係研究的亞洲地方性學派》，《國際政治科學》2010年第3期：51-73。

石之瑜、劉克倫，2010，《入江昭對世界與中國的中間主義立場——一種多元身份的知識視野》，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
石之瑜、黃威霖、張芝瑾、黃鈺淳、陳鼎尹、黃欣婷，2010，〈在中國的滿洲看見西田幾多郎的場所：兼與泰戈爾文明觀的比較〉，《政治科學論叢》，48：109-138。

石之瑜、張登及，2010，〈中國崛起的認識論及其敘事衍生〉，《世界經濟與政治》，2010年第1期：37-52。

石之瑜，2011，〈微觀臺灣學界對中國大陸的研究角度—後殖民視野下的遭遇與選擇〉，「國際學術論壇與論壇論文〈11月1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論壇，頁222-251。

白永瑞，2006，〈東亞地域秩序：超越帝國，走向東亞共同體〉，《思想：天下、東亞、臺灣》，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頁129-150。

平野健一郎著，張啟雄、馮青、周兆良、黃東蘭譯，2011，《國際文化論》，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譯自平野健一郎，2000，《國際文化論》，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平野健一郎著，徐顯芬譯，2003，〈全球化進程中亞太地區的文化演變與區域研究〉，《全球化下的中國與日本—海內外學者的多元思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31-42。

加藤周一著，劉迪譯，2000，〈日本文化的雜種性〉，季羨林（編），《日本文化論》，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頁257-274。譯自《思想》1955年6月號。

竹內好著，李冬木、趙京華、孫歌譯，2005，〈近代的超克〉，《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聯書店，頁292-357。譯自〈近代の超克〉，《近代日本思想史講座》第7卷，東京：筑摩書房，1959。

竹內好著，李冬木、趙京華、孫歌譯，2005，〈何謂近代—以日本與中國為例〉，《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聯書店，頁181-222。譯自〈近代とは何か（日本と中国の場合）〉，《竹內好全集》第4卷，東京：筑摩書房，1980。
吉田和子、張啟雄，1997，《平野健一郎先生的學風與學問》，《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24：85-93。

李圭之，2008，《近代日本的東洋概念—以中國與歐美為經緯》，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

李佳徽，2011，《知己？異己？港臺知識人—李萬居與李南雄父子的中國認識》，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

坂野潤治著，鍾淑敏譯，2008，《近代日本政治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譯自《近代日本政治史》東京：岩波書店，2006。

宋興洲，2005，《區域主義與東亞經濟合作》，《政治科學論叢》，24：1-48。

林立，2009，《檢視 Carl Schmitt 對古典國際法「發動戰爭合法」之肯定及對當代「發動戰爭犯罪化」之批判》，《臺灣國際法季刊》，6（4）：130-131。

邵軒磊，2009a，《「西方」如何影響日本的「中國研究」—以日本福特基金會論爭為例》，《中國大陸研究》，52（3）：71-90。

邵軒磊，2009b，《戰後日本之中國研究系譜》，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

金榮勇，2009，《東亞經濟與政治》，《2009年度國際及中國大陸情勢發展評估報告》，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頁49-52。

秦亞青，2012，《關係與過程—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文化建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孫歌，2001，《亞洲意味著什麼—文化間的「日本」》，臺北：巨流圖書公司。

孫歌，2002a，《實話如何實說》，《主體彌散的空間—亞洲論述之兩難》，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頁29-40。
孫歌，2002b，《中日媒中的戰爭記憶》，《主體彌散的空間—亞洲論述之兩難》，頁41-73，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孫歌，2002c，《亞洲意味著什麼》，《主體彌散的空間—亞洲論述之兩難》，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頁112-178。

莊錫昌、孫志民主編，1988，《文化人類學的理論架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野村浩一，2011，〈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分析中國—野村浩一教授訪談錄〉，《戰後日本的中國研究—口述知識史》，何培忠、石之瑜（編），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頁81-112。

張芝瑾，2010，《石原莞爾的中國認識與亞洲觀》，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

張建立，2010，〈鳩山內閣東亞共同體構想及其實現的可能性—從集團締結原則的視角〉，《日本藍皮書—日本發展報告（2010年）》，李薇（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199-208。

郭佳佳，2008，《離散者的中國民族主義—華裔學者趙穗生、鄭永年面對中國的身份策略》，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

陳柏宇，2013，《國際關係的亞洲學派：中國、日本與印度的「再世界化」》，臺北：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研究中心。

陳建廷、石之瑜，2007，《中日合群？日本知識界論爭「中國崛起」的
參考文獻 123

近代源流》，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

黃誠玉，2003，《案牘研究與田野調查：日本東洋史學方法之一面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2：1-45。

黃鼎尹，2010，《從王道樂土到中國研究的資料庫——超越帝國主義的溝鐵》，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碩士論文。

曾倚萃，2008，《溝口雄三的中國方法——超克亞洲的知識脈絡》，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

黃文雄，2011，《哲人政治家——李登輝之「我」》，臺北：前衛出版社。

黃自進，2009，《「和平憲法」下的日本重建（1945-1960）》，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黃佳寧、石之瑜，2010，《入歐不脫亞？當代思想史中「日本主義」的可能性》，《問題與研究》，49：15-44。

黃威霖，2010，《文明差異與現代性——泰戈爾的政治理想及其對中國文明的期盼》，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黃鈺淳，2010，《在臺灣與中國之間——李登輝的思想脈絡及其中國認識》，高雄：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黃福慶，1995，《九一八事變後溝鐵調查機關的組織體系（1932-194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4：367-409。

黃淑娉、龔佩華，2004，《文化人類學理論方法研究》，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黃誠涓，2005，《成熟之無政府狀態」、「文明衝突論」與全球化：主流國際關係理論之偏狹研究議程》，《兩岸與國際事務季刊》，2：81-106。

溝口雄三，2011，《站在中國立場上分析中國——溝口雄三教授訪談錄》，《戰後日本的中國研究——口述知識史》，何培忠、石之瑜（編），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
葛兆光，2011，《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鈴木隆史著，周啟乾譯，1992，《日本帝國主義與滿洲》，臺北：金禾出版社。譯自《日本帝國主義と満州》，東京：塙書房，1992。
趙汀陽，2005，《天下體系：世界制度哲學導論》，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諸葛蔚東，2010，《戰後日本知識共同體的流變》，《社會學研究》，5：1-18。
顏欣怡、石之瑜，2007，《青年蔡培火的身份論述—日本大正思潮下的臺灣意識》，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
劉家鑫，2007，《日本近代知識分子的中國觀》，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
嚴紹盪，2005，《戰後60年日本的中國觀》，《日本研究》，3：1-11。
蘇翊豪，2012年3月19、20日，當面訪談平野健一郎教授，日本東洋文庫、西東京市平野健一郎的研究室。

二、日文文獻
丸川哲史，2010，《竹內好—アジアとの出会い》，東京：株式會社河出書房新社。
丸山真男，1961，《日本の思想》，東京：岩波書店。
丸山真男，1977，《近代日本の知識人》，松澤弘陽，植手通有（編），1996，《丸山真男集》第十巻，東京：岩波書店。

三木清，1938，《東亜思想の根拠》，最初刊載於《改造》1938年12月號，現收錄於三木清，2007，《東亜協同体の哲学—世界史的立場と近代東アジア》，東京：書肆心水出版社，頁13-26。

三木清，1939，《東亜文化的根拠》，最初刊載於《アジア問題講座》第十巻，現收錄於三木清，2007，《東亜協同体の哲学—世界史的立場と近代東アジア》，東京：書肆心水出版社，頁187-197。

三木清，1940，《文化的力》，最初刊載於《改造》1940年1月號，現收錄於三木清，2007，《東亜協同体の哲学—世界史的立場と近代東アジア》，東京：書肆心水出版社，頁231-244。

川田侃、二宮三郎，1959，《日本における国際政治学の発達》，《国际政治》，9：119-128。

山本秀夫，1977，《橘樸》，東京：中央公論社。

山本裕，2008，《事業化された調査—資源・鉱物物調査とオイルシェル事業》，《満鉄の調査と研究—その「神話」と実像》，松村高夫、柳沢進、江田憲治（編），東京：青木書店，頁227-269。

大賀哲：2009，《「開かれた地域主義」と東アジア共同体構想：東アジアサミットをめぐる日本の視座》，《国際政治》，158：135-149。

小林英夫，2008，《満洲—その今日の意味》，東京：柘植書房新社。

小林英夫，2007，《満鉄調査部の軌跡：1907-1945》，東京：藤原書店。

小林敬治，2002，《国際秩序の形成と近代日本》，東京：吉川弘文館。

今井隆太，2009，《東亜協同体論における理想主義》，《名古屋学芸大学研究紀要—教養・学際編》第五巻，名古屋：名古屋学芸大学，頁59-74。

今井隆太，2000，《東亜協同体論と知識人—新明正道東亜協同体の理
想の位置）,《ソシオサイエンス》（Waseda Review of Socio-science）
第6期，東京：早稲田大学，頁315-331。
井出武三郎，1960，《安保闘争》，東京：三一書房。
毛里和子，2007，《現代中国地域研究拠点が始動》，《ワセダアジア
レビュー》（Waseda Asia Review），3，東京：早稲田大学アジア
研究機構，頁68-71。
戸塚順子，2005，《大東亜共栄圏における領土権概念について—
国際法学者松下正壽の議論を題材として》，《人間文化研究科年
報》，20：423-434。
石井英一郎，1966，《文化人類学序説》，東京：時潮社。
石津朋之，2004，《総力戦、モダニズム、日米最終戦争—石原莞爾の
戦争観と国家・軍事戦略思想》，《戦争史研究国際フォーラム報
告書》第二回，東京：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頁80-101。
永安幸正，1992，《世界秩序・民族及び道德—座談会《世界史的立場
と日本》（昭和十六～十七年）を読む》，《モラロジー研究》，
37：1-66。
平野健一郎，1972，《満州国協和会の政治的展開—複数民族国家にお
ける政治的安定と国家動員》，《年報政治学》，23：231-283。
平野健一郎，1976，《文化的関係としての国際関係》，《国際学理論
と展望》，武者小路公秀，蠟山政道（編），東京：東京大学出版
会，頁173-200。
平野健一郎譯，Benjamin Schwartz 著，1978a，《中国の近代化と知識
人—厳復と西洋》，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譯自 In Search of Wealth
1964.
平野健一郎，1978b，〈中世日本における文化的・政治的統合—文化運搬者としての連歌師宗祇をめぐって〉，《国際政治》，59：1-18。

平野健一郎，1984a，〈国民統合研究の発展のために〉，《近代日本とアジア：文化の交流と摩擦》，平野健一郎（編），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頁225-237。

平野健一郎，1984b，〈1923年の満州〉，《近代日本とアジア：文化の交流と摩擦》，平野健一郎（編），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頁235-254。

平野健一郎，1988，〈ヒトの国際的移動と国際関係の理論〉，《国際政治》，87：1-13。

平野健一郎，1994a，〈アジアにおける地域システムと国際関係〉，《地域システムと国際関係》，平野健一郎（編），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頁3-22。


平野健一郎，1997，〈ヒトの国際的移動と国際交流〉，《国際政治》，114：95-107。

平野健一郎，2000，《国際文化論》，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平野健一郎，2002，〈黄遵憲《朝鮮策略》異本校合—近代初頭東アジア国際政治における三つの文化の交錯について〉，《国際政治》，129：11-28。

平野健一郎，2003a，〈衛藤先生の学問の人間性について〉，《衛藤瀋吉先生—人と業績》，衛藤瀋吉著作集編集委員会（編），東京：株式会社東方書店，頁115-119。

平野健一郎，2003b，〈衛藤先生の国際関係史と文化摩擦研究〉，《衛
藤瀋吉先生一人と業績》，衛藤瀋吉著作集編集委員会（編），東京：株式会社東方書店，頁126-130。

平野健一郎，2007a，〈国際文化交渉論の現在——シュウォルツの巻復論から国際文化論への軌跡〉，《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2：7-22。

平野健一郎，2007b，〈グローバル化時代の地域研究—特権性の喪失〉，《現代中国地域研究の新たな視点》，西村成雄、田中仁（編），東京：世界思想社，頁16-29。

平野健一郎，2007c，〈戦争下の文化変—抗日と抗戦〉，《日中戦争期の中国における社会・文化変容》，平野健一郎（編），東京：東洋文庫，頁1-12。

平野健一郎，2007d，〈東アジアにおける人の国際移動〉，《東アジア共同体の構築—国際移動と社会変容》，西川潤、平野健一郎（編），東京：岩波書店，頁125-154。

平野健一郎，2008，《国際文化論講義》，東京：国際文化会館第6回会員懇談会。

平野健一郎，2010，〈日本における中国研究と国際文化論〉，近代史学会演講，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2月27日。

平野健一郎，2011，《インタビュー—戦後日本の中国研究》，平野健一郎、土田哲夫、村田雄二郎、石之瑜（編），東京：平凡社。

平野健一郎，2013，〈日本的中國研究與國際文化論〉，《戰後日本の中國研究—日中知識史（二）》，邵軒磊、石之瑜、何培忠（編），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

加藤周一，1955，〈日本文化の雑種性〉，《思想》。

西川潤、平野健一郎，2007，〈東アジアの地域化を進めるもの〉，《東アジア共同体の構築—国際移動と社会変容》，西川潤、平野健一郎（編），東京：岩波書店，頁1-35。
参考文献 129

西田幾多郎, 2004, 《西田幾多郎全集》第 12 巻, 東京: 岩波書店。

吉田傑俊, 《京都学派の哲学—西田、三木、戸坂を中心に》, 東京: 大月書店。

竹中佳彦, 1995, 《国際法学者の「戦後構想」—「大東亜国際法」から「国連信仰」へ》, 《国際政治》, 109: 70-83。

庄司潤一郎, 1989, 《日中戦争の勃発と近衛文麿国際正義論—東亜新秩序への道程》, 《国際政治》, 91: 39-54。

庄司潤一郎, 2011, 《日本における戦争呼称に関する問題の一考察》, 《防衛研究所紀要》, 13 (3): 43-80。


吉澤誠一郎, 2006, 《東洋史学の形成と中国》, 《帝国日本の学知—第三巻: 東洋学の磁場》, 東京: 岩波書店, 頁 55-97。

芝崎厚士, 2002, 《国際文化論における2つの文化—方法論的考察》, 《国際政治と文化研究》, 東京: 日本国際政治学会, 頁 44-60。

松本三之介, 2011, 《近代日本の中国認識—徳川期学から東亜協同体論まで》, 東京: 以文社。

松村高夫, 柳沢遊, 江田憲治, 2008, 《滿鉄の調査・研究活動の問題性と本書の立場》, 《滿鉄の調査と研究—その「神話」と実像》, 松村高夫, 柳沢遊, 江田憲治 (編), 東京: 青木書店, 頁 1-24。

松浦正孝, 2006, 《一国史・二国間関係史からアジア地域史》, 《国際政治》, 146: 6-8。

松浦正孝, 2010, 《大東亜戦争はなぜ起きたのか—満アジア主義の政治経済史》, 名古屋: 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青木保, 2004, 《基調報告 2：文化的基盤》, 《東アジアとは何か？その歴史的・文化的基盤》, 東京: 東アジア共同体評議会, 頁 8-13。
青木保，2005，「混成文化」の展開と広がる「都市中間層」，伊藤憲一（編），《東アジア共同体と日本の両面》、頁 67-116。柳田國男，1970，《文化運搬の問題》，《定本柳田国男集》第 24 巻，東京：筑摩書房。

波多野澄雄，1996，《太平洋戦争とアジア外交》，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波多野澄雄，2004，「国家平等論」を超えて－「大東亜共栄圏」の国際法秩序をめぐる葛藤，浅野豊美・松田利彦（編），《植民地帝国日本の法的展開》，東京：信山社，頁 295-326。

岡部牧夫，2008，《帝国主義論と植民地研究》，《日本植民地研究の現状と課題》日本植民地研究会（編），東京：アテネ社，頁 19-54。

前川亨，2005，《文化接触の諸類型－「東アジア」地域を想定した理論的枠組みとして》，《専修大学社会科学年報》，39：111-136。

森川裕二，2012，《東アジア地域形成の新たな政治力学：リージョナリズムの空間論的分析》，東京：國際書院。

森嶋通夫，2001，《日本にできることは何か－東アジア共同体を提案する》，東京：岩波書店。

後藤乾一，2011，《アジア太平洋戦争と大東亜共栄圏》，《アジア太平洋戦争と「大東亜共栄圏」》，和田春樹・後藤乾一・木畑洋一・山室信一・趙景達・中野聡・川島真（編），東京：岩波書店，頁 1-41。

酒井哲哉，2002，《国際関係論の成立と国際法学－日本近代史研究からの一考察》，《世界法年報》，22：95-106。

酒井哲哉，2004，《「植民政策学」から「国際関係論」へ－戦間期日
参考文献

本の国際秩序論をめぐる一考察》，浅野豊美、松田利範（編），
《植民地帝国日本の法的構造》，東京：信山社，頁 3-28。
財団法人満鉄会編，2007，《満鉄四十年史》，東京：吉川弘文館。
猪口孝，2007，《国際関係論の系譜》，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浅野豊美，1994，《日本植民地研究史論》，東京：未来社。
猪股祐介，2007，《満洲国の日本法的構造》，東京：信山社，頁 3-28。
野村一雄，1986，〈回想満鉄調査部〉，東京：勁草書房。
滝川之雄，2012，《日本知識人外交論》，徐興慶、陳永峰（編），《<京都> 記憶と歴史》，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
頁 68-106。
橋川文三，1970，《抵抗者政治思想》，《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Ⅱ》，
橋川文三、松本三之介（編），東京：株式会社有斐閣，頁 399-414。
増田義郎，1967，《純粹文化の条件》，東京：講談社。
藤川賢，1993，《高田保馬における社会学理論と民族論との関連》，
《社会学評論》，43(4)：421-435。
藤井昇三，1983，《尾崎秀実の日中戦争観—民族運動・東亜新秩序論・
汪兆銘工作を中心に》，《尾崎秀実の中国研究》，今井清一、藤井昇三（編），東京：アジア経済研究所，頁 177-203。
鶴見俊輔，加加美光行，2007，《いま、改めてナショナリズムの根を探る—竹内好の方法を参照して》，《無根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を超えて—竹内好を再考する》，鶴見俊輔、加加美光行（編），
東京：日本評論社，頁 213-283。
John Maraldo 著，安積百合香譯，2005，《欧米の視点からみた京都学派の由来と行方》，《世界のなかの日本の哲学》，藤田正勝、Bret Davis（編），京都：昭和堂，頁 31-56。
三、英文文獻


Inoguchi Takashi and Bacon Paul. 2001.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Japan: towards a more international disciplin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Shih Chih-yu and Huang Chiung-Chiu. 2013. “Balance of Relationships: Accessing Internationals System from China.” In the Conference on Theory of Balance of Relationship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East Asia.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4-15 December, pp. 7-45.


超越日本國家困境的身份策略
平野健一郎國際文化論視野下的滿洲與東亞觀

著作權所有 • 翻印必究

著作人 / 蘇翊豪
出版者 /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
地址：100 台北市徐州路 21 號
電話：(02)2351-9641#337
傳真：(02)2341-2806
E-mail:politics@ntu.edu.tw
http://politics.ntu.edu.tw/RAEC/

印刷者 / 翰蘆圖書出版公司暨金華排版打字行
電話：(02)2382-1120 • 2382-1169

初版日期 / 103 年 5 月

《本書如有缺頁、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